

前 言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本来是“纪念恢复高考 20 周年征文”而用的篇名。当时总结“文革”中的学习是一种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文革”中有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中确实是看不见有什么个人功利可供追求的。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功利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个人功利主义情绪几乎无处不在了。但是我一直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的认识上,还是应该尽量少一点个人功利的影晌,甚至最好是完全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至于真理的实施,可能还是要考虑到各种个人功利的因素。现在把这一文章的篇名作为本文选的书名,就是想表达自己形成这些文章的态度,也向读者表态:如果有谁能提出异议,我仍然随时准备没有个人功利地追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作 者

2000 年 6 月



关于时代问题的新思考

探讨时代问题,首先要确定时代的性质。我们这里所说的时代,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时代概念,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历史阶段。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相继经历了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进入 20 世纪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竭力向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日益加深。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国家有一种流行的提法,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时代。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曾乐观地讲是东风压倒西风。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和苏联闹翻了以后,这个提法不怎么讲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当时我们一些人由此而称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没有直接用和平与发展命名时代。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当今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或者规范的说法。和平与发展对时代的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特点进行了描述,但用其命名时代是意义有限的。我认为研究时代问题,应该回到列宁对时代定义的方法上。列宁曾指出:区分时代不能根据“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而是要确实弄清,“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这就是说,哪个阶级在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谁说了算,这个时代就应该命名为哪个阶级的时代。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确实在国际关系中起着决定作用,是当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点由于苏东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变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中,确实取得了暂时的局部的巨大胜利,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了暂时低潮。苏联瓦解的影响可以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表现出来,尽管中苏之间有矛盾和对立,但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毕竟大大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使它不敢为所欲为。社会主义苏联消失以后,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就占绝对优势了。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从整体上讲,我们是在向资本主义学习。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市场经济不是我们发明的,是资本主义发明的,而且被资本主义认为是它最独特的东西。现在我们要学习搞打上资本主义印记的市场经济,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



进行的让步和妥协。学习就是一种妥协、承认,承认资本主义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军事领域,主导者确实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命名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客观的。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经过 20 世纪上半叶剧烈的斗争发展来的。主要是 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三次大危机,即由垄断资本主义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 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三次危机都几乎使资本主义陷入灭顶之灾,一些老人提起这些都不寒而栗。三次危机提醒了资本主义,也说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潜力。这一方面证明了列宁 20 世纪初对帝国主义的判断是英明的,帝国主义有严重危机的存在和垂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主义在克服危机和调整自身机制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从而使其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一直处在没有大的危机发生的相对平稳发展过程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小的危机发生,比如 1967 年从法国开始并蔓延到欧洲许多国家的“五月风暴”,但基本上都是调整性的,没有危及资本主义生存的政治斗争,也没有出现新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

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原因,一是不能忽视分析 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三次严重危机。二是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和潜力。三是要充分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形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式——跨国公司的作用。跨国公司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组织,它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强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经济领域和微观层次的联合。一方面跨国公司经济力量非常强大,目前世界上共有各类跨国公司4万多家,它们的生产总值已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控制着世界50%的以上的贸易额和75%的国际技术转让。有资料显示: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前10名,生产总值相当于这7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GNP总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首脑可以直接参与国际重大事件的解决,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重大事件,离开了跨国公司,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是解决不了的。四是社会主义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地步。20世纪上半叶,虽然社会主义比较幼稚,但从力量对比上讲还是可以与资本主义一搏的。但从本世纪下半叶开始,社会主义一直在进行内部经济发展和体制调整,严格讲我们的迈进步伐不够大,而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和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到了很多新的办法。比如非竞争性质的国有企业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是从苏联学到的,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比例都相当高。另外施行社会保障也是从苏联学到的。二战后,在社会党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施行了一大批社会保障措施,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现在回过头来看,凡是资本主义能够大面积学到的东西,都不是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应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阶段、范畴的东西或者是中性



的,非社会制度性质的。也就是说,早期的社会主义是沿着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进行了一些发明创造,然后又被现在的资本主义学过去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干了资产阶级的的工作,相类似的是苏联也在资本主义段落里做了新的创造。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趋同论”、“补课论”实质上是因为对一些事物的性质没有从本质上定义准确。正是上述四个原因,决定了当今时代的性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有什么特点呢?它确实既不同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它是以国际垄断为特征的。这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了一种微观形式上的联系,矛盾有所缓和。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由于跨国公司的出现,产生的可能性确实大大减小了。首先,欧洲各强国之间没有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好像没有国界一样,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准备的。其次,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虽然有矛盾和摩擦,但跨国公司的相互渗透日益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关,难以打仗。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它们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情况与20世纪初已大不一样,20世纪初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主动去打仗,现在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不愿打仗,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有逐步减小的趋势。在这个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跨国公司,已不完全是经济组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织(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中小企业才像是一种纯经济组织,才仅仅是靠竞争取胜的),它有一部分利润是来自超经济手段的,是通过政治斗争得来的,这也是我们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来对时代性质进行定义的理由。

在明确时代性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时代的发展方向。时代的性质和时代的发展方向是对立统一的。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但时代的发展方向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没有形成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力量之前,虽然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代,但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问题在于,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进步、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有赖于向资本主义斗争与学习这一历史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旧制度中成熟以后才能真正代替旧的制度。过去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成熟以后,才夺取政权,才代替了封建制度的。而社会主义只有在某个国家内先夺取政权,才能成熟起来,代替资本主义。这在局部的表现形式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从历史规律来看,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新社会制度还是要在旧制度内部成熟起来,才能代替旧制度。把中国放在整个地球上来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在旧制度的包围下向资本主义斗争与学习、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也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性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人们经常讲,今天的改革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现在看来这种提法还是表面化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这种概念相加的表述以及其后的展开上有一定的困难。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后几年提到这样一个公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号就是市场经济,通过“+”号把二者联系起来。毛泽东同志生前曾三次接近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提到我们要搞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开展,我们党丢掉了搞新民主主义的想法,开始批判五种经济形式并存。第二次是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半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想搞点资本主义。当时出现了两类问题:一是市场受到影响,产品和服务质量差,群众生活感到不方便。二是原来的资本家口头上接受改造,但还在搞地下工厂、地下商店,而且还拿定息,一年拿上百万、几百万,钱没有地方花。对于后一种情况黄炎培先生给毛泽东同志做了反映,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于是1956年12月5日、7日、8日三天晚上连续开座谈会,提出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肯定了竞争,也肯定了资本聚集。他认为国家资本不够,私人有钱也可以开工厂,这样就可以把那些闲散资本的力量调动起来,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但这种思想活动到1957年反右时又突然终止了。第三次是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讲到要肯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特别是后来苏联讨债撤走专家,加上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中央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倡导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又提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又重新回到了商品生产上。后来到1964年开始“社教”和“四清”运动,这种想法和做法就都放弃了。

为什么中苏历史上两个起过伟大作用的领导集团都曾经接近过市场经济,又都终止了呢?这仿佛是一个历史的谜。但若把它放到时代大环境中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们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理智地思考社会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毕生为无产阶



级解放事业而斗争,对无产阶级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急切向往使他们与市场经济失之交臂。这实质上就是时代性质与时代方向的斗争。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力量弱小、脆弱与简单、幼稚的一个侧面。表面上看是领导人的具体设想,实际上是由时代的性质决定的。1979年我们走上改革之路时应该说比1950年发展多了,1999年的中国比1949年的中国强大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定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搞市场经济呢?这是由时代的性质决定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新生力量。我们必须在本质上保持我们独特的性质,只有保持我们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才能超过资本主义。单靠学习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的东西追赶资本主义,是永远也超过不了它的。新生事物要在旧事物内部,在同旧事物斗争并向旧事物学习的过程中成熟起来。比如市场经济,我们要在学习、熟悉的过程中驾驭它。在未来的世纪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深化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成熟,代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将是社会主义新时代。



关于苏东剧变十年来的一些反思

苏东变化之巨剧,令人震惊。苏东剧变,对国际形势的冲击,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有人甚至把它看做“历史之谜”。苏东的社会变革是一场根本性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从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从意识形态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关于苏东剧变,我们最关心的是,苏东当时为什么突然变了?除了外在因素,造成突变的内因是什么?在苏东,一个执政党怎么可能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了呢?中国共产党要从中汲取哪些教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果发生变化,有可能最接近的一种变化是什么?

苏东为什么会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前几年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苏联经济搞糟了。现在看来,夸大苏联的“经济问题”,把苏联的“经济问题”看成是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不大讲得通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中,很少有人把苏联垮台的直接原因归之于“经济问题”,他们普遍认为苏东剧变与经济问题无直接相关。我



们认为,和“经济问题”相比,“阶级问题”是解读苏东剧变的一个更重要的角度。在这里,阶级的主体性、成熟性,是我们看待苏东问题的主要立足点,即要着力研究执政党还有没有相应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苏东经过 1989、1990、1991 的三年三步剧变,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者演变成了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他们公开完成“资产阶级化”之前,我用“潜资”(“潜在的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来指称他们。苏东的“潜资”是怎么形成的,是最值得研究的事情。我们主要从他们在转轨中的阶级表现来研究他们的成长轨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个别的政治家,但他们是一种阶级力量的代表。80 年代中期,在戈氏“公开性”和“新思维”引导下,党内少数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人同 60 年代出现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派,成为社会主义反对派,自称“改革派”。这个“改革派”,即“潜资”,其代表人物则是戈氏本人。正如马特洛克所言,戈尔巴乔夫“从 1988 年到 1989 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 70 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 1991 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①。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美国到底希望苏联成为什么样子?”^② 当

① [美]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55 页。

② 同上书,第 647 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已经实现了我要做的一切，我感到安宁。”苏东剧变后这种“潜资”，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新俄罗斯人”或“新莫斯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党政干部或当权阶层。反社会主义政变的组织者在苏联灭亡后大约两年，还在政治上含糊其辞。后来，盖达尔扔掉共产党的面具，公开说：“我们正在建设年轻的资本主义。”1917年，苏联没收富人财产，将其不动产和银行存款收归国有。1992年，却剥夺国有资产，向所有人分发国家财产，“使影子资本合法化”，加速培养资产阶级，迅速造就了资本家阶级的基础。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应该说当初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赞成搞垮国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来推行私有化。但是当国家变色、党改变性质以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先天优势，“与其让别人当资本家，不如由我来当资本家”。结果，正像一位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步搞出来的肯定不是私人资本主义，而是官僚资本主义。

分析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我们认为苏东剧变既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而是这些国家生长出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使“改革”变成了“改向”。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并不能确保共产党内不产生潜在的资产阶级；并不能必然、自发地处理好改革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系。我们知道，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苏联二三十年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



强调自力更生,强调国对国地与资本主义竞争,因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长期以来,由于苏东各国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在苏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以致本国经济微观层次的发展越来越缺乏生机和活力,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入70年代以后,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经济结构使苏联经济进入了“停滞”状态。再加上它没有抓住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机遇,结果削弱了自己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改革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一下子要在500天内转轨到市场经济,由于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使得压抑已久的党群矛盾、党内矛盾突出了、激化了,以致最后搞得苏联居民“面临挨饿”,要靠西方国家提供“紧急救济食品”才能生活的地步。尽管当时苏东剧变各自变化的过程和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大都朝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发展的。他们不无天真地认为:抛弃了社会主义,就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繁荣;实行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能够提高效率;东欧国家还认为,脱离了苏联集团,就能够得到西方的技术、资金、贸易平等。苏东国家的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或非共产党化转变;二是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向多党制转变;三是实行私有制,向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转变。今天,苏东人民回过头来才发现,他们当初的经济制度虽然有缺点,但是并不像当时他们急于抛弃时所认识的那样坏。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那么,苏东各国的经济、政治前景,将来到底会如何呢?是否会像美国、德国、法国那样发达起来呢?苏东剧变后,他们在摆脱“苏联模式”后又开始照搬“西方模式”,把国家安全和繁荣的希望寄托在加入“北约”和“欧盟”上。我们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旦这个结构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有人曾经形象地把苏东未来说成是世界上的“最大未知数”。东欧的一个国家,10年换了10个总统,就是明证。从阶级结构的角度来看,它还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因为苏东的新资产阶级离成熟的资产阶级还有相当的距离。只要苏东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一个与西方资产阶级执政水平接近的统治阶级,其政治生活必然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苏东的资产阶级还是新生的、幼稚的,它由于缺乏公开成长、公开执政的历史,对西方成熟资产阶级那一套“游戏规则”的驾驭还难以得心应手。例如,匈、捷、波三国的私有化过程,一个靠“卖”,一个靠“分”,一个靠“内部人私有化”,其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明显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发现,那些曾是处长、副处长“下海”经商的人,和完全从个体户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其性格、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其自主性、成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苏东的未来,近10年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苏东仍然处于历史大过渡的时期。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其资产阶级就不成熟。列宁就是利用这种不成熟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的薄弱



环节中取得了胜利。“潜资”变成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当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当局就曾经许诺，要迅速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此可以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结果却适得其反，竟然导致在社会、文化和技术领域的全面倒退。“休克疗法”3年，俄罗斯生产总值下降一半。在“休克”改革4年间，俄罗斯经济落后于美国的状况加剧了64%。世界排名约为75位。1994年工业水平不及1990年的50%，国民收入减少40%。俄罗斯越来越陷入“制度性危机”，越来越丧失国家主权。正像瓦·博尔金所言，现在“好像到处都是所有者，每个人都得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国民财富被分配得如此巧妙，以致它不能保护免受贫困。机会相等和普遍幸福的社会没能实现，民主化以它应有的方式结束了；对财产实行有利于强者的再分配。去他的所有权吧，过去没有民主的时候我们虽说生活得不富裕，但也不受穷，有自己的尊严”^①。

同时，苏东加入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原则具有排他性，它们由于弱小也必然处在被剥削、受控制的位置上。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判断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处于这个“金字塔”的塔顶，依次才是西欧、日本，俄罗斯则已经沦落成为其下一层次。至于东欧12国，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它们的经济形势也仅仅只会好转或在现有基础上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略有前进。它们原来执行计划经济造成的“屏障”，资本主义的“留级生”地位，半生不熟的执政水平，都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恢复性经济增长。因此从长期来看，它们不可能很快具有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可能很快进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前列。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国家潜在的资产阶级形成的土壤不同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苏东剧变，工人没有反应。作为一个阶级，10年没有大的行动，这说明了什么呢？虽然苏东剧变以后，工人也组成了个别党派，但却没有整体性的阶级表现。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下生长长达70年的工人阶级，在面对剥削、混乱、没有饭吃、要面包的生存困境面前却出现这种反常表现，这是怎么搞的呢？显然，问题就在于，苏东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执政时还没有形成自己阶级的主体性。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自主性，为什么没有整体的阶级表现？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成长与成熟的问题。这种阶级性的成熟需要培养，也需要竞争的环境，而不能仅仅依靠其自发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对工人阶级的一个不良影响就是它弱化了工人阶级的竞争力和免疫力，它也不具备防止潜在的资产阶级产生的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现在主动引进了一批外资，培养了一批私营企业主，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资产阶层，这是培养工人阶级自主性、成熟性的一个有利条件，但也是影响工人阶级中产生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共产党执政既可能是帮助工人阶级成长、成熟的一



个有利条件,也可能是弱化工人阶级的一个条件。执政地位和市场经济这两个环境、条件给党与阶级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苏东经验提醒我们万万不可简单地、形而上学地判断这两个条件的优劣。这两个条件(环境)永远是无机的。而党与阶级永远是有机的。无机条件的优劣完全取决于有机体的认识与运作。在党与阶级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一定意义上,阶级性与党性是互动的。我们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苏东各国的执政党本身存在着严重问题,其党性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西方一些战略家认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之所以能够在东欧得手,主要还是得益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改革中,戈尔巴乔夫认为,“除非改变或者摧毁这个制度,否则它会完全破坏那种改变它的零散努力”^①。他的这个“新思维”都是些什么货色呢?一是“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高于阶级利益”。即“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沉。第二条诺亚方舟是不会有”^②。这实质上就是把自己国家的改革维系在西方大国的“支持”或“认可”上,以致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抽掉了。二是“民主化”和“公开化”。民主化就是只要民

① [美]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主,不要集中。公开化就是控诉过去的一切。他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两个概念,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特洛克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①。“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像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②“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③。“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绝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④。因此,“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⑤。而戈氏则“已经完全支持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明确无误地抛弃阶

① [美]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同上书,第758页。

④ 同上书,第758页。

⑤ 同上书,第169页。



级斗争观念”^①。三是“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出台之所以成为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前任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结果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从而为右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人道的”、“民主的”两个定语,实际上意味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倒退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理论上的一大错误。与这一理论相对应,戈尔巴乔夫甚至说,“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③。其结果正如马特洛克所说,“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推动着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④。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契合了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主张,以致动摇了党的思想基础,使党丧失了共同的信仰。戈尔巴乔夫把东欧看做自己“政治新思维”的试验田,主张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鼓励他们政治上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私有化,以致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长期过高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主观地超越苏联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造成社会

① [美]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② 同上书,第341页。

③ 同上书,第364页。

④ 同上书,第422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是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时代因素。早在1936年,当苏联虽然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一批具有较先进技术的重工业,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斯大林就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了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到了60年代,赫鲁晓夫曾宣布,“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这一代人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勃列日涅夫虽然退了一步,但仍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安德罗波夫认为苏联社会仍然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应该说,5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弊端的暴露,改革成了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到了80年代以后,人民对这一要求的表达特别强烈。而戈尔巴乔夫开始正是由于迎合了人民要求改革的热望,一时受到热烈的拥护,以至于他在1985年上台时,被人们崇敬地称为“苏联的第二个列宁”。戈尔巴乔夫却不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逆转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在实践中把改革引向了亡党亡国的歧途。其结果,必然地造成人心失落,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足。

正是由于苏共长期没有处理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结果最终丧失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指导思想。党的指导理论的这种变化,必然造成党的性质、党的组织原则的变化。由于苏共多年来把共产党人的党性简单地归结为“纪律性”,这就不仅严重窒息了党的创造力,而且



当党的领导人发生变化时,基层党员除了顺从以外,竟然毫无办法。应该说,苏联党内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的集权制,使党内民主受到严重削弱,严重地损害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改变苏共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制,但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批判了他的前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态度,但他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实际上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公开化和多元化的鼓励下,苏联社会和党内出现了无限制的民主,没有界限的公开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组织涣散,整个社会呈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苏共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盛行,特权、腐败现象严重,造成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现实的严重背离,结果苏共不仅丧失了群众基础,特别是阶级基础,而且连党本身也丧失了力量。正像戈氏的助手瓦·博尔金所言,“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拥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①。“8·19”事变,是苏联共产党企图结束苏联国内危机、避免苏联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个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却未能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员群众的积极响应,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当戈尔巴乔夫非法宣布解散苏共时,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任何抵制,中

^① [美]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央委员会仅仅要求最后召开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但未获批准，也就销声匿迹了。即使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于是纷纷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直至今天，在俄罗斯政坛还有一定力量的俄共，仍然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因为许多人本能地把俄共与“极权体制”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剧变面前，没有重要的中央领导人振臂高呼保卫党的存在，没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活动，这个仍有1500万党员的党，昔日“社会的领导力量”，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瓦解，可见党的地位和威信降到何等地步。由于“公开化”把“是”说成“非”，把“美”说成“丑”，结果人民不仅丧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应该说，苏共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的建设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与市场经济“异构”的党建问题。1948年，温斯顿·丘吉尔对西方世界的忠告，同样也适用于我们：“非常严重的危险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一切——在于听任各种事情继续发展并积累起来，直到某几件事情发生，并在突然之间失去对它的控制。”^①自苏东解体以后，美国已经将它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目标之上。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

^① [美]汉斯·J·H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9页。



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①。那么,在这样一个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会步苏共的后尘吗?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②。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政策和党建的方针是否“兼容”?从苏东共产党的演变来看,我们党如果变化,最接近的可能是哪个层次呢?当然,把中国与苏东进行“改革”层次的对比,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我们认为,所谓“渐进”与“激进”等技术术语,都是次要的东西。甚至进行这种对比都是可笑的,因为不同质的事物进行方法层次的对比说明不了问题,反而会迷惑人。从现在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民族振兴的希望和巨大的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外环境影响下,党的内环境也在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性质会发生哪些变化呢?“三讲”应该说是在坚持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性质,即承认市场经济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而不是党建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党如果改变性质,也肯定不会演变成像英国保守党那样的老牌资本主义政党,而只可能像苏东那样演变为社会民主党。1980年前后,社会民主党开始成为东欧党内占统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② 同上书,第380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地位的政治力量,并在1989年抓住时机,实现了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它还会保留“工人阶级”、“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这些概念,但是却实质性地扔掉了阶级先锋队的理论、特点。例如,它反对暴力,宣扬议会道路,推行多党制,以超阶级的观点看待国家机器和国际组织,把“和平”时期的工人运动继续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曾在台执政的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都是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在这些党内,“非意识形态化”,推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平共处”,是其共同的特性。我们认为,“非意识形态化”只能作为一种外交词语来使用,而不能当成政治概念来理解。否则,一味强调“非意识形态化”只会模糊党的视线,自我解除武装,其危害决不亚于腐败。

由于苏联始终没有很好地认识和解决其复杂的民族矛盾,以致使民族矛盾在共产党的阶级性即阶级一致性一旦弱化后马上激化,从而加速了苏东剧变。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共产党一直拿着“民族独立”、“民族运动”的旗帜。五六十年代,我们还使用“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强调“民族解放”、“民族独立”。60年代,这一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但是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仅“民主”这个旗帜被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拿走了,含义被抽换了,“民族”这个旗帜也被抓走了,成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干扰的一个手段。在巴尔干半岛,国际垄断资产阶



级使用“民族分立”这个概念肢解了南联盟。西方的预言家也早就曾经提出，“民族主义注定要成为阻止共产主义继续前进的障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抓住了“民族独立”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民族矛盾在国家矛盾、阶级矛盾重要性中的对比。回过头来看苏联的民族政策，在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面前，是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在政权解体上没有太多值得检讨的地方。然而，问题在于，在东欧问题和民族问题上，当美国不断以“不能动武”威胁苏联当局时，苏联保证“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都不会动武”，从而捆绑住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脚，未能及时地采取“民族和政治问题分离”的新政策，从而有效地赢得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主动权。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深记取的。

在现代社会中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阶级矛盾是民族矛盾的实质。只认识实质，不解决表现形式问题，往往会犯“左”的错误，起码会犯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毛病。只认识表现形式，不抓实质，往往会犯右的错误，起码会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毛病。研究苏东问题，不能离开中国自己的经验。仅仅拘泥于自己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是思想封闭，是土教条。完全离开中国的经验去认识外国的经验是无根基的，是洋教条。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有丰富的经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有将阶级矛盾作为民族矛盾的实质问题，历史的进步与落后才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只要共产党坚持自己的阶级性，就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一定可以用阶级的一致性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只要共产党坚持自己的阶级先进性，就一定可以取得驾驭民族矛盾的主动权和领导权。70年前，苏联从沙俄手中接过的民族矛盾要尖锐复杂得多。70年中，苏联在解决民族矛盾上干过错事，但干的好事是其历史上最多最大的，是今后资产阶级永远干不出来的。现在把这个问题看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符合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图，既可以向原苏共泼脏水，又可以迷惑今天的共产党人，降低共产党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自信心。

那么，在苏东剧变中，社会主义被抛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占世界陆地 1/6 以上的这片国土上发生的悲剧，我们还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恩格斯说得好：“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① 因此，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事件，是由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产生的一个总结果，有其特别复杂的内因、外因。马特洛克认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最终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①,可见外因是个次要原因。然而,“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②,怎么说解体就解体了呢?过去我们说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问题,计划经济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是苏东剧变的关键原因。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没有着眼于发展经济就会解体,那如何解释古巴、越南等的存在呢?为什么地球上那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很慢不会解体?不会自发地变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苏联解体这十年,经济一塌糊涂,俄罗斯并没有自发地回到社会主义?笼统地分析“经济”原因,不分析经济中的阶级利益,不讲政治,不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恐怕不能自圆其说。过去我们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有问题,它不符合民族独立或者“分立”的总趋势。如苏联分裂成十几个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成六个小国,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正闹着要从南联盟分裂出去,似乎符合了某种“趋势”。但是世界上有民族问题的国家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为什么解体偏偏出现在这些国家?联系到“民族独立”这个旗帜被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拿去这一现实,现在看来,这也不是什么主要原

① [美]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85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因。

那么,最关键的內因是什么呢?在分析事物变化的原因时,找一大堆因素平摆并列在那里,等于没有找到原因。尤其要防止错误地总结教训,南辕北辙,上了别有用心者反向引导的当。正确地认识别人涉及到正确地认识自己。苏东垮了,也不是什么都错了;我们没垮,也不是什么都对。能否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否依客观规律,依内在联系将诸多因素组成有层次的结构,能否从现象到本质,这是能否真正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关键。看来,工人阶级能否成为自主的、成熟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能否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能否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脉相连”,有没有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恐怕是更关键的因素。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4月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而且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因此“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瓦·博尔金也指出:“如果党没有在这场改革中被削弱,党的领袖不那么腐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科学技术改造速度不那么缓慢,那么无论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任何什么人,都不可能搞垮这个国家。”^①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共产党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关于苏东剧变十年来的一些反思★

只有认真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才能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减少曲折和弯路。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认识历史,其结果肯定是“后人复哀后人矣”。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五四运动与改革开放

——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

1999 年是五四运动 80 周年。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刻,在迎接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纪念和回顾五四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时刻,我们可以站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新的高度对五四运动的意义进行再认识,把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进一步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共同点,思考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 21 世纪。

一、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是 20 世纪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伟大转折

20 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100 年,是中华民族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 100 年。100 年来,经过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



义制度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赢得独立和解放,并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

100年的沧桑巨变,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恰恰是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①五四运动是在实现前一任务过程中的伟大思想转折,是中国人民为求得独立和解放,经过79年的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之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开始,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是失败和成功的分界线。改革开放则是在实现后一任务过程中的伟大转折,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上,全面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历史时期。

五四运动是当时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就一次认真的宣传,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初步掌握,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产生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形势,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五四运动与改革开放都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任何成功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正确的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五四运动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旧道德,表明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气概,标志着中国人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全面觉醒。改革开放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冲破理论禁区,大胆实践探索,进一步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趋势,开辟了一条符合客观规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没有 1840 年到 1919 年的曲折摸索与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五四运动;没有 1949 年到 1979 年的曲折摸索与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拿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因之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 1949 年的胜利,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



因之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功。总之,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没有站在人类历史前沿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如果没有站在人类历史前沿的正确思想作指导,像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这是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共同点告诉我们的。

二、五四运动的进程和改革开放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方向,最基本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框架,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而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势。简单地说,就是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学习、利用资本主义。这种辩证的发展方向,这种一元为主体二元并存的社会结构,最早的根据就蕴藏在五四运动中。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则分为两个时期。从1915年开始到五四运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当时中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大力倡导民主、反对独裁专制,大力倡导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进行资产阶级的文化启蒙,给辛亥革命作了一次思想文化上的补课,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性变革。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中国,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曾经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的历史性选择。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它起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即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成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即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种集人类思想解放史上的两步历程于一次的特点,包含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规律,就是既要完成资产阶级的任务又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样两个互相交织的进步任务,就是要在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进程所显示出的这种二重性质,这一重要历史特点和内在规律,是由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时代规定性所规定的,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事实和现象都是这一客观规律的表现。例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是首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使命上,明显地表现出“一身二任”的情况,既要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又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同时,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的胜利、前进与“左”右的曲



折,大都同能否正确认识 and 对待这一特点和规律相关。

20世纪最主要的旋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如布热津斯基这位坚定的反共专家所称,20世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大搏斗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20世纪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首先争得独立和解放,进而实现繁荣和富强。要解决这个世纪性的时代主题,中国应该走什么发展道路呢?中国能走什么发展道路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又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是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此前几十年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在世界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训下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已经得出初步的正确结论。五四运动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改革开放又继续证明这个回答的正确性。中国必须学习和接受民主与科学等内容的资本主义文明,同时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必须虚心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同时又必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为了振兴中华,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革命知识分子,而最终解决问题是要靠工农劳动群众。这一系列的二重性,这一系列的对立面的交织统一,这种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都是被20世纪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所决定了的。这也正是五四运动的精髓和真谛。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的环境中,对五四运动精神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的最显著特点和基本侧面,就是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并追溯到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纵观世界和中国的走势,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除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历史注定了振兴中华的过程,就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学习、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过程,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我们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大的失误和教训就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高估了社会主义的成熟度,忽视了向资本主义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急于建立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结果反而损伤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引进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从学习先进的生产力到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从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资金到全面对外开放,从学习市场经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学习资本运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新概念,以至向西方学习文化、法律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显示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容量和潜在的优越性。历史经验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可以而且应该避免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种国家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当年五四运动提出向西方学习和进行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运动,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历史意义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不能全盘西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才能真正富有成效地把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学到手。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表明,国际帝国主义不允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也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只有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是五四运动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框架,我们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胸怀和精神状态,更自觉地继承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方法以及全部资本主义有益的文化运用得更彻底,把我们落后的一课补得更好。同时,也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才能把外国的文明成果同自己的实际,增强民族自力更生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主义本身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并且清醒地对待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虔诚的学生总受到当老师的欺负的情况,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三、五四运动开辟的新的革命历史 进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 20 年,已经为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纪念五四运动,会很自然地感到,正是五四运动和由五四运动开始的革命与建设,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前提。

五四时期找到了现代中国实现进步的最好理论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



先进分子经多次摸索和反复比较,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才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国才在全世界众多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卓越地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革命胜利之路,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树立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100多年来的历史巨变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就是说,80年前的五四运动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领导力量。跳出具体的历史情节,把20世纪看成短暂的一瞬,我们会发现,这80年的一首一尾之间有如此多种的相通、呼应,如此多方面的内在联系、因果关系。我们会感到这是一曲和谐的历史交响乐,乐章旋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

五四运动本身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前多次奋斗的失败和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一条真理,就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的武装革命斗争,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新政权,改革开放才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伟大革命运动和今天的体制改革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目的是一致的,在历史发展上是一脉相承的,并且都是伟大的社会变革,但它们在方式上不同。前者是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后者则是用渐进的有秩序的手段调整社会的动力机制。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自我更新,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方式都是必需的。

改良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改良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我们共产党人否定的。改良一词有时受“改良主义”的影响也被部分人误解为一概不好。这真是殃及池鱼。在历史进程中,是使用革命的方式还是使用改良的方式取决于居矛盾主要方面的力量(比如说,当时的政府和执政党)是否能够通过自我改进,通过非对抗性方法自觉地完成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如果它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历史必由之路,历史必进之步,不能主动地推动社会前进,不能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这种情况,就必须革命,就只有革命。因为这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已成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绊脚石。如果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够正确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能够主动地领导社会解决矛盾,那么就可以使用改良的方式。我们党现在正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地位上,执政的作用现在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起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三讲”,自我纯洁起来,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不断地正确认识形势,正确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就会平稳地发展。改良方



式终究是社会成本较低,震动和破坏较小的一种方式。历史证明,只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1949年以前的中国问题,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决今天的中国问题。用改革开放的经验去指责革命的激进与暴力恐怖的“罪恶”,同用革命的理想与彻底性去嘲笑否定改革开放的谨慎与长期性一样,都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

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历史活动,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在20世纪的觉醒与更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在21世纪的繁荣和复兴。尽管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既有难得的机遇又有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五四运动提出的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今天正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沿着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中华民族一定会以更加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



纪念毛主席*

我们纪念毛主席,因为他使马克思主义真理跨过了差别巨大的国情与洲界,和最古老、最富于个性的文化结合、和最富于智慧的民族结合、和最有独立传统的社会结合,一举解决了几亿人的革命道路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发展。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发展了中国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国情的成功结合,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发展潜力,又证明了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开放性和发展潜力。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非常杰出、非常文明的一页;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从“外来文化思想”融入了中国文化思想之中,渗透在中国社会里。毛主席使中国文化思想水平通过这次巨大成功的开放,吸收了人类世界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成果,又重新站到了世界思

* 本文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应《人民教育》而作。



想发展史的前沿。

我们纪念毛主席,因为他在一度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组织了一支坚强的队伍,这支队伍经受住了最严峻的挫折的考验。这支队伍创造了最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诗,这支队伍曾经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天翻地覆地改造了这个积弱百年的大国。这支队伍形成了整套先进的组织原理、组织方法和组织作风,依靠这支队伍,这个国家形成了自己的脊柱和骨架,这个民族有了自己的神经中枢。

我们纪念毛主席,因为他运用最先进的思想,依靠最坚强的队伍,率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解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属于最一穷二白的国度独立和解放的问题。这曾是一场伟大的战争,留下了无数精彩、壮烈的战例;这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留下了无数值得学习的经验;这又是一项艰深的课题,说明了无数问题,又引出了更多的问题;这更是一部无比丰富、无比灿烂的素材,给今后文人墨客留下挖掘创作灵感的宝藏。

我们纪念毛主席,因为他最后走过伟大的曲折。历史巨人的跌倒也是向前扑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他身后尽可能正确地爬起来,就会从原来跌倒的地方再向前迈进一大步,甚至前进几大步。这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水平。

我们纪念毛主席,是为了发掘历史财富。他太急了,他领导的一代人一生干的事情太多了,历史的跨度太大了。很多历史段落可能是被压缩了。有的事情可能是把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阻遏因素估计过高产生了用力过度的问题。现在或者今后,还要找回来慢慢地展开,才能使压缩的弹簧放松,使历史的内应力释放出来,让中国社会更加平稳地前进。我们过去急急忙忙地跟着他赶路,很多事情来不及总结。现在经过了几个反复,历史长卷在折叠之后,就更有利于比较,更有利于回顾与总结。当好事后诸葛亮,才可能做事前诸葛亮。能够当好事后诸葛亮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崇拜过他,迷信过他,因为他过去的正确太多了。我们很多人热情地跟着他走入过误区。省悟和总结时,在心底无法分开我们和他。他的失误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功劳归于一个人和把过失归于一个人是同一种逻辑。伟大的失误之后往往紧跟着伟大的进步。如果我们尊重这些历史的联系,就不会浪费我们跟着他付出的学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个总结一直没有停止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已经使我们用加倍的进步在补偿过去的损失。我们纪念他,正是为了明天,为了前进,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让伟大接着伟大。

我们纪念毛主席,因为他是一名无畏的斗士,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呕心沥血,出生入死地战斗了一生,就像所有伟大的战士一样,生前要面临枪林弹雨,身后会留下泼来的污泥浊水。其中来自敌人的叫做诋毁,来自群众的叫做误解。战士的这份“遗产”属于这支队伍,需要处理,需要在纪念过程中,或者抵挡,或者辩解。只想继承前人光辉与利益而不想对“遗产”全面负责的接班人最后



一定会倾家荡产。

我们纪念毛主席,因为他重视教育,领导了新中国对旧中国教育的人木三分的改造工程。在所有伟大的称誉中,他独钟“导师”(teacher)。他热衷于讲授。许多论文都带有教材的特色。他对新人的培养,倾注了无数的热情与意见。但也因为他,中国教育受到过颠簸。分清一切良莠,既是非常困难的,又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纪念他,永远纪念他。



谈学潮和动乱*

一、从大学生的一些特点看学潮

近些年来,学潮已经成为大学校园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而且越来越向社会波及。今年的学潮则更进一步发展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因此,可以把学潮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加以研究。

学生无疑是学潮的主体。大多数学生参与学潮的初衷是好的,确实是想反腐败、反官倒。这些学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虑,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对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发生作用。但是,由于大学生的自然特点以及这几年形成的一些新特点,尽管不少同学的愿望是好的,这次学潮最终被利用几乎是必然的。

先谈谈大学生的自然特点:

首先,是“脆而不坚”。这里很重要的是生理因素。这几年的学潮往往是一股劲,而且是一股散劲,谁登高一

* 本文作于1989年8月。



呼就能起来,但是,往往起来得猛,落下得快,很难坚忍不拔地撑下去。有时候一场大雨就能冲掉40%至50%,一场大风就能刮倒80%。过去我当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有时打赢了球,学生就要游行,我们那时经常在学校里敲锣打鼓,到这个楼叫叫学生,到那个楼叫叫学生,等把学生都叫完了,走到校门口就不去了。为什么?累了。学生的政治热情,总是同体力连在一起,包含着很大的生理因素。毛主席早就说过,学生是一股先锋力量,但不是中坚力量。它脆而不坚。

其次,使命感很强,责任感很差。在整个社会运动中,在各种群体中,学生承担的义务是最少的,也应该是最少的。他们不但对社会不承担什么直接的义务,甚至在家里也很少承担什么直接、具体的义务。而权利同义务总是相符的,义务承担的少,权利也就相对的小。所以学生的权利与社会各群体相比较少一些是正常的。这是他们的年龄和社会位置决定的。这本来算不上什么缺点,但是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朦胧地意识到未来属于他们,又掌握一定知识,所以总有一股朝气蓬勃的劲,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又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的义务很少,所以他们的责任感很差。这样在他们身上就出现了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矛盾。使命感是宏观的、长远的、神圣的、慷慨的,是一种蕴积于头脑内的抽象概念,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献身四化、振兴中华”等,而责任感就不同了,它也必须同时是比较微观的、具体的,要落实到自己身上,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许多小事上。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所以,大学生经常出现言行不一,有嘴说人、无嘴说己的现象。比如考试作弊,弄得现在考场里都发 A、B 卷。

大学生不是反腐败吗?其实考试作弊就是一种典型的腐败,A、B 卷就是反腐败措施。现在考场上作弊,将来在官场上、社会上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作弊,只不过那是行政作弊,但本质上是一回事,这不就是腐败吗?所以大学生反腐败,最现实的就是从反对考试作弊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再次,吃捧不吃批。大学生们的热情固然很宝贵,但有时也很廉价。“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调动红卫兵的热情就是用捧的办法。那时经常是,下着瓢泼大雨,几万学生聚集在北大五四广场。江青出来后也不打伞,同大家一样淋着,然后上来就说:“同学们,我们的小太阳们,祖国的未来在于你们,希望在于你们。”大家一阵鼓掌,往下就什么谬论都听进去了。“吃捧不吃批”,不完全是自然特点,这几年放松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成了“特殊公民”,有些人更是千方百计想利用大学生的政治热情,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主要手段就是“捧”。

1978 年有个搞人才学的在清华演讲,第一句话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中国是多少岁的中国?”这话多刺激,还没有人从年龄角度评价中国,于是抓住了大学生的心。他接着又说:“中国是 26 岁的中国大学生(当时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但是你们想想,政治局委员里有 26 岁的人吗?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荒谬。”底下一阵掌声,下面再说什么也都能听进去了。青年人最怕的就是上这个当,



因为他们的使命感太强,很容易被几句好话搞到轻飘飘的地步。当时我曾说过一句话:“谁想靠吹捧来利用年轻人的热情,这个人一定有野心,一定心怀叵测。”后来不幸言中。这次赵紫阳也是只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在5月19日看望学生时说:你们是爱国行动,我们来晚了,你们怎么批评都行。这话是没有原则的。让大学生听着舒服,用这话赢得大学生的好感,肯定有其政治目的。

最后,大学生虽然天天喊民主和法制,但是他们的法制观念却淡薄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在这次的学潮中暴露得很充分。比如4月29日对话,跟袁木同志争论警察打人没打人。有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就说,这话问得太幼稚了,你只能争论那地方该不该派警察,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警察不打人?警察在法律结构里就是一种强权,是国家机器。

还有就是人身污辱。新华门前就曾有一幅大标语“龟不出头”。这话多难听,怎么能骂人?这实在是水平太低。到学校看看,大小字报上的人身攻击就更多了,从刑事角度都可以起诉的。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还使用了大量法人名义。打的什么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旗帜。这都叫滥用法人名义,有的后面还加上“部分群众”来凑合,有的连“部分群众”都干脆不要了。你是法人代表吗?谁允许你使用这个名义?

在李鹏同部分学生见面时,吾尔开希上来就说:“我们要求领导人不要说‘这是我个人意见’,‘这个问题我现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在不能定’。”大家知道,任何决定都要有法律程序,都要有民主,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经过民主集中制决定的。个人说了算那是独裁,提这种要求就等于承认你的对手是独裁者才行。

平等是现代法律的价值取向之一,大学生天天喊平等,喊平等对话,其实他们的要求很多是不平等的。

关于平等对话,这话本身就有问题。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法制结构中生活,一方是国家,一方是公民,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其实很多地方是不平等的。这是法学的基本观念。在全世界都找不出同政府首脑平等对话的一般公民,其实他们要找的就是那部分不平等,否则谁有权力解决他们的问题?另外,对话不是有条件的对话,其中有什么双方只能讲 10 分钟的话,要现场转播,还要人数对等,各出 20 人等,这种先订条件的做法就等于要求自己有一个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这种要挟式的对话,政府当然不能理睬。国家权力在公法中应居于最高地位。法律是有层次的,法律承认有高有低,承认有领导别人的,有被领导的,没有高低,社会就无法运转。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在公法上都是高人一等的,它是管理社会、控制社会的机器。一开始就要求同政府有条件的“平等”对话,是缺乏法律常识的表现。

辩论的一时胜负并不完全看谁手里有真理。头脑灵活,口齿伶俐也能占上风。脑子快的人发现对方失误就利用破绽,扩大战果,这里有一套技巧。大家都看过电视辩论,思维敏捷、口才好的无论他作为正方还是反方,都



能取得优势。但是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比学生年龄大,他们的思维速度当然比不上二十几岁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这在体育上叫不公平竞赛。公平竞赛应当是20多岁的同20多岁的竞赛,50多岁的同50多岁的竞赛。

学生们想把政治斗争变成一场辩论技术的竞赛,而这场竞赛又是不平等竞赛,这未免显得如游戏一样幼稚得可笑。

这次学潮,不管它别的问题如何,暴露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法律知识的贫乏是令人吃惊的。

还有对大学生的娇宠。那天我看电视,蚌埠市抓了个“高自联”头头,他是清华85届肄业生。我在清华大学当团委书记时,同他谈过多次话。那时候他狂极了。后来我去过他家一趟,他家挺艰苦。父亲是老工人,大字不识,就是为了供他上大学,让两个妹妹停学了,连初中都没毕业就干活去了。全家供养他一个人上清华。他考大学是蚌埠第一名,当时《蚌埠日报》给他发了一条通讯,他父亲用镜框把报纸挂在墙上供起来。结果上了清华,成绩一年比一年差,最后留了两次级,没办法,肄业了。为什么呢?他一进清华就看名人传记,他跟我谈话,谈到的全是名人说过的话,什么《拿破仑传》、《希特勒传》、《斯大林传》、《马克思传》……流芳百世的看,遗臭万年的也看。看完了他就不知到哪里想入非非去了。有一次他父亲来北京看他,他不让他父亲进食堂,让在宿舍里等着,他去买饭。他父亲想看看清华大学食堂是怎么回事,就远远地跟着。他吃完饭,一看他父亲在旁边站着,非常生气地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说：你别到食堂来丢我的脸。他们全家五口人住 15 平方米的屋子，后面是筒子楼，就把前面的窗子打开了，垫了几块砖，又当窗子又当门，全家就走这个“门”。然后把筒子楼的门前走廊隔出来，让他念书，他就是这么念上大学的。他父亲告他的状说：“他这几年大变了，不尊重我了。”他在一旁说：“你少说两句。你大字不识，鸡犬不如，狗屁不懂。”这几句话我记得太清楚了。后来我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反映他的这种意识。

过去讲“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有些过火了，但是，我是亲眼看到我们的一些大学生，忘记了抚养他们的工农和父母。我们的同龄人中只有 2.5% 的人能上大学，那 97.5% 的人供养着他们。2.5% 的人不尊重 97.5% 的人，怎么能行呢？其结果必然是不尊重工农，不尊重劳动，不尊重代表大多数人权利的法律，早晚要走到与 97.5% 的人对立的路上去。所以这次他被抓起来，我一点也不惊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上了大学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强烈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造成的人格的不平等，是造成大学生闹学潮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里也有我们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包括工作失误，不属本文谈论的范围。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削弱，对大学生太放纵了。法律上也是高人一等，一般的刑事斗殴致伤致死的，按一般法律程序办，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刑事斗殴事件就要从重从快处理，好像大学生是天之骄子，需要特殊法律保护。前一段报道外地打砸抢事件，总忘不了说一句：“没有一个是大学生。”似乎大学生就不会触



犯刑律,好像生怕惹他们生气一样。这就造成法律不平等。结果越放纵,大学生的法制观念越淡薄,越无法无天,最后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法制教育是一种行为教育,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放纵和镇压可能是殊途同归。

大学生的前三个自然特点是革命和反革命都可以利用的特点。但因为我们党认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稳定地改革、建设,不需要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形式了,这些特点反而屡屡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很多大学生总是喜欢自由化。

大学生的后两个特点,法制观念淡薄和特殊公民的优越感却是革命力量无法利用,只可能是反动力量利用的特点。反动力量也喜欢利用。但只要允许这种学生运动充分发展,这两个特点就一定会“搬起石头砸利用者的脚”。学生运动必然会失控。凡是利用事物的消极性做文章的,最后肯定是败笔,学生也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被利用、被发展而走向自我否定。这次学潮走向动乱,是上述一些规律鬼使神差地起了作用。

二、构成动乱的其他三种政治力量

这次从学潮发展而成的动乱,从现象上看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但在整个过程中除学生外,还有三支政治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社会的无组织群众、“地下”政治反动势力和党内高层领导中的反对派。这四支力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这次动乱不断升级,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破坏力。因此,分析这四支力量及其相互关系,是我们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社会的无组织群众。

这几年的历次学潮,大都以自由、民主、人权三个抽象原则作为口号。但前几次学潮一般群众基本上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这说明他们对那些抽象原则没有大学生那么大的兴趣。

这次却有大量群众从同情走向参与,这是过去学潮中所没有过的,他们在今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

这不是因为一般群众突然对民主、人权一类的口号产生了共鸣。从4月27日的游行可以看出,最激起共鸣的是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等口号。这就说明,驱使一般群众参与的,主要是利益问题。

这两年有个现象,有人形象地说,是“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每个人都可以找出比自己干活少,却比自己拿钱多的人来,于是大家都不满意。收入提高不多或者根本没有提高甚至下降的有一大批人,他们不满意,可那些万元户、暴发户也不满意。可以说,在社会各个阶层都郁积着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

这几乎是必然的。过去我们的社会相当稳定,因为过去的利益分配比例是长期固定的,工农大众是革命的



主要受益者,所以他们拥护党、拥护政府,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地主、官僚资本家是利益的最大失去者,他们必然心怀不满,政治上就成为打击对象。这就构成了国内的基本政治力量对比,拥护的多,可依靠的多,反对的少,打击的少。改革却大规模地迅速地调整着原有的利益分配,而且几乎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为了打破“大锅饭”体制,从根本上解决积极性问题,改革就必须从利益分配的调整入手,拉开收入的差距,加快调整的节奏,这是必然的,而且在改革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受益者开始变成失去者,每个人既是改革动力又是改革对象。加上工作中的失误,出现了“脑体倒挂”、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社会不满情绪增加,这是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这几年群众情绪变化的重要特点。

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个问题,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状态下,政府已不仅仅是各主要阶层的利益保护者了,作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节者,它对任何人、任何经济利益实体和集团都有管理和干预的义务,就是说,它同几乎每个人都是有矛盾的,在管理和干预过程中,它可能伤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这是公共权力的特点。公共权力调整全体人民的利益结构,但又必然以对每个具体人的管理限制为前提。从保护者走向管理者,必然使原来被保护者的心态发生变化,从失落感到不满,但这毕竟是国家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一个进步。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除了强调利益分配的作用,还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强调政治力量的对比。各个阶层普遍出现不满,这就使过去十分明确的依靠、团结和打击的对象变得模糊了。再加上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曾是放权,出现了权力真空,对于习惯了高度集中体制的人们来说,感到政府虚弱了,党虚弱了。而这几年放松了党的建设和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又加剧了这种倾向。

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改出大量的不满,放权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时的权力真空。这种主客观条件的结合,最容易滋生和泛滥无政府主义思潮,出现一个潜在的无组织群体。人民群众不会从根本上反对我们的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但当学潮造成的动乱进一步加剧了无政府状态,潜在的不满情绪就找到了公开宣泄的机会,形成“不闹白不闹”的从众心理。而大量群众的参与,又会在一个时期内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加剧了动乱,加大了制止动乱的难度。

而且这样的群众必然是无组织群体。他们数量很大,有人据此认为这标志着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运动,他们认为群众是不会受愚弄的,似乎群众的数量和热情天然地代表真理。其实不然。同情和支持学潮的群众虽然一时数量很大,但他们的不满是由不同行业、不同利益分配层次造成的,因而是各种各样的,而且他们的参与本质上是一种宣泄,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因而很难形成统一的目标和明确的纲领,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自发的无组织群众最没有能力代表真理。说群众天然地代表真理,就等于说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这是“文革”



中的口号。有人引经据典地说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当然是对的,但只说了积极的一面。人民群众在无组织状态下会不会成为历史倒退的动力呢?历史总是曲折的,总是有时前进有时倒退的,那么历史倒退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一个独夫民贼?只有历史前进才是亿万群众推动?这不合逻辑,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功劳和罪过都不是一个人的。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这个意思,他曾讲帝国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后来写《论持久战》时改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无组织状态。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所以我们党一向强调对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向他们灌输真理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群众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这是近代产生政党政治的一个历史原因。如果认为群众认识真理的能力是天然的,那就必然导致放弃对群众的教育和组织。这些年我们恰恰是放松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是一个失误,使一部分群众在特定条件下迷失了方向,被别有用心 的政治力量利用了。

所以,今后我们在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分配和政治力量的组织等问题上要调整认识。我们党这几年忽视了分配不公的问题,没有注意到分配不公的结果是政治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应该看到在对待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上执政党和非执政势力的区别。在野势力指点江山的“自由度”比执政党大得多,他们有许愿的自由,不当家不管柴米贵,反正他们不负责兑现。而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执政党就不能随便许愿,许了愿兑现不了,会招致更大的不满,更被动。所以在野势力可以是发散思维而不求解,执政党更多地是要求解的,是收敛性思维。执政党如果在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上不实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那就是不平等权力,不平等自由,就等于把自己放在天然被动的地位。

(二)“地下”的反动政治力量。

“地下”的反动政治力量是一股小力量,基本形成于打倒“四人帮”以后。“文革”前和“文革”中也有政治上的反对派,但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复搞政治运动,所以这股力量没有凝聚起来,形不成自己的政治队伍和政治纲领。打倒“四人帮”后,以“西单民主墙”为起点,这部分人就开始逐渐凝聚起来。用一些社会团体的形式,以一些刊物为基地,逐渐连在一起,政治上也取得相当的地位,使反动力量形成了政治派别,并经过三次学潮,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气候。他们同国外建立了思想联系、政治联系和经济联系。他们用西方的思想体系武装起来。但思想也很庞杂,因为西方的思想体系本身就很庞杂,各种流派都有。他们思想的独立性很差,稳定性很差,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今天是极端民主论,明天是新权威主义,同中国国情和中国老百姓都有一定距离。他们即使暂时当政也成不了气候。而且他们有一个致命弱点,即人生观基本上是个人的主义的。

在这次动乱中,他们的目标可以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成立合法组织,从地下、半地下翻到地



上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台阶，当然同时还有个否定“4·26”社论的问题。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合法化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反对派都知道公开组织和地下组织完全是两种能量，地下组织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公开组织，它的活动权力和活动范围都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取得合法地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低纲领。

第二个层次就是打倒邓小平和李鹏。因为邓小平同志坚决四项基本原则，李鹏同志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

第三个层次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杆大旗，是政治纲领。为其平反，就是要取得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绝对自由。

第四个层次就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在这四个层次中，他们在第二、三个层次上同党内反对派完全一致，第四个层次有部分一致。这两股力量只是相互利用，但一直有一定的距离，这同他们的政治目标的不尽相同有关。

政治反动势力的策略是：每当群众没起来的时候，就降低目标、降低纲领，同时提出反腐败、反官倒之类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作陪衬，以把群众煽动起来。等到群众一起来，一上大街，这个纲领就开始往上爬。群众热情一下去，他们马上就把目标往下降。这是他们的运动规律。地下政治反动势力这几年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他们有层次、有领导、有代表人物、有策略机构、有通讯网络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北京一闹,其他地方跟着一起闹,没有一个通讯网络无法做到。他们还非常重策略。4月26日以前,北大的大字报中辱骂共产党和中央领导人的话还很多,可4月27日一上街,口号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这很高明。还有这样的话:“妈妈,我们没有错。”这话很有人情味,老百姓看了顿生恻隐之心。

综上所述,这股政治反动力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他们同我们的斗争已经不再是学术性质的争鸣,他们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破坏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动用国家机器,一般是打不垮他们的。

(三)党内领导机关中的反对派。

它的形成同改革的目标方向有关。改革这个词不涉及社会制度,只是一种过程的说明,而不是方向的说明,只是同保守这个概念构成一个范畴的两个侧面、两种状态。在改革的旗帜下,完全可以站着两种人,围绕改革的前途和目标在党内就出现了两种方向的斗争。有人说这是党内的个人权力之争,这是不对的。最根本的是两个方向、两种制度的问题。

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社会主义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对于人民民主专政,至少公开反对的人不会太多,因为谁上台执政,专政都是必不可少的,叫什么专政倒不是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政治反对力量拿来作旗帜。打倒“四人帮”后,有一阵讲“异化”,“异化”就是青年马克思学派的理论。欧洲有些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他们要马克思、不要恩格斯,要青年马克思、不



要列宁。

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即使政治反对派上台执政,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他们也要打着共产党的招牌,也要掌握和利用这个党。因为共产党是个历史很长的、有4000多万人的大党,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层次,是个现成的组织机器,有一整套现成的机构和强有力的队伍,是任何人掌国家权力不可缺少的枢纽。何况许多政治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本身也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这个盒子也可装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欧洲有些共产党虽然名字并未更改,但做的已不是共产党的事了。

从这几年的斗争看,从方励之的“全盘西化”到所谓“最大失误是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反对力量攻击的主要焦点是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党内有深刻的原因。在西方资本主义渡过了“二战”后的难关重新取得了进展,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种种新的改革任务时,党内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主义到底灵不灵”的疑问,从而在改革的方向上萌生出不同的、有意无意背离或者修改社会主义的选择,而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党内的分歧主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就是党内高层反对派形成的基础。这次发生的动乱与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最终导致的赵紫阳分裂党有很大关系。党内高层反对派出现的机制与党的建设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在就有不少人提出:“总书记怎么会反党?党的总书记怎么会有问题?”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敌人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打垮自己,对敌斗争的胜利取决于对自己内部机会主义的清算。

简言之,一般学生、一般群众、政治反动力量、党内高层反对派这四种政治力量可以分为两类。前两种为第一类,他们有些像围棋中的“取势”,人数众多,有力量,但盲目性很大,一打就散,附和性强,易分化。后两种属第二类,他们像围棋中的“做眼”、“取地”,他们有政治方向,有策略性。第一类有力量但无魂,第二类有魂但无力量,最可怕的是两类力量的合流。

这次学潮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动乱就是因为这两类力量结合了。一般学生和一般群众的运动不是受共产党领导就受其他政治力量的领导。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凡是不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从来没有在历史上站住脚过。

三、迈向法治社会

这次风波的平息,死了人,流了血,一些群众情绪很激愤,对我心理上的震动也是非常大的。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为这次政治动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除了鲜血和生命外,还包括人民群众的内伤,它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一部分群众的政治关系。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如果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还不能迈上这个血和生命铸成的台阶,提高我



们的认识,那我们就太亏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课题,足够我们平心静气地讨论一段时间。我觉得所有对中国命运有责任心的人都该好好研究研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的认识应该迈上一个什么样的台阶?

(一)那些向装甲车砸石头的人是假勇敢,因为他们的勇敢是建立在军队不敢开枪的主观假设上,他们认为人民子弟兵不会向人民开枪。其实“人民”是抽象的,犯罪则是具体的。你越过刑事犯罪的界限,政府就有权越过当场镇压的界限,不管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军队是干什么的?哪个国家的军队只对付外国人,不对付国内人?没有,找不出来。军队就是国家机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教科书都说国家机器的首要部分是法院、军队和警察。而这些机器代表了国家的哪些职能呢?镇压,不镇压要军队拿枪干什么?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可许多人却有点淡忘了。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拿着砖头石块去砸装甲车,设置路障,堵军车?当然其中有些是暴徒,但也确实有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掌握的群众。他们的勇敢是建立在军队不敢开枪这个主观假设上,是假勇敢。

说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当然对,但只是事物的一面。解放军同时又是国家机器,是镇压机器。革命战争时期,党还没有掌权,没掌握国家,它不是国家机器,是造反机器。现在党执政了,它就既是人民的子弟兵,也是国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家的镇压机器。

外国人比我们懂这一条。5月20日一宣布戒严,大街上马上没有什么外国人了。不管是否赞成戒严,是否认为有必要戒严,反正人家比咱们懂戒严是怎么回事。后来,外国人又慢慢冒出来了——他们闹不明白中国的戒严是怎么回事,戒了半天跟没戒一样,老百姓都爬到军车上去了,又是动员,又是宣传,最后把车胎都给放了气,好像给军队“戒”了“严”似的。

人民子弟兵这个概念很重要,它是一个伦理型概念,是解放军本质的一个侧面。截堵军车时,有人说人民子弟兵要听人民的。谁是人民呀?你找找,找不着!谁都是人民的一分子,可谁也不是“人民”,因为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国家是具体的,是由一层层政府组成的,它的命令也是具体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军队具体行动时不能听“人民”的,只能听上级的。不敢坚决执行命令,不敢为执行命令而用最强硬手段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的军队是什么军队?先不说正义不正义,先说有用没用。那样的军队是没用的军队,只想当好人、当善人的军队是没用的军队。所以千万不能恨人民军队。因为军队的职能丧失以后,我们老百姓可就倒了霉了。到了国家需要动用镇压为维持的时候,它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这个国家不是危险了吗?军队是靠自己的荣誉感作战的,你要把军队的荣誉感给骂没了,给侮辱没了,你这国家离亡国也就差不多了。

有人问,当时不出动军队行不行?这里又要讲一个



政治常识。政治斗争,尤其是在中国的这种政治斗争中,在野的反对派绝不会半途而废,一般说来非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不可。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反对派是自己半路退走的,这次也是如此。本来说到了6月份学潮该慢慢结束了,北京大学生快走光了,“高自联”也意见分歧了,围观的人也少了。嘿,冒出了女神像。本来说广场上又脏又臭,没人爱去了,又冒出香港帐篷,很漂亮,还有个小窗户,一家伙冒出一百多顶。这意思是说我决心干到底。香港不是说要把广场变成新的民主的黄埔军校吗?所以是一副干到底的架势,根本不想撤退,非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可。你死我活的前途靠什么解决?只能靠力量对比来解决,而不能光靠民主、人心、舆论等。而力量对比的最后一招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动用军队。这次动乱发展到必须使用这种国家机器才能结束,是性质相当严重的一个标志,要是这招再不灵,那以后中国就治理不了。毛主席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政治斗争上就是这么回事,斗争双方的坚决性决定了问题不可能靠策略上局部上的妥协和退让来解决。

有人说那也不能向人民开枪呀。我说这是概念上的失误,说难听点是愚蠢。你是人民的一分子,可你阻挡了军队的前进,甚至使用了刑事犯罪手段,你的性质就变了。设路障,烧车,用石头打人,不要说对军队,对一般老百姓也不行呀。这是明显的刑事犯罪。用刑事犯罪手段达到政治目的,这就使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给这件事“翻案”,因为刑事犯罪是任何政权都反对的。就是那帮地下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反对派当了政，回过头来也要把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打下去。希特勒、蒋介石就是这么干的。希特勒上台时用了一帮暴徒，就是“褐衫党”，是一帮地痞流氓。后来依靠党卫队了，党卫队是有纪律的，他亲自带着人用冲锋枪把那帮人的头子杀了。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后，也把上海的痞三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刑事犯罪和政治斗争互为手段的时候，这个政治斗争就低级到了无法低级的程度，是任何政府、任何朝代都会惩罚的。

你越过刑事犯罪的界限，政府就有权越过当场镇压的界限。这种法律行为是对应的。法律是讲行为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搞了刑事犯罪，你就是罪犯，就要惩罚你。北京有些老百姓有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反正我是人民，我干什么都是“人民”，你不敢把我怎么着。这是一种愚蠢的优越感，因为它漠视了法律。

(二)我们国家的法制落后，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伦理观念太重，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取代了法律观念。行为是判断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对象和标准，行为越过了一定界限，就是犯罪，就要治罪。

现在流了血，死了人，可别再糊涂了，我们应该拿这些代价换得一些认识上的提高，应该通过鲜血和生命来复习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和法律常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法制的台阶。

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是用石块去阻拦装甲车？哪个国家平息骚乱时，死了 200 多暴徒或无政府主义掌握的群众，却又伤 6000 多武装的军人？这是个十分“荒唐”的百



分比。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军队确实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保持了高度的克制的,但也可以深刻地揭露我们国家法制观念和法制建设的落后程度。

“刑不对学生”类似于“刑不上大夫”。“大夫”是政府官员,是统治阶级里的人,犯了法犯了罪,法律上下不了手,最多弄个行政处分、党内处分。这不行,法律是不能以身份作标准的,你犯了罪,是阶级兄弟也要治罪。

在动乱中反映最突出的还是“法不责众”。这是一个更荒唐的非法制观念。法律不承认人多不多,只要行为有罪就治罪。这次正好相反,越是人多越下不了手,结果越是人多越犯法,人多就可以设路障,就可以拦军队,就可以烧军车。政治上要讲团结大多数,伦理上要讲善恶,但法律只承认法律标准,以法律为准绳。方励之利用的正是中国这种最落后的观念。他临走时给“高自联”布置两件事:一是要引导解放军多开枪;二是降低口号标准,多动员人。他就是利用了“法不责众”的落后心理。

我们国家的法制落后,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伦理型观念太多,而且地位很高,在实际生活上往往取代了明确的法律观念。像前面说的“人民”,这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个很有优越感的带有伦理色彩的政治概念。所以那些天老百姓不理解,总讲就是日本人进北京都没杀过人民,国民党走的时候都没杀过,甚至自打闹义和团以后就没杀过人民,这种优越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他们不怕法律,什么都不怕。6月5日,已经死了人,老百姓又“糊”到解放军戒严哨位那里去了。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妇女说：“小同志，你把这枪放到后面背去行不行？我害怕！”害怕你还蹭到跟前去？你还是不害怕呀！法律是一种以国家暴力震慑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就是得让你怕，让你有畏惧心理，才能实行。

“公仆”也是一个伦理型概念，也不是法律概念。从政治上说，我是公仆，因为我是人民选出来的，我得为人民服务。但“人民”是抽象的，具体到我那个机关，主要就不是“服务”，不是“公仆”了。我平常批条子，下命令让这部分人搬出这个房子，那部分人搬进那个房子，不上班的就下令扣工资，这不是“服务”，是管理。所以这时候我不是“公仆”，是管理者。这从法律意义上讲，就是官员。

还有“爱国无罪”，这也是伦理型观念。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爱国的，所以上街游行就合理，不管它合不合法。其实，“爱国”游行也得经批准。有哪一个国家的游行不经过申请批准呢？爱国也不能堵军车、烧军车。你要是烧军车，就是喊着“共产党万岁”，也要治你的罪。这才叫法治。

所以，“人民”、“子弟兵”、“公仆”，这些概念都是伦理型、政治型的概念，在政治上有意义，但在法律面前就十分含混，就不能用。法律主要承认行为。行为超过了一定界限，就是犯罪，就得治罪，不管你是“人民”还是“公仆”，是“爱国”，还是“卖国”。

我们这些年忽视了法制观念的教育，这就使无政府主义在动乱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发展到最后，就成为治安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混合型。为什么？就是因为现



在的无政府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人民群众”这件神圣的外衣,所以“天然合理”。如果大家都有法律观念,知道戒严令颁布了就得遵守,就不能上街,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优越”到、“爱国”到超越法律,那么那几天的事情就好办得多。所以今后的中国要想真正走向法制,区分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然无政府主义状态跟政府的软弱也很有关系。党中央的分裂造成了政府的软弱,在酵母发酵过程中,软弱就是温度,地下组织和刑事犯罪分子就是酵母,温度加酵母,短短一个月就发成一个大面团。当然因为是发起来的,有很多泡沫,所以很虚弱,一打就散了。

如果这次死了人,流了血,从伦理型社会迈向法治型社会,能迈上这么一个台阶,那这次巨大的代价就能够得到补偿,就是创造了政治上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机会。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

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善与恶

正确分析和认识这次事件,还要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善与恶。我们很多同志想不通,就在于头脑里只承认善,不承认恶,停留在道德评价、伦理评价的层次上。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决定真理的实现、决定阶级斗争胜负的,说到底是两个因素,一是利益,二是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力量对比。讲利益,就是看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谁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这是善,是团结大多数人的根本一条,这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每天做的大量事情。但光有这个不行,还要有恶的一手,那就是力量,就是国家机器,就是警察、军队,广义地说,还应该包括各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和行为规范。

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光靠善、光靠人道主义来治理的,必然是善恶两招并用,两个杠杆起作用,历史才能前进。黑格尔说恶也是推动历史的杠杆,马克思是同意这个论断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个外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不尊重人权。我说对,我们连第一位的人权——生存权利都不完全,这个权利只给第一胎,第二个就不行了,就被剥夺了。这就是恶。如果要是 11 亿人投票表决计划生育政策,我看很多人要投反对票。因为“恶”,所以这个改革招“骂”。农村乡长就讲,我们净干招人骂的事,乡长开门三件事,“人戴环狗戴牌,耗子洞里塞药丸”,这三件事只有“塞药丸”老百姓从心里赞成,前两件事都是要挨骂的,都是“恶”。

但从根本上讲,必要的“恶”往往是为了更大的“善”。这就是辩证法。不限制生第二胎,现在就是十五六亿人口,大家都得挨饿,这才是最大的恶。所以为了对现存人口,对今后的中华民族行“善”,就必须对第二胎行“恶”。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反过来,有些“善”倒是不好的,是保护落后的。还是



说计划生育,是恶中有善,第一个生的是傻子,就允许生第二个,这不是鼓励落后吗?对文化教育水平高的人,从优生的角度说,应该鼓励多生,可是越是边远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低的地方越可以生多胎,有人担心这样下去整个人口素质将呈下降的趋势。当然,这样的措施是迫不得已的,它涉及民族改革、“老少边穷”地区的改革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还有居住自由,这也是人权的基本内涵之一。可我们国家现在也不能无限制,无限制就麻烦了,大家都往城市里搬,必然会出现贫民窟,这样的“善”到头来倒是大恶。所以我们城里人实际上正享受着居住不自由这个“恶”带来的许多人权不平等呢。

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中间群众的立场和走向是革命胜负的关键问题。当中间群众跟着革命力量走的时候,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当中间群众跟反动力量结合的时候,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中间群众保护了反动派,这时候就要把他们分离开,把反动分子暴露出来,孤立起来。

不要以为共产党就不会失掉群众。我们党的历史上,每次严重的错误都失掉过群众。《毛泽东选集》上写着,井冈山根据地有过群众“反水”,就是群众带上白布条子跟国民党跑了,门都叫不开,伤员没人管,老百姓不理睬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先把中间群众与反动分子分离开。分离的办法是善恶并用。一方面为群众做好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分田地,这是用善来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感化、争取，给群众以利益。另一方面就是打，拿起武器来坚决打击反革命，不管你的成分是贫农，还是雇农。就这样恩威并用，才慢慢地争取到大多数群众，巩固了红色根据地，夺取了全国政权。

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也是用了这两招。有的解放军至死也不开枪，硬叫暴徒打死也不开枪，像崔国政烈士、刘国庚烈士，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个真相一播出来，就感动了许多当时也很激愤的老百姓，他们跟反动力量分离了，跟无政府主义分离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打。这样当然就错伤了一部分人。但中间群众是不会做无谓牺牲的，错伤了一些，他们就害怕了，跑回家里去了，尽管他心里想不通，但他一回家就好办了，把反动分子、暴徒暴露出来了。

有人说那都是老百姓呀。我承认是老百姓。包括一些暴徒，只要不行恶本来也是老百姓。可解放军消灭了800万蒋军，才解放了全中国，那800万就全是土豪劣绅？绝大多数是让国民党抓的壮丁呀，脱下军装，还是老百姓，还是农民，还是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哪！可你不打他他就打人呀，他们是被国民党用物质力量，用枪炮武装起来的异己力量。这次参与动乱和暴乱的老百姓，也是被武装起来的异己力量，主要不是用物质的力量武装，而是用自由化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武装起来的，用精神力量武装起来的。

有的同志说，那你可以说服嘛。对，能说服当然最好，但世界上不是所有的道理都能征服所有人的，没有什



么道理是万能的,能把所有的人都说服的。人的认识分成两类,一类是公理体系,一类叫定理体系。公理体系是实践性和立场性问题,是无法用形式逻辑证明的。这类问题是属于需要为信仰、追求而献身、牺牲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比如欧几里得几何,有个公理前提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不需证明,你必须承认。你要是不承认,那就是非欧几何,那就完全是另一套逻辑。所以公理体系的问题是不能光靠说服的,就看你信不信,这是个立场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有些人就得先在他背上猛击一掌,让他出一身汗,然后再去说服他。这就是解决立场问题,即公理体系问题,剩下的定理体系再慢慢去说服他。当时成千上万人围着军车,砖头瓦片横飞,情绪激愤到了极点,你能说服吗?说不服,只有先驱散了,先解决力量对比问题,再解决认识问题。认识问题是定理体系问题,是慢慢说服的问题。

什么是立场问题?第一,你爱不爱国,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不是应该放在各种其他利益的首位?如果你承认这一点,你就会认为干扰戈尔巴乔夫访华的行动不是爱国的行动。这是大前提,是立场问题。第二,你尊重不尊重宪法?宪法都不尊重了,四项基本原则都不要了,那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因为宪法是公理体系的起点,即一切行为的法律规范的起点,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逻辑,是历史既成事实的逻辑。第三,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不是要求稳定,需要不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来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这些都是公理体系的大前提问题。连这个前提都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谈不拢,那咱们无法争论,只有斗争,看谁斗垮谁。

总之,善与恶,人道主义与革命,这是古今中外历史的一个永恒的课题,所以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学题材。雨果的小说很大一部分是写哲学,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就是写人道主义与革命的残酷性的矛盾,善与恶的矛盾。里边写了一个朗丹纳克公爵,是个反革命,可是他很有人道主义,从着火的地方救出个小孩。这样讲“人道”的反革命该不该杀?追捕他的革命部队指挥官讲了人道主义,把他放了,自己代替他去死,这是人格高尚,还是叛变行为?雨果在他的小说中制造了一大堆这类深刻的历史矛盾和内心冲突。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承认在革命时期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无法实现,但他又留恋人道主义,他的结论是革命应该给人道主义让路。但历史恰恰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发展。法国大革命就不讲人道主义,充满了“残暴行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能按雨果式的人道主义道路发展吗?它要推翻的是一切剥削阶级,它的残酷性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阶级斗争。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高尔基找到列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是不是太残酷了?”列宁反问:“我亲爱的高尔基,您想两个人打架的时候,您能够分清哪一拳重哪一拳轻,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吗?”后来高尔基想通了,临走时说:“弗拉基米尔,我真是佩服你,你总是批评了人还让人高高兴兴地走。”列宁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就好了。”实际上即使想通了也很难让人高兴起来的。

这样的课题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里也有。保尔哥哥阿尔焦姆在打死德国兵前的一刹那，下不了手。他想这个德国兵脱下军装，也可能是个普通农民呀。他面临的也是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善与恶的矛盾。

当然，我不指望这番大道理能说服你们每一个人，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起码世界上还有一种人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问题的。你可以不同意，但你应当理解。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不动军队最好，不流血不死人最好，但是既然血已经流了，对这笔账就应该有个分析。我看第一个“债主”是自由化及对自由化力量的软弱和失策。如果政府早一点强硬起来，早一点按法制办，可能代价会小得多。这次的软弱跟党内一部分人对自由化认识不一致有很大关系，所以中央清算机会主义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个“债主”是腐败和官倒，是替腐败和官倒支付的代价。因为多数群众的初衷是打击腐败和官倒。那时候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混乱中无法解决。无政府主义状态只能产生更大的腐败。现在恢复了稳定，就要坚决搞好廉政建设、法制建设，不能手软。这是最关键的，是恢复对党对国家军队的信任的首要问题。当然也要解决其他问题，如物价上涨、分配不公，等等。

第三个“债主”是无政府主义，克服群众中存在的无法无天的意识，要加强国家意识、法制观念的教育。

还有国内的政治敌对势力和国外的反动派，这个我就不用了。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基辛格在一个美国杂志上问的那两个问题:为什么1789年欧洲的大革命发生在当时最富有的法国?为什么1989年动乱发生在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中国,发生在改革十年效果最明显的中国?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基辛格把这件事同1789年法国大革命做了类比,发现了这个必然性。我不能用准确的政治学语言来描述它,只能打个比方,就像生长快的孩子容易得病一样。这次动乱就发生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处在高速增长期中,各方面的比例很难一下子协调起来,所以矛盾多。发展太快了,选哪条道路都会有反对派。这种矛盾反映到党内,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政治生活领域,自然就会发生斗争。今后发展得快了还会有这种斗争的。我只是希望在今后的斗争中,不要再这么幼稚,付出这么大代价。我觉得,6月3日、4日以后的中国人如果还停留在6月1日的认识、4月15日的认识水平上,那样就太亏了,两个月的折腾就白费了,多少人的血就白流了。我们的认识一定要提高一大截,我们的国家一定要上一个新的台阶,那样才可能在今后避免今天这样的悲剧。不要认为危机都是消极的东西,危机也是一种调整,是一种治疗,中国的这场政治危机也会有积极作用的。关键是我们能否把握住它。



“四 句 话”*

1991年春天,在学生思想工作中,我们强调了四句话:“丑话说前头,枪打出头鸟,围观即参与,秋后要算账。”很多人问这“四句话”从何而来,做何解释。

我们向同学们讲:“丑话说前头”,“秋后要算账”,是法制建设的原则。首先,法制建设必须使每个人都事先知道如果自己有违法行为,其后果是怎样的。法制是不宽恕“以身试法”的。法律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丑话”。起码不像散文诗一样地轻松、温馨。其次,法制建设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是“秋后算账”的根据。既然“丑话说前头”了,“秋后算账”也就不谓言之不予也,这两句话是配套的。如果没有“秋后算账”,法制的严肃性也就没有了。当然,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执行校规校纪,还不是国家法律。但校规、校纪的建设原则和法制建设的原则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和同学们讲,防患于未然是对同学最大的爱护。古人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

* 本文作于1991年。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爱人以姑息”。这是能为大多数同学理解的。

我们的“丑话”很大一部分是特指“学潮”的。尤其是针对那些破坏稳定的政治性行为。1989年“六四”之后，我们在学生中反复进行了否定学潮的教育，反复进行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形势教育。学生对这些教育的最后接受程度尽管不是百分之百，但覆盖面确是百分之百了。每届新生入校后，我们对他们也反复进行了这个教育。我们维护稳定、反对学潮的道理都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都是从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在此基础上，我们相信我们的“丑话”能被绝大多数同学所接受，能得到多数同学的支持，客观效果也是如此。在今年的“六四”考验中，我们的“丑话”使同学们提高了政治警惕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是大手笔、大动作，不是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的“丑话”针对性最强的部分就是对“六四”的态度。我们强调，从北大情况看，“六四”问题已经国际化了，是国际阶级斗争、国际政治斗争的一环。如果说1989年4月、5月份还有一些人对其性质认识不清，认为仅仅是动机和效果不一致的话，那么经过一年多的政治教育，经过东欧剧变的提醒，再看一下“六四”后被捕“精英”的供词和逃到海外的动乱“精英”的表白与表现，问题应该能看得很清楚了：“六四”深远的政治性质是反动的。“六四”已经成为国内、国际阶级斗争中争夺政权必抓的一个现实题目，一个口号。在两种评价的后边隐藏的是两种制度、两条路线的问题。“翻案”就意味着“翻



车”——社会主义制度的翻车。今天认识“六四”的性质是绝不能有任何含糊的，绝不能有半点东郭先生或者是宋襄公式的想法，所以要“秋后算账”。

“枪打出头鸟，围观即参与”也是从法制建设的原则出发的。法制重在事实，法律以事实为准绳，强调客观效果，强调行为。我们承认，同学中有些人对“六四”的看法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我们也允许思想变化有个过程。我们也承认，会有少数人的认识一辈子都转变不过来。不管是哪种人，都必须先管住行为再说。海外自由化力量渴求的是行为，是聚众闹事的社会性行为。管住行为是第一仗。所谓“出头鸟”就是第一有行为了，第二带头了。总结过去历次学潮（近10年），有四个重要的技术性因素会使学生跨过种种行为界限——（1）场面，（2）领袖，（3）组织，（4）谣言。乌合之众如果没有登高一呼者是不会趋之若鹜的。其实，参加过几年学潮的人很容易理解“枪打出头鸟”是为了保护大多数。这话乍听很凶，其实大家知道这里的善意和苦心，既然已经是心照不宣了，那么便一点就透。

“围观即参与”是吸取去年的经验。1990年“六四”有千余人在校园内游行，其中绝大多数是围观者。但“美国之音”不区别你的动机，它的宣传按现场总数说。这不就是“围观即参与”！学潮现场的临时控制首先要解决多数人的行为问题，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看热闹、凑热闹的人一开始总是多数。客观上，起初他们是少数挑头者的掩护层。然后很容易被大场面和大场面中流行的谣言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所裹挟,成为挑头者的情绪性跟随者。聚众不一定闹事,但闹事必须先聚众。一旦聚众之后,预热升温往往只有十几分钟,所以最好千方百计地防止聚众。

我们反复对同学们讲,海外自由化力量最喜欢、最容易利用看热闹、凑热闹的围观者夸张事态、强奸民意、移花接木、做假文章。我们应该爱护北大荣誉,不要让他们歪曲北大形象,利用少数人达到他们险恶的政治目的。因此在行为上一定要拉开距离,以分清阵营。同时,这样做也防止围观者事后说不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代人受过。

过去历次学潮(近10年)中,我们往往允许甚至要求学生干部到学潮现场去做工作。实际上,在混乱的人群中,学生干部做工作的可能性极小,反而徒增其势。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法制原理,即使是反对学潮的人,在行为上也无法分清。所以,我们这次预先严格要求学生干部,无论遇到什么动静也不要到现场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宿舍里、教室里稳住同班同学、同系同学。这是他们最容易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现场留给老师和干部处理。为了严格执行“围观即参与”这个指导思想,必须处理好学生干部的行为要求,他们是我们的依靠力量。

现在闹事的因素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一批还会产生新的一批,而且很多矛盾不可能马上解决,尤其不可能仅仅依靠思想工作去解决。所以,百分之百地以理服人是不现实的,法制建设中还包含着以力服人的含义。我们应该坚持不遗余力地做思想工作,永不懈怠,但



也决不能以此为万能。思想教育解决依靠大多数的问
题,法制建设解决打击少数人越轨的问题。

从现在看,这“四句话”的主要效果是好的,今年
(1991年)“六四”尽管有数十名外国留学生手提酒瓶围
着我们学生宿舍呼喊挑唆到深夜,但学生们没有下楼,拒
不理睬^①。当然,今年“六四”的平稳首推大气候的改善,
其次是思想教育与综合治理。但这“四句话”的技术效果
也很好。而且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去年、今年“六四”前
后,对少数破坏稳定的人我们确实予以了严肃处理。

这“四句话”在贯彻过程中,也曾有些好心的同志包
括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志有所不解。有人说:
“围观者有围观的自由,围观与参与的动机不一样,不能
等于。”我们有时从电视上看西方政府处理游行事件时,
设很宽的警戒区,警戒线用油漆标出来。看来他们也要
把“围观”和“参与”从行为上拉开距离。校园内无法这
么严格地做,自然就会有人利用这种混沌来扩大事态。
斗争不针锋相对是胜利不了的,我们为了防止这种混沌,
也只好把对行为的限制范围扩大一点。

有人说“摔瓶子”,叫嚷几声,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们中没有敌对分子,不应采取制裁态度。“枪打出头
鸟”,“秋后算账”,都是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我们姑且
不争论有没有敌对分子,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是政治学中的概念和方法,这种分析系统和法制分析

^① 见6月10日新华社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系统不完全一一对应。自由化力量在 1989 年学潮中不就是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动群众情绪,逐步升温,先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做阶级斗争文章,形成气候,最后做敌我斗争的政权文章的吗?原则的分析上可以粗线条地大致地分个敌我。操作上必须细线条、小台阶,用法制办法防微杜渐。

有人说:“这‘四句话’缺少政策界限,听起来太刺耳。”政策是条款陈列一大篇,早在那里放着呢。做群众工作不能像庙堂夫子,四平八稳、语焉不详,说话不刺耳记不住,说话生动一点可以不胫而走。

1990 年 3 月份,东欧事变甫定,国际自由化力量得意扬扬,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六四”再攻北大。北京市委研究室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我们提出的意见中包含了三句话“丑话说前头,枪打出头鸟,秋后要算账”。1990 年 6 月 4 日之前形成了现在的“四句话”,北大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今年即依此贯彻。不想《美国之音》的耳朵长,他们今年 5 月底就广播了,并添油加醋,称北大党委传达中央政治局四条指示云云。“出国转内销。”国内有些大学党的工作者听到后十分诧异,急忙打长途电话来问“我们怎么还没接到这个文件”,一时沸沸扬扬。所以只好事后多解释几句。当然这只是我们工作中极小的一部分内容,而且具体实施之时,还有很多须谨慎之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政经异构 阶级谱系和社会差异

一、政经异构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给我们带来了不曾面对的问题。如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幽灵在世界徘徊的欣喜心情一样,我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高兴,但是在高兴的同时也不能不引发我们为新的社会命题而思考。

首先是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出现的社会异构现象的生成。“异构”是与“同构”相对的一个概念。就“同构”理论而言,它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普遍但又不容易为人觉察的社会现象。在一般社会运行的机制中,经济与政治是兴衰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论断即道出了这样一个总体历史发展规律。当然,在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也会出现例外。比如说,1945年前的德国就曾有过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不同步的异构现象。但综观历史,同构规律是主旋律。从人类经历过的社会制度来看,统治者都是富有者,反过来权力又成了财富的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保证。中外历史告诉我们,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实质上是贫富悬殊的经济关系。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无不是这一关系的展示与证明。政治权力与金钱财富的关系也呈一种正比,即是说,权力愈大,所拥有的财产亦就愈多。“当官发财”就是对古代社会尤其是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集中概括。后来在文化领域,世人将“权力”当成为“权利”,甚至彼此不分,也从社会学的角度证明了我们的同构理论。

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同构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一个希望保持自我政权稳固的统治者也多是同构理论设计的继承者与完善者。历史的经验从来都是值得注意的,在阶级社会里,一个经验丰富的统治者会不失时机地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来构建同构机制,以使社会在稳定状态下正常运转。后者借鉴前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惯例:封建社会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对奴隶社会统治者的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对封建社会统治方式的借鉴,也都是在政权上“投资”。其中,这一以金钱作为扩大活动空间资本的“成本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更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经济与政治同构关系的严谨与完善,有钱者就是强者的逻辑就不证自明了。“谁有钱谁便是爷”的天下自然就是没有公理可讲的社会。强者统治弱者,大鱼吃掉小鱼的事例司空见惯。金钱砝码的倾斜使公正的天平打破了真理法则。这样,统治者也更容易对被统治者的人权进行“合情



合理”、冠冕堂皇地剥夺。对剥削者来说,用剥削的手段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是一种良性循环;而对被剥削者来说,不公平的竞争与自我力量的削弱则是一种恶性循环。

在通常意义上,这是阶级社会里必然的逻辑。但是,也有例外。就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而言,它虽然还不属于无阶级社会,然而由于它主张与实行的是平等、正义的社会制度,与历史上任何一种剥削制度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也就超出了同构的理论范畴。如果将同构与社会主义挂钩,我们就必须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阶段。固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阶段的政治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也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地位的,分配方式也都是基本实行“按劳分配”,但是这两个时段的条件与主导思想毕竟是有区别的。由于计划经济阶段不存在不合理的剥削,所以“公有制”就让人们在没有职位高低的政治制约里发生了“准同构”。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后同构”。前者是从性质上说,后者则是从时段上说。就这一“同构”的政治与经济契约看来,毕竟与剥削制度存在的社会有天壤之别。至少,两极分化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已经成为历史。巨富与赤贫之悬殊的不可能性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政权的市场化。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即使有同构的现象那也绝对不是标准式的同构。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就有了与先前大不相同的“政经”结构。鉴于我们在“公有制”的主体之外还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因此阶级或说阶层的分化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按照“阶级”或“阶层”的概念来说，富有的阶级就是占有有一定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占有资本的基础上以股东或说董事的身份出现，以按“资”分配的方式敛财、分红、积累，从而很快发展成为拥有强大财产和势力的阶级力量。“财大气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学术语。必须看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则是处于领导地位的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在国家政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的经济地位这时则完全取决于国家财政。为此，与个体经营的老板、外资企业的经理等人相比，这个阶级在经济力量的对比上就和“公有制”以外的“多种经营”方式有了较大的悬殊。一个与同构定律相反的“异构”现象出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权的拥有者个体在经济上不占有优势，而经济上个体占据优势的人士则是政权的局外人。在这样一个部分异构现象存在的社会里，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都会随时发生。其中，社会稳定就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下面，我们将结合社会各阶级或说各阶层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来分析新环境里的结构定位问题。这即是“阶级谱系”命题。

二、阶级谱系

谱系，泛指事物逐个逐级发展变化的系统结构。在



阶级社会里,无论是同构还是异构,各个阶层总是落定在一定的坐标点上。就人类已经出现过的历史形态而言,任何一个社会里的“两极分化”的两头都是少数人,而处于中间的中等人士属于多数。在政治上如此,在经济上更为突出。奴隶社会里处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自由民”,封建社会里处于地主与雇农之间的“中农”,资本主义社会里处于大资本家与贫困线以下的“蓝领”之间的“白领”。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也不例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毕竟是少数,而靠国家救济补贴过活的人也已不多。用现时的语言来表达,“小康”型的家庭居多。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谱系”之基本构成。

不难理解,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谱系是社会保持稳定和良性循环的基本前提。如上所述,由于剥削阶级社会里的政治与经济同构现象的存在,再加上统治阶级有意识地采用种种手段将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剥削阶级手里,所以社会的稳定基本就有了保障。这也是剥削制度消灭以前阶级社会能长期存在的一个“秘诀”,用中国文化主将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统治阶级的“治绩”。而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剥削制度的荡然无存就打破了原有的“同构”运作功能,从而社会的稳定也就不是依靠“经济”对“政治”的辅佐和怂恿。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法则在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带来可喜成就的同时,也打破了社会原有的安定与平衡。而社会的这一失衡又恰恰来自于部分异构现象的发生与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共同致富”的一个转型理论,这一部分异构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对其发展则是不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因为它首先让我们要面临一个基本命题: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那么在政治与经济出现大的反差的时候,社会不稳定因素会不会膨胀呢?尤其是在“两头”(这时的“两头”是政治与经济的两头)之在野的“一头”经济雄狮逐渐从胚胎、发育到成长乃至成熟的关口!

伴随着部分“异构”现象的产生,无权的经济实力派就会将那只无形的手伸向另一头。马克思在一篇评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文章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金银,虽然它只是那么小的一点东西,但它却可以将白的变成黑的,丑的变成美的。金钱与货币的效力绝对不是美丽的理论和正义的演说所能比拟的。所以,我们的理论就不能是空谈的理论,必须是能够限制这种“金钱”变味的实际理论。

以目前社会问题发生原理为例,金钱万能的理论正在演绎着腐败的可恶悲剧。腐败造成民怨,民怨造成上访,上访又容易在个别问题的堆积中形成民怨的合力,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异构”的世界里,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的发展:一是“两极”的形成,即是杜绝极为富有与赤贫现象的截然“对立”;二是必须避免经济力量雄厚者的政治“扩张”。历史证明,同构社会里的“中间”成分从来都是数量优势的占有者,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者,也不是社会变迁或说变革的主导者。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主动变动或变革大都发生在“两头”的阶



级成分。市场经济是“经济”的法则，资本主义是这一经济法则的极度泛化者。由于它在社会结构上的“同构”设计依然存在，所以这一经济“法则”对其仍然是正反馈机制。而在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法则发展生产力时，由于其“异构”逻辑作祟，则很有可能因此导致经济法则在运行过程中对政治领域的渗透。所谓经济法则，说穿了就是“钱”的法则。商品经济不但是“认钱不认人”的道德逻辑的变迁，更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之功利逻辑的实行。凡此种种，都为一部分人腐败提供了足够的“营养”。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加限制地任其滋生发展，这就不单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政权性质的变质也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总之，经济法则对政权领域的渗透以及“致富”的极化都是理论界必须注意和提防的命题。

我们提出这一论题是有一定逻辑依据的。在经济领域里一定程度上实行市场化无疑是繁荣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但是必须看到，过度市场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政治、教育、文化、法律等领域的侵蚀，则又可能带来极其不利的负面效应。在封建社会可以卖官鬻爵，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坦言自己花了多少钱捐了个多么大的官衔；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竞选也可以说是比封建社会高出一筹的隐形“贿选”。贿选与封建社会的捐官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运用同样是诱发这种金钱政治的因子。在中国目前县级以下的基层里，靠“送、跑、要”等借助各种“经济”形式进行的“拉票”、“逐权”行为已经成为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一个公开秘密。我们可以在报刊上经常目睹到这样一些怪现状。“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马克思的论文里经常使用的一个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偏正词组。金钱关系对政权的“权”“钱”交易之危害固然是“赤裸裸”的，与此同时，它对其他领域“温情脉脉”地潜人也是大有侵权、越界之嫌的。以受教育者的“成本”与“投入”问题为例，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从公费到自费，从少部分“试点”到“并轨”，还有将来的研究生教育的“自我化”都会对教育的“均等”机会提出质疑与挑战。这个挑战不是别的，而是工农这个一直被尊为主体的主人翁阶层还能不能掏出必要的“腰包”来。固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体人物也不应该是拿不起学费的贫穷者，但是谁能保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部分“异构”的社会结构不给政治上暂时占据优势的工农阶级带来遗憾呢？“初级阶段”是一个过渡性阶段，这时的按劳分配等原则很可能仅仅是在一些制度不完善情况的下倾斜。“脑体倒挂”已经是喊得不止一两年的“不平”之愤。很多在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下的主人翁并没有斤斤计较地索取报酬，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一生。他们的腰包虽然没有“大款”的腰包丰厚，但是他们的贡献就一定比那些靠钻法律空子起家的“暴发户”小吗？这样，在经济力量上相对弱小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却失去了很多因“成本”不足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在政治文化领域出现了市场的反调节作用。本来可以在教育机会均等条件下消解的贫富悬殊却因这么一个反调节而“世袭”起来，而且造成了新的恶



性循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义务教育的逐步实行与升级还是一个减少阶级固化的方针政策。

文化的市场化也很可能在一些方面使“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现象时常发生。文化一些方面的完全市场化如果不加以必要的制约而任其发展，那么文化“同构”现象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谁有钱谁就是爷”。这是什么逻辑？是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需要的逻辑和目的吗？谁有钱谁就可以在“民主”的名义下成为“竞选”的冠军，报纸上给我们的消息是，在贫困偏远的农村几元钱就可以拉一张选票。还有，谁的腰包鼓谁的孩子就可以进所谓的“贵族学校”。更有甚者，以自己的经济成本轻松换得一张教育成本（文凭）者也大有人在。如果上面这两样对大众化的生活还显得有点不疼不痒，那么以法律的市场化作例子就有些让人触目惊心了。法律的市场化可以使“谁有钱谁有理”成为现实。随着人类知识领域有知边缘的扩大，人类无知领域的边界也会随之扩大。同理，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来说，随着法律文化的完善与健全，社会上的法盲也会愈来愈多。同时，随着法律事务的市场化，人们打官司就必须通过已经市场化的“中介”——律师来解决问题。撇开种种人际关系以及其他关系可能给法律仲裁造成的障碍，因为拿不出相应的资金去请律师的贫者也会层出不穷。在这个意义上，有钱人的增多对贫者的人权都可能构成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出发，解决工农主体地位面临的威胁。一是要力避两极的距离愈来愈大，二是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要在政府行为上提出一套政策约束。政府行为如果因市场化而暧昧,就会随时将不直接代表工农利益的资本携带者引进政府机关。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由”机制,而这种机制在政府里的“自由”也就是腐败的根源。实际上,一个政权腐败的过程也就是自由化的过程。“异构”向“同构”的转换才是我们要首先面对的。资本主义的选举是对民主成本“投资”的过程,对社会主义来说,当“同构”面世时,政权的性质就力不从心了。毕竟,当民主生活市场化以后,“异构”是不堪“同构”的诱惑与演变的,结果只好让位于后者。

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一定要有量的规定性,这个“数量”足以使个体不富裕的工农与代表他们的干部队伍在整体上是富裕的。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整体上保持对新生资产阶级的同构关系可以减少部分个体“异构”关系造成的不稳定。有人以为公有制经济只要能够从经济命脉上,从产业的相关链条上占优势就可以了,数量上不用苛求;有人以为国家只要有财政优势就有阶级优势;有人以为退出市场竞争的国有资本也可以为“公有制为主体”提供数量保证。其实这种种“以为”都是用没有生命的生产力关系来代替有机的生产关系结构。二者根本不在同一层次,不在同一领域。离开阶级结构的分析,偷换概念是件很容易的事。

但即使“公有制为主体”有了数量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体为单位计,部分异构现象仍然给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给国企改革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课题。



防止两极分化,让工农阶级大多数也富起来是一个重要指数。即是说,减小社会个别阶层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及此,也许有人不禁要问:究竟怎样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差异论”呢?下面即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三、社会差异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们虽说要减小差异,但是绝对不是不要差异。即使是这样一个减小也是逐步的减小。邓小平理论中是有关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论断,但是大家别忘记了他紧接着还有“共同致富”的目的论。在小平同志那里,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理论关怀的终端。

为什么说既要减小差异又要保持一定的差异呢?乍看起来,这是矛盾的一对。实际上,这乃是如何掌握“差异”度的问题。根据阶级谱系结构理论,“两头小、中间大”稳定设计理论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间力量从来都是相对稳定、守成的阶层,他们一般不会充当历史变革或说变动的牵引者。只有“两头”的阶级人士才有执政的欲望和勇气。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就曾不断颁布与修订过反垄断法。防止“大鱼吃小鱼”带来的“两头人”逐渐扩大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为政府行为策划的上乘之作。就差异论的实质来看,差异是刺激人们在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自我的潜力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而创造价值的巨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定失业率的保持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暂时有利的因素。但是失业率的增长与过度膨胀则有可能给社会添加许多不稳定因素。这是对差异论的直观说明。

差异,是在不平等中追求平等的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动力产生的根本还是人在对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潜力挖掘。平均只能造成人的懒惰,正是因为有了差异,人们才在这个“不平等”的格局中奋力拼搏。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又不能将差异固定化。固定化的差异同样会使人自暴自弃。一个人若是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途,当然就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与社会作对,这也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值得说明的是,差异的固定化一是由于有差距不断拉大的机制,二是有正反馈的社会循环,三是有政权保护。所以在我们坚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思想的同时,又不可让其距离拉得太大。但反过来说,不让距离拉大,也绝对不是说距离愈小甚至趋于“0”为好。距离在美学中是产生美的必要空间,在经济学原理中则是自由竞争秩序的 necessary 前提。在历史上,农民造反、起义的事件的发生无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造成的,这也是将地位财产固定化的结果。陈胜、吴广当年在只有死路一条的情况下所爆发的义愤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种乎”就是对世袭制度的怀疑与不满。在差异中追求和谐,这是机会的公平,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平等。没有差异的绝对平等不但不可可能,而且还会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误入歧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逼



迫的结果,今天的社会机制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提倡:“先富”是首要的一步,“共同致富”才是社会稳定的平台和支柱。这与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所提倡的“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

让没有富起来的人看到希望,让富起来的人感到不努力工作就会失掉富裕,社会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在社会学,尤其是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这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问题。贫富悬殊的无条件膨胀,只能激发起阶级或阶层之间的仇恨心,从而在愤愤不平中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动荡。在以往的历史形态里,资产阶级社会学学者为统治阶级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社会稳定理论,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还处于经验摸索阶段的时期,我们的事业更需要一批学者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与阶级结构。



生产力要素的矩阵结构*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思想不仅对现实工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推动理论的进步上有巨大的创新意义。近来对生产力要素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

在传统定义中,生产力结构由三要素组成——劳动者(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第一位的要素是人。

现在,产生了争论:人和科技,这两个“第一”怎么摆呢?

观点之一是“乘数效应”说。生产力 = 科技 × (人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科技的这种“第一”位的意义,确实使之躲开了和“人”作伯仲之比的难题。不过,“乘数”

* 本文作于 1992 年 12 月。



在这里是转义,乘法关系是一种比喻。居“第一”位的事物还应有自己直接排列相比的对象,惟有如此,才更合乎逻辑要求,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也才能更具体地得到落实。

观点之二认为,传统“三要素”说是实体性要素,还应有非实体性要素。这两个要素系列不可比。至于非实体性系列的要素是什么,从现在已经给出的表述,看上去还欠清晰和集中。

观点之三认为,过去,生产力结构由三要素组成,“人”第一;社会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就逐渐成为生产力的一个独立要素了。现在,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结构中居第一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四要素”说,它并没有解释清楚人与科学技术的地位和关系。“四要素”说把人与科技直接并列,反而突出了二者在位序上的矛盾,并且僵化了这种矛盾——非此即彼。难道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因素永远不是“第一”位的?

观点之四是把人分了类,“蓝领”工人代表“主力军”,“白领”工人代表“先锋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反映为“白领”工人的作用在现代生产过程中成为首要的了。这种观点的长处是二者都兼顾了,两个“第一”在“白领”工人这个范畴中统一了。但问题出在“白领”未必完全代表科技力量,“蓝领”中也包含有科技因素。

观点之五认为,在战略上,科技是“第一位”;在战术上,人是“第一位”。其实,这种观点很难处理战略和战术的具体界限,原理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倘有人追问,为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什么战略上人不是“第一位”的,或战术上科技怎么就不是“第一位”的这类问题,只怕也难于答得令人信服。

观点之六认为,全生产过程包括劳动过程和非劳动过程,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力三要素组成里“人”是“第一位”的;在全生产过程(包括非劳动过程)中,生产力由劳动力、科技力和自然力三要素组成,在这三者间,科技力居首位。这种说法突破了生产力概念原来的约束,即不讨论潜在因素。但是,如果生产力概念的规定性变化了,就很难讨论出个统一的结论了。

观点之七索性认为,科技不是生产力基本要素。

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观点。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争论将使我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更接近真理的表达。

二

世界上凡有第一,必有第二,还可能有第三。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决定了事物必然有一定的结构。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论断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去认识生产力的结构,认识其各要素的相关性,认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研究其转化的条件和过程。

“具体事物是包含着各种矛盾的统一体,这就使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在科学研究中,人们从不同的侧面研究同一对象,也就是研究这个对象的不同方面的质。生



理学研究的主要是他的生理的质,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是他的社会的质。”事物的每一种质都有其相应的一种矛盾结构,都有一种系统性。客体的属性是无限多的,我们选择什么角度去认识,取决于主体的要求——主体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抽象出生产力的三要素结构,起源于其对单个劳动过程的分析。他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种分解的根据显而易见就是简单到可以直观单个劳动过程。

这种把生产过程等同于劳动过程的分析方法,有它特有的优点,也有它特有的局限性。

具体来说,在这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被分解为一个一个的劳动过程单体。而现代化大生产的连续性其本身就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在这种抽象过程中,生产力的一部分被扔掉了,动态变成了静态,所有要素都是实体的。所以在某一瞬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而现实生产力是活生生的,我们还需要有一种分析方法——在通过分解的方法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它的各个要素能在某一瞬间既是它,又不是它。这样才可以体现它们之间的动态转化。马克思也认为通过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

在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天才地创造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基本范畴。这是他之所以能获得许多重大突破的手段。在建立生产关系的要素结构时,他是面对全社会进行分析的。而在建立生产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力的要素结构时,却是对劳动过程单体进行的分析。两者的分析框架没有完全对应。如果将分析层次都对应到宏观整体上,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似应综合为一个要素。

生产社会化、专门化的高度发展使得单个的工厂往往只能完成产品的一部分工序。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从更宏观的社会层次对生产力要素进行新的结构抽象和分析。“现代大生产过程 = 微观生产过程(劳动过程) + 科技过程 + 流通过程 + ……”出于在如此宏观的范畴内抽象生产力要素的需要,我们是否可以把生产力分解为“科技 + 资金”等因素呢?在这里“科技”也包括管理、经营、财会等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意识到科技已经是生产力的独立因素了。比如,他们说过“科学已成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是财富的生产者”,“就是实际财富”,等等。在本文前面罗列的观点群中,观点一和观点二已经包含有类似的思想,即都意识到了“另外一个系列”的存在,且这个系列与科技密切相关。

但是,理论的严格不允许我们的认识仅仅止于此,更不允许我们用模糊性的语言去表述这一认识。我们需要明确地回答出这些问题:“另一系列”的要素都是什么——除了“科技”要素之外,还有哪些要素?当我们列出它的全部要素时,我们还需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惟此,才能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在理论上不再仅仅是一个天才的断想,在实践中更准确有效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劳动者(人)	劳动工具	劳动对象
科技	A ₁	B ₁	C ₁
资金(价值)	A ₂	B ₂	C ₂
资源	A ₃	B ₃	C ₃

横看成岭侧成峰。从这样两个角度看问题,保证了生产力要素分析的系统性,既有必不可少的对传统理论的精髓的肯定和继承,又有对它的丰富和发展。结构中的两个序列不存在“置换”与“取代”的问题,也不是相加的关系,更不是简单地并列成“六要素”,而是将生产力要素结构立体化了、深化了——这与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恰恰是相对应的。

在这个生产力要素结构中,“第一生产力”既不简单地是“劳动者”(人),也不简单地是“科技”,而是二者的结合——姑且称之为“科技人力”(A₁)。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资源(A₃)和“劳动工资”(A₂)这两个同样是结合的产物比较,“科技人力”(如高级技师、工程师、设计人员、发明家等)是最重要的。从宏观上看,我们的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正体现着这种认识。从微观运行上看,这种趋势也是明显的,很多企业都在努力减少一般工作人员,提高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经营人员等业务人员的比重,或下工夫提高职工技术水平。

同样,在劳动工具和新的三要素的组合中,我们也应该优先注意工具(设备等)科技含量(B₁)——设备的生产效率、生产质量,等等。而让工具的资金问题(B₂)——成本、外汇价格等和工人的资源问题(B₃)——货源、供货条件等服从科技水平的要求。如果一台机床的技术水平很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落后,即使很便宜,供货条件很好,我们也不能要。最近报纸上介绍了很多家优秀企业都是不惜血本,优先选择高技术水平的设备,以使企业生产处在高起点上,从而获得成功的事例。现代大市场的剧烈竞争使得企业没有时间去完成“猴子变人”的进步过程。企业的产品必须一生下来就会跑,甚至是一生下来就得和世界冠军赛跑。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余地让你去论证可能与不可能,这是一个不如此,就必将被淘汰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关于劳动工具的新三要素(B_1 、 B_2 与 B_3)的分析比较中,设备的科技水准应该是第一位的考虑因素。

以上是沿着“列” A_1 、 A_2 、 A_3 和 B_1 、 B_2 、 B_3 进行的简单比较。当然如果要细致全面地论述科技为什么在 A_1 、 A_2 、 A_3 , B_1 、 B_2 、 B_3 , C_1 、 C_2 、 C_3 三组因素的比较中都居首位,那是需要另一番专门分析的。这里不作展开,我们直接承认这一结果,用以说明矩阵结构方法的意义。

如果顺着“行”逐一比较 A_1 、 B_1 、 C_1 , A_2 、 B_2 、 C_2 , A_3 、 B_3 、 C_3 等要素组,则仍然可以用传统的理论得出符合规律的认识。

三

生产力结构中各个要素的位置与历史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识真理所选择的角度,也和历史条件、历史要求有很大关系。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原始积累是大问题。当时,尽管科技也是重要因素,但科技因素是服从于资金因素的。在我国 50 年代,有无资金也是首要问题,加之当时国内市场是封闭的,封闭可以保护低技术水平的幼稚工业,所以那时提倡“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人海战术”型的大会战。“大跃进”时期甚至用石头作机床的床身以降低成本。尽管这样做会牺牲科技水平,但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些甚至是不得不那样做的。今天,我国已积累了 2 万多亿元固定资产,社会资金量比过去大多了,市场也越来越开放。科技的位置也就逐渐提高到第一位。邓小平同志的思想都是配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和改革开放事业配套的。

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分析更适合于政治经济学体系,或者更适合于政治学体系;更有利于革命时期动员群众、教育群众认识到剩余价值产生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与物的对立统一;也更适应产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模式。我们设想的新的三要素分析更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操作、运行,更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模式,更接近于一般生产力概念,所以也更有利于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生产力结构的三要素,也可以归纳为两要素——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传统三要素可以归为“人”与“物”对立统一,新三要素可以归为“科技”与“资金”对立统一。三分法就变成了两分法。凡是用三分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法的地方几乎都可以发现一点逻辑遗憾。

	人	物
科技	A ₁	B ₁
资金	A ₂	B ₂

所谓谁居“第一位”的分析和判断,就是谁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分析判断。在人与物的矛盾中,人经常处在活跃的、主导的地位。在科技与资金的矛盾中,科技现已处于活跃的、主导的方面。所以普遍地讲,人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但矛盾的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这种转化包含地位和作用的转化。所以谁居“第一位”,必须是有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使人在生产力中基本上实现了主导地位。但从新的角度看,过去的一部分体制曾使得资金和科技产生了分离。孤立的科技力量只是潜在的生产力,形不成现实生产力。比如有的企业有资金缺技术,技术相对而言应是第一位。有的单位有技术没资金,资金就应该是第一位的。凡是改革搞得好的公司企业,往往都在二者的转化上有独到之处。这二者的结合与转化就是今天解放生产力的一个突破口。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了资金市场和技术市场,给二者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生产力结构的要素分析上,很可能还会有新的角度。这会我们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自觉,认识越来越深入和丰富。



巨人的肩膀*

艰苦奋斗是一种客观要求、客观规律,所以它带有永恒性。如果人类不发展,不进步,坐享其成,那么在有些地方还可以允许不艰苦奋斗,包括一些社会上的人如果不想前进,就可以贪图安逸、奢侈。但如果想前进,那就得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不外乎就是和大自然的困难做斗争,和社会的困难做斗争。要前进,做斗争,肯定就需要艰苦奋斗,而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可以说,容易走的路、容易克服的困难都差不多解决了,留下的应该是越来越难,所以人类想前进,绝不会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越来越弱,应该是越来越强。

过去认为是到了共产主义就可以安逸了,现代化就只用一个手指头按电钮了,这个看来是笑话。有人说,西方可以贪图安逸,而许多从西方回来的人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环境改变了,历史条件变化了,艰苦奋斗就可以消失了,不需要了,这也是不可能的。尤其像中国

* 本文作于 1992 年 3 月。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这样落后的国家,想要赶上去,容易的路,容易的事情都被先进的国家占据了,我们要挤进去,赶上去,那非要加倍地艰苦奋斗。用牛顿的一个比喻,后人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现在巨人的肩膀是越来越高了,爬上肩膀的过程也就越来越难。

从高等教育来说,也是这么一个规律。过去,几百年以前,高等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基本上就是科学的前沿,但最近 100 年来,本科毕业生离前沿越来越远,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刚开始是硕士毕业生可以到科学前沿,后来是博士生,现在又加了博士后。现在,三十几岁能学到前沿已经不错。科学史上,牛顿 23 岁发现微积分,但近几十年来重大的科学发现很少有在 25 岁以下的。发现年龄越来越高,这就说明,巨人的肩膀是越来越高,能够爬上巨人的肩膀的这条路,本身就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更不要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前进一步,那就更需要艰苦奋斗了。

现在教育界有一个很大的悖论、一个矛盾,就是想减轻学生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必须要学习的知识量又在增加,所以中小學生屡屡喊“减少学习负担”,实际上呢,从初中下放到小学,高中下放到初中的知识还是越来越多,过去小学不学方程,现在小学要学,就是因为高中要下放一些东西给初中,然后大学又下放给高中一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因为知识量越来越多,学习的路程越来越艰苦。

我认为艰苦奋斗实际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让青年人认识这个规律是很有必要的。



政治与科技*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老话题了,其中自然包括政治和科技的关系,翻来覆去谈了几十年。最早的提法是“统帅”、“灵魂”、“生命线”,近些年也有人从“服务”角度探讨过。

政治和科技是两回事,各有各的特殊本质,如果是相同的事物就没有什么相关性可探讨了。“左”的思路的错误之一就是抹杀了二者质的区别,只在量上区别轻重,于是闹出很多用政治力量直接代替科技力量、用政治简单地“统帅”科技的事情来。

但政治和科技又肯定是相关的。本质的区别带来本质的相关。二者在相关中各有各的位置,即形成结构。事物的区别与相关的对应正是辩证的统一关系。我们越是看到二者的区别,就越是能发现其相关性。

现实世界中,科技在飞速发展,政局也在大动荡中变化。这里就包含着某种相关性。现代科技研究与推广的

* 本文作于 1991 年。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规模越来越大,有些项目非国家力量支持不可。这就需要政治力量出面。政府可以调动和分配巨大的资源,如人力、经费、物资等。如果当年核科学家没有费尽心机说服罗斯福总统相信世界上会出现原子弹这么个怪物,恐怕原子能科技事业不会有现在这个规模。当然,在分配资源之前,政府要先对科技项目的前途、意义进行评价,尤其要从政治和经济价值角度进行分析、判断。这就是政治对科技发展的杠杆作用。有些科技工作者往往把这个作用称为“行政干预”而加以否定。又想要钱,又要减少这种干预,这大概是不可能的。资源分配就是利益分配。谁掏钱不事先想一想、事后盯一盯呢?干预不可能没有,关键是符合不符合政治经济利益原则,符合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

政治同时也是科技发展的体制框架,就像它是经济发展的体制框架一样。任何事物在社会中生存、发展都有个社会环境问题。当然我们最近一段时期关心得最多的是体制问题。其实体制并非是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如所谓“一包就灵”、“一放就活”等说法对科技发展来说未免太简单化了。但体制确实是个必要条件。这几年体制改革的结果使得大家都承认体制的框架对科技发展确实有一种轨道作用、指挥作用。体制不但可以导向,也可以加速或减慢科技的发展。

政治保证着人的社会生活的组织性、有序性。只要不是一个人、一张纸就能从事的科技活动,都需要政治来负责其中人的组织工作。科技项目的规模越大,组织层



次就越多,政治力量的水平就越举足轻重。人的管理就是一种政治。这个组织过程包括解决人的思想、动力问题,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都是几十万人参加的科技活动,其组织工作就是政治活动。现代大科技项目,一个项目就能体现出这种关系。小的科技项目是通过统计规律,通过集合,来体现这种政治和科技的相关性的。

科技只要踏入社会实践的范围,只要它会影响人们的利益,就会敲政治的门,呼唤等在那里的政治力量。政治是反映经济要求的超经济力量,是反映科技发展要求的超科技力量。如果政治力量不想改变现状,或者无力改变现状,那么在经济上,富的会越富,穷的会越穷;而在科技上,先进的会永远先进,落后的则只能永远落后。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处在落后地位,如果工人阶级政权不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就永远别想打破这个“马太效应”。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代表。”

其实,政治何尝不是科技的集中代表呢。集中是一种飞跃,是一个质变。通过“集中”,科技活动变成社会性实践,变成物质利益的变动。政治有这种“集中”的功能。政府、政党的组织结构都是金字塔形的。这本身就象征着“集中”的过程。政治文件、政治思想方式大量使用的是归纳法。科学的政治判断都必须以大量调查研究、社会统计为基础,归纳提炼出来。归纳的过程就是一种“集中”的逻辑过程。事物的现象只有经过“集中”才能表现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为本质,才能构成新的力量,才能和其他事物(比如经济)形成结构。

政治工作干部和科技业务干部应该多些相互的尊重和了解,这是政治和科技的相关性在人际关系上的要求。



探索社会主义艺术的本质

繁荣艺术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艺术工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他们所阐明的我们党的艺术思想、艺术路线、艺术方针,对我国的艺术事业将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艺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正确认识 and 把握艺术本质,将社会主义艺术推向历史的新高峰。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审美是艺术活动的感性基础。要想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艺术的本质,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出审美规律的客观性,揭示审美规律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就产生而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人却“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类对现实的艺术反映和美感的基本生理和心理条件,是在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在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人类千百万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条件变成了人所专有的东西,并且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而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称之为美感的東西,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是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一个老问题,审美是在实践中发生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与“人的普遍性的时间表现”密切相关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所以,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人类正是在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向现实转化,看到了自己的无限创造的能动性,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实践在现实中获得了积极的肯定,从而产生无比的热爱、喜悦和快慰。如美学家王朝闻所说:“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他说:“劳动作为人类能动创造的生活实践,产生了对对象的审美价值。”“美的对象,美的事物……之所以无不给人以或壮美或优美的种种情感感受,正在于它们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具体的生活体现。”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审美意识是社会



存在的反映,并通过积极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反作用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不同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是由其世界观决定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的主流审美倾向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历史主体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决定的。主体的价值观形成了审美主体标准。在阶级社会中,审美主体标准有可能与审美主体发生分离,审美主体标准就是统治阶级的标准。西方社会和中国 1949 年以前,实际上多数文艺创作是以剥削阶级为艺术表现的主体,表达他们的趣味和理想。同样是劳动、工人,在不同审美主体的眼中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根源于“对象化”过程中审美主体的审美标准问题。对这个问题文艺工作者要在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来解决。

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是哲学的基础范畴,也是审美规律的主要范畴。作家艺术家应站在本质与现象之间,站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去选择、发现、创作。“对象化”的文艺作品属于现象层次,属于客体。把本质对象化是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一种过程,一种链条,即文艺活动。文艺是现象对本质反作用、客体对主体反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凡是本质的,都是抽象的、普遍的、深刻的,也是简化的(干巴巴的)、一元化的、远离行为和实践(无操作性)的。凡属现象的,都是具体的、个性化的。现象比本质更加复杂,更可以多元,更丰富多彩,更有个性(特殊性),也更具有可操作的矛盾性。本质与现象之间有着曲折、漫长的联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这个联系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科学家和艺术家工作的空间了,世界也就变成非常枯燥无味。“左”的文艺路线曾经把形而上学搬到了这个联系过程上。主旋律大致是反映审美主体的要求,大致是对作家艺术家选择哪种社会成分作为自己文艺创作的本质力量提出要求。“多样性”大致是反映现象层次,反映对象化过程的要求。“二为”是选择审美主体,“双百”是对象化过程的主要方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文艺工作者要想艺术地掌握世界,需要正确把握“对象的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审美的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依存性。创作过程是一个审美过程,是一个把生活中体验到的美在作品中传达出来的过程。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在劳动、生产,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使他们的本质力量得以体现。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本质,使文艺作品真正对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来说成为他们的“对象”,有一个艰苦地挖掘过程——从现象到本质,又有一个艰苦地创作过程——从本质到现象。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化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丧失自身。”文艺作品只有深刻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本质,才能使他们从中肯定自己,从而感受到一种特殊的美。那些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文艺作品,由于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本质,所以无法使人民群众从中得到自我肯定,反倒会使他们从中“丧失自身”,不可



能从中得到鼓舞,获得信心,树立起主人翁意识。而且这样的作品由于违背了审美的基本规律,也不可能是好的作品。江泽民同志说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要文艺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自觉深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洪流中去,保持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把他们作为表现和讴歌的对象,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武装、引导、塑造、鼓舞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激励大家积极向上,不断努力,取得改革开放的新胜利。

是否把劳动人民即工农兵、劳动知识分子作为审美的主体来表现和服务,是正确认识什么叫主旋律的出发点,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的一个前提。生产者是生产力的最主要因素。把劳动人民定位为审美的主体来加以表现和服务,可以使社会主义文艺与生产力的结合更加一致,使文艺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艺术表现和服务的主体与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分离的,甚至有些地方可能是对立的。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让它辩证地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潜力。

把劳动人民放在美的主体地位上进行表现,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就是工人阶级在作品中的人格问题。人格最早是外部规定的,不是内在的。奴隶社会规定了一部分有人格的人是自由民,一部分没有人格的人是奴隶。当时的人格是社会制度规定的,是外在规定的一种法律地位。由于人类历史的进步,“人格”概念慢慢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规定性,但人格仍然有外在赋予的客观性。主人翁就是一种人格。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主人翁人格,有它外在的规定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展劳动力市场,工人要作为一种被雇佣的个体出现,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出现。虽然在公有制企业里,工人与纯粹的自由劳动力不一样,但是有相当多的工人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是处于被雇佣的状态。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工人阶级不是实际上的主人翁。从宏观上、理论上、政治上说是,从微观上、个体上、经济上说不是。世人眼里看到的不是对象化的主人翁,而是对象化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工人阶级还能不能成为主人翁呢?这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不管在劳动力市场上怎么出现,怎么被雇佣,都要有一种意识水平,即成为主人翁的意识与能力。应该说当前工人阶级从整体上讲还不具备这种能力,不具备这种人格的资格。这就是工人阶级今天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不是由它的内在性质造成的,是由于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出现等因素造成的。这使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作为整体来讲,还缺少主人翁资格。这是市场经济中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课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共产党的建设。共产党党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党,是因为工人阶级有主人翁资格。工人阶级能做主人翁是因为共产党执政。这是一个因果循环的链条,如果要使这个关系成为一个良性循



环,必须让工人阶级有能力成为主人翁。所以,文艺工作者要帮助工人阶级成为主人翁。只有工人阶级强大了,有了做主人翁的资格,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才能使生产力的最主要的要素活跃起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另一方面还要塑造一个有资格、有能力担当、驾驭这一切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什么时候工人阶级能够自然地、自发地、民主地、生生不息地产生这个阶级的组织者,产生这个阶级意志的執行者,什么时候这个阶级才是独立、完整、有资格掌权的工人阶级。帮助劳动者走上这个高度,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一个伟大使命。所以,文艺工作者既要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服务,把他们作为美的主体来尊重,又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批评他们的缺点,反映他们的问题,揭示市场经济对工人阶级的种种影响。不承认这个局限性,就放弃了教育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这个使命。对人民群众的缺点不是不能表现,对人民群众不是不能批评,关键是从哪一种角度出发进行批评。

把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作为美的主体来表现和服务,并帮助工人阶级在市场竞争中成为强者,具备做主人翁的资格,是当前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历史使命。

当今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存在所构成的多种矛盾。这个机遇可以说千年不遇,我们有幸能处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时代、这样丰富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文艺创作者应该珍惜并艺术地关心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这一历史机遇,以不辱自己的使命。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受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考验。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艺学到手,决不能固步自封。对资本主义文艺,不学习、不借鉴、不吸收是不对的,也可能是不会有大的作为的。但学习、借鉴和吸收,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要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贬斥和批判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并力求融会贯通,用学习借鉴得到的技术、技巧来表现生产、劳动和劳动者的本质,创造出民族化的优秀文化成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确实对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吸收,从中学到了西方创造的先进和美的东西。虽然我国现在还比较落后,但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风貌的变化已清楚地说明我国完全有能力赶上西方,因为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确实具有极大的活力! 我们有信心在物质生产上追上资本主义。在艺术上,我们也有可能大大地超过资本主义,因为目前资本主义在艺术上虽然仍有一些生命力,但已经很难超过自己过去创造过的高峰了。

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是最先进的,用这种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也应该是今后最优秀的、最先进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努力克服社会主义理念上的先进性和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创作出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来。资本主义文艺创作内容主要是局限在消费领域,审美主体标准局限在剥削阶级。社会主



义文艺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本质,反映的是劳动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产生的审美价值,这比封建主义文艺、资本主义文艺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更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尽管在艺术上社会主义文艺可能还有一些方面雕琢得不够,但在本质上,以表现劳动者、创造者的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文艺使主、客体得到了内在的统一,符合美的基本规律,这是社会主义文艺超越资本主义文艺的最大潜力。重复资本主义文艺的内容,仅仅模仿其文艺的技巧,永远超不过资本主义文艺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个潜力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汲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一切文艺成果的营养,为我所用,真正实现中西文化艺术的融合。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潜力真正实现这种融合。

为了推动当前的艺术创作,我以为有几个关系特别值得讨论:

一是文艺创作的内在与外在空间的关系。文艺创作必须有充分的自由空间。自由空间可分为外延自由空间和内涵自由空间。外延自由空间需要客观环境的宽松。环境的宽松有其历史的规定性,总会有一定边界的。内涵自由空间取决于文艺工作者视野的广阔,胸襟的开阔,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深刻等,这可以通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来不断拓展和挖掘。可以说,外延自由空间是有限的,内涵自由空间是无限的。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之所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派日趋繁荣的景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我们党在领导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实践中解放思想,打破“旧”的束缚,为文艺工作者营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即外延自由空间。当前,文艺工作者的外延自由空间是比较大的,基本上到了客观边界。文艺工作者不能一味地追求外延自由空间,而应从主观上挖掘内涵自由空间。“巨匠都是在严格的规矩中发挥其天才的”,这个规矩就是外延自由空间的客观边界,而巨匠之所以能发挥天才,在于他挖掘了内涵自由空间。这种挖掘需要投入,自由的大小与投入成正比。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更要注重靠自己的努力拓展主观的内涵自由空间。

二是文艺的教育性与娱乐性的关系。文艺具有娱乐功能,但是文艺的娱乐功能绝不是巴尔扎克批评过的那种“街头戏子”式的娱乐,即没有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只有庸俗和低级下流的娱乐。文艺的娱乐,应当是高尚的、丰富的和健康的娱乐,要同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在一起,真正做到寓教于乐。文艺作品不能仅仅迁就自然需要,对生理需求的片面描写应该提高到情感和道德的层面,文艺的娱乐性的产生和实现,本质上是一个审美过程,是一种审美活动。既不能排斥文艺娱乐性的存在和贬低娱乐性的性质,又不能把娱乐性同思想性、教育性、审美性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更不能把文艺的娱乐性从文艺的总体功能中剥离出来无限放大。文艺工作者都追求自己的作品能够生命力强一点,能够在文艺史上成为传世之作。而“意识到历史内容”,大的思想穿透力和卓越的艺术表现,正是作品“传世”的基本条



件。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作品的纯娱乐性,则极易成为一种艺术泡沫。尽管现实生活中有时也需要一点这种艺术泡沫,但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还是要把自己宝贵的艺术生命放在那种把娱乐性和教育性结合在一起的作品中,去追求艺术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总的来说是要促使人们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培养和陶冶人民的高尚情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当然,也要给人们在工作之余带来欢乐。”

三是积极与消极的关系。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世界和现实中的消极面,要会挖掘消极面上的积极因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无疑,我国确实仍然存在种种贫穷、落后、苦难、愚昧以及腐败现象,文艺作品加以反映和揭示,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对不能抱一种悲观情绪。因为在当今中国,这些并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如干部腐败是少数干部的行为,文艺工作者应该着重写好干部的勤政廉洁,写克服腐败的决心、勇气和办法。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是: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一种何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又是何等辉煌!如果对这5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漠然置之,不承认这是更加值得文艺工作者努力表现的题材,坚持已经被时代潮流远远超越的审美观念和评价标准,对于我们来说,将是一种历史的失误。现在一些文艺工作者在表现消极面时,显得全神贯注,得心应手,但是在表现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积极面时,则常常表现得“不善此道”,热情不够高,挖掘也不够深。我认为,其间的根本原因在于主人翁意识不够,主体性不强,或者叫主体性不完整。如果内心缺少对这种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就感受不到积极。现实中间肯定有阴暗面,如果把自己的主体性建立在阴暗面上,表现这些阴暗面,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这个时代的主体,就不可能让广大的观众、读者感受到力量,就不可能让这些主体在这些作品中得到自身肯定、找到主体的本质力量。描写一些消极、落后、丑陋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要克服这些弊病。但文艺工作者还是要通过认真挖掘,把积极面强烈地表现出来。

江泽民同志指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历史变革,正在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去描绘、去反映、去引吭高歌、去加以诗情画意地表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的翻天覆地的时代,新旧机制转轨中的撞击与整合,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喜悦和艰难,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世界各种矛盾的冲突与融会……对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无疑是一种强烈的昭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历史时代,它给文艺创作设置了无数的难题,也孕育着无限的生机,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历程,去深切地体察。我们应当投身到改革开放大潮中去,感觉时代气息,创作出足以透视这个时代、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从而进一步振奋人民的精神,凝聚民族的力量,激发社会的活力。



从电影《泰坦尼克号》看美国文化

一、“泰坦尼克号现象”

对电影《泰坦尼克号》，新闻媒体的“炒作”如海浪逐波，迅速将“泰片”的身价提高，形成了空前的热潮。同一题材的小说、论述、纪实文学、写真、画册、访谈录等层出不穷，在国外甚至形成了“泰坦尼克学”。全球性的“泰坦尼克热潮”把一股消费文化波浪推到了我们面前。

灾难与爱情、生与死的情结，冲击着全球票房。《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收入如今已经击败《侏罗纪公园》，突破12亿美元大关，获得了商业意义上的极大成功。应当承认，《泰坦尼克号》的制作，场面之宏大，情节之紧张，细节之丰富，演员之靓丽，导演之匠心，摄影之精良，确为电影史上所罕见。随着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火爆，全球出现的“泰坦尼克号现象”确实值得注意。

沉入海底已80多年的“泰坦尼克号”过去多次被搬上银幕，生死离别的爱情与面临灾难的无助一直是其重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点所在。在《泰坦尼克号》中，导演詹姆士·卡梅隆依然沿袭了过去的思路，不过他给予了这部电影以更多的浪漫，对人性和社会的矛盾也有更尖锐的表现。这部影片在赢得人们眼泪的同时，也给了观众很多的启发与自省。

时空转换是许多影片擅长的表现手段。就“过去”而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具有令人心碎的惨烈效果。1912年4月15日，号称“永不沉没的海上堡垒”和“梦之船”的英国豪华巨型客轮“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首次出航就撞上了迎面漂来的大冰山。仅一个多小时，就“冰海沉船”，2228人中只有705人生还。就“现在”而言，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编导着力把一个爱情传奇的回忆和这一灾难今天的探查完美地结合起来。世纪百年的时间对比，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历史厚重感。那千人落水、宏大惨烈的海难景象，在救生船下高高举起求救的千百双手，在视听感上无疑具有一种极大的震撼力。卡梅隆精心编织的露丝和杰克的始于船上、毕于冰海的爱情故事使影片摆脱了单纯记录事件的格局，也使它获得了前七部描绘“泰坦尼克号”的影片所不及的艺术魅力。为了强化真实感，卡梅隆在影片的开端导入了一位探宝人的真实行动。当打捞人员从真正的被海水腐蚀过的保险箱里取出虚构的露丝的画像时，老妇人就在似无半点虚假的真实环境中回忆起并不存在的往事，一切便顺理成章地被“真实化”了。尖端的摄影技术加上精细的制片工艺，《泰坦尼克号》第一次做到了将这巨轮华彩而又短暂的远航及悲剧性的沉没历程真实地加以再现。



导演对细节准确性的追求,更增加了其可信度。影片巧妙而细腻地把那颗“海洋之心”的神秘出没作为全片叙事结构的一条贯穿线索,再加上匹配了力求完美的视听表象,为我们的观赏带来了极大的愉悦。

《泰坦尼克号》艺术上的成功建立在那场真实灾难上的虚构传奇。好莱坞电影一向注重把人物放在首要位置上,在影片中两个男女主角的表演虽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其形象却十分动人。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泰坦尼克号》不能算是很成功的。例如,露丝、杰克和卡尔这三个人物在性格上都有些模糊,露丝跳海的行动缺乏行为铺垫,虽然她欣赏毕加索等人的现代派绘画,也偶尔谈论弗洛伊德,但缺乏像安娜厌恶卡列宁(《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行为依据。杰克这个人物“享受每一天”的及时行乐思想与他的艺术天才只有相得益彰才能显示他的可爱之处,但在影片中他显得不够高明、丰富。卡尔这个人物除了诬陷杰克及贿赂买命外,影片对其精神空虚、为人歹毒等,也缺少有力的刻画。虽然电影的整个情节是虚构的,导演囿于个人的视界在编导上也有疏漏之处,不少细节还有可以再挖掘的潜力,但由于《泰坦尼克号》的细节处理极其真实,又充分运用了对比手法,所以个别细节的跳跃,逻辑的中断也因影片整体上获得的巨大成功而为观众所默许。我们认为,个别细节缺断在整体对比成功时是允许的甚至有助于对比。艺术对比的成功,是《泰坦尼克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泰坦尼克号》努力组合多种对比的反差,各种对比一气呵成,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除了影片中性别的对比、一等舱和三等舱的对比、贫和富的对比、不同阶级的对比、感情悲欢的对比外,影片中还有时空对比、细节和宏大场景的对比、光色对比,等等。例如,巨大的空间对比,细部和场景的对比,使观众的艺术视界非常开阔,给人以壮美的深刻印象;极乐和极悲的对比,造成了观众的巨大心理反差和情感激荡;巨大的色彩对比,音响对比,再加上光特别是侧逆光的运用,使整部影片给观众以雕塑的印象,具有很强的艺术冲击力。

运用高科技制作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是好莱坞的一贯做法,《泰坦尼克号》更是以罕见的大投资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看后令人心潮澎湃。《泰坦尼克号》表明,90年代的高科技给电影提供的可能性几乎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例如,出神入化的电脑高科技运用,生动地再现了“泰坦尼克号”那雍容华贵的恢宏气度和沉没时那令人心悸的场景,让人既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又目睹了一段历史悬案陈迹的发现。它的大制作、大气魄,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财大气粗。在世界电影史上,作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影片”,2.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和现代电影特技的几乎无所不能的情景再造能力,营造了全片以假乱真的历史氛围,让我们看到了现代高科技在文化上应用的极限情景。演唱主题歌《我心依旧》的歌星席琳·迪翁,也有出色的表演。“我无法控制我的声音”,她说,“我在颤抖、在流汗。我能听见我的膝盖发出的声音。我几乎唱不下去了。”她唱着“惟一的爱,贯穿我



们的一生,直到我们化为烟云”,“不论你在何方,我坚信爱无止境”,让人不禁悲从中来。细腻、逼真的古典音乐,传达出的一份古典爱情,富有韵味,令人回肠荡气。在杰克和露丝生死离别时,这首《我心依旧》显得凄惋动人,催人泪下。

对于爱情和海难这两大主题,《泰坦尼克号》既不是纯技术层面的展示,也不是纯情感的起伏跌宕。它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把一个世纪悲剧拍得美丽动人。整部影片在紧张的悬念和快速多变的节奏下演进,整个沉船过程惊心动魄!同时男女主人公的生死恋情,传递着一种传统的楚楚动人的情韵。三小时零十分的影片,看完后让人没有一点累顿的感觉,我们不能不承认创作者们的智慧。

二、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泰坦尼克号》

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点影片,《泰坦尼克号》采用旁白倒叙的格式,大跨度地回忆了一段发生在1912年大背景之下的惨烈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在巨轮的险情下展示贫富差距,它的灾难性题材和对人性、阶级性的刻画,极具世俗特点和商业色彩。

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在全世界掀起一股“泰坦尼克号”热潮?在吸引成千上万的美国观众的同时,也能吸引中国观众呢?在白种人、黑种人,成年人、儿童的心灵中都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能引发“共振”呢？在美国文化中，《泰坦尼克号》应该说是一个个案存在。这部影片一反好莱坞影片的传统套路，在揭示人类的理想、信念、牺牲、勇气和爱情上确实有独到的“出新”之处。美国文化，包括奥斯卡奖特别青睐的是《第一滴血》、《乱世佳人》、《野战排》、《阿甘正传》等有卖点的产品，有“超人”形象的高、大、全影片。然而，这部片子第一次没有出现“超人”的形象。它将目前美国影坛以科幻和暴力题材为主的潮流引向了社会性的人生故事和爱情题材。近几十年的《外星人》、《蝙蝠侠》、《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暴力、科幻、动作影片，对人的心灵确实有强刺激的效果，但却不能给人以更深刻的启迪和思考。对人性的深入刻画，离不开社会矛盾。应当承认，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仓皇出逃是人的本能。影片着重塑造的是一种群像式的存在，剧中的男主角不再是高大威猛，而是孱弱普通。女主角的行动有点叛逆，形象却温婉可人。在灾难面前，普通人也显示了人类直面死亡的勇气和尊严。如，船上的乐师们为安抚人心而恪尽职守地为旅客们演奏乐曲，直到“曲尽人亡”；一对老夫妻相依为命，不为求生白费力气，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末日来临；母亲依然为婴儿喂奶；英国绅士为保持体面，坚决不穿救生衣；神父面对死亡仍坚持布道，等等。在灾难之中呈现纷繁的真实人性这一主题上，影片不落窠臼地跳过了一般意义的善恶对峙、道德评判，而是抓住了20世纪初的阶级冲突状况。《泰坦尼克号》写出了在命运面前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冰海沉船”，



把危险中每一种人的表现都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中的金钱与爱情、贫与富是对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文化的一个突出反映。这一传奇被卡梅隆从阶级性与人性的角度重新诠释,从而成为一部感人至深的以阶级性与人性为主题的史诗性灾难爱情片。沉船这一巨大灾难是一种生死抉择,也是对阶级性与人性的一次重大检测。此时,每个人可以说都毫不做作地展示了自己的本能——求生的本能与作为阶级的属性。总之,“冰海沉船”这一事件,既展现了友爱、崇高、无畏和自我牺牲,也揭露了自私、怯懦、阴暗。例如,卡尔在沉船时就曾经抱起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并借口是自己的孩子而上了救生艇。

因此,如果仅仅从爱情悲剧这一题材着眼,那么《泰坦尼克号》如今已经可以与《乱世佳人》、《魂断蓝桥》齐名。但是它的主要“出彩”之处并不在于此,因为《泰坦尼克号》不是写抽象的人性、包括爱情,而是写出了人性中的阶级性。如果说《廊桥遗梦》等是利用中年妇女“红杏出墙”的潜意识进行煽情,那么《泰坦尼克号》中男女主人公感情与生命的悲剧却是由于二人之间的跨阶级现象造成的。应该说,在我们近年看到的美国大片中,《泰坦尼克号》也是第一次正视了人的阶级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泰坦尼克号”沉船除了是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事件外,还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事件,它反映了一个对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盲目崇信的时代,反映了一个以阶级来确定人生存权利的时代。《泰坦尼克号》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人的阶级所属直接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死存亡的事实。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年轻的杰克·道森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他靠赌注赢得了三等舱的船票，也以自己的个人自由和自信的青春活力吸引了露丝。这个住三等舱的穷小伙子，虽然身无分文，但却充满艺术激情，自由浪漫。他热爱生活，珍惜自由，在他眼中人生如同一场幸运的游戏。他教露丝自由地吐口水，那种活泼的天性令露丝跃跃欲试，感到既新鲜又刺激。正是在与杰克的交往中，精神处在束缚中的露丝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妙和活力。《泰坦尼克号》中的莫莉·布朗虽然是一个配角，但却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作为一个“暴发户”，她是资产阶级形象的一种代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确有其人。她也想和贵族亲近，但贵族们却嫌恶她“粗俗”。然而在剧中也正是她支持杰克对抗上流社会，并在沉船后要求去救落水之人，展示出个性中美好的一面。她的两面性与生活的变迁历程有真实的联系。她和年轻的杰克一起构成了“美国梦”的一种成分，是美国一部分价值观念的象征，客观上是对美国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巧妙的引导。

清纯的少女露丝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英国封建贵族，她随着母亲和未婚夫卡尔一起登上了豪华舒适的“泰坦尼克号”巨轮。但露丝厌恶钢铁大王的儿子卡尔的虚伪、做作、傲慢、势利，从心底里不愿嫁给他，而讲究门当户对并以嫁女求钱的母亲则强迫她接受这门婚事。她与卡尔似乎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二人对艺术的品味截然不同。卡尔对露丝的感受和要求毫不在意，为博得露丝的欢心，他以自己理解的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方式，将



一条镶有硕大昂贵蓝钻石的项链“海洋之心”送给了露丝。但金钱和物质并不能打动露丝的芳心，她深深地感受到一种青春活力上的单调乏味并郁郁寡欢。影片结尾，当一个警察问露丝“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时，露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对杰克的认同，“道森，露丝·道森”。她将卡尔送给他的“海洋之心”项链抛入了海底和她在101岁高龄时仍把脚趾甲涂得鲜红，都显示了一种价值观的变化，展示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纯真爱情的追忆。

一等舱和三等舱的分立，体现出的也是一种阶级壁垒或阶级歧视。英国贵族露丝的母亲在豪华的一等舱餐厅里故意问杰克三等舱的情况，杰克幽默地回答“十分好，没有老鼠”。但杰克在一等舱里并没有特别不自在，而是像虚伪的贵族一样吻了一下露丝的手，并解释说“电影里学的，一直想试一下”。这种分立，也代表了一种生存权。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阶级和性别所属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卡梅隆特别注意挖掘这次灾难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卡梅隆仔细研究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幸存者的构成，居然得出了惊人的结果。“泰坦尼克号”上的轮机舱的一个船员，在这场灾难中幸存的机会只有10%，而一个头等舱的男子，幸存机会却达到了50%，头等舱的女子的幸存机会更高达10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三等舱的女子幸存机会仅有25%。从这里可以看出，阶级差别与性别差异成为一个人是否幸存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的重要因素。有资料统计,三等舱里的 76 个小孩仅仅救出来 23 个。在“妇孺第一”的那个沉船之夜,三等舱儿童的损失率,高于头等舱男人损失率。而在灌进的海水迅速上升时,有的出口的铁门则被锁上,禁止三等舱里的人上来。据在三等舱死里逃生的惟一服务生回忆,直至凌晨 1 时 15 分,三等舱的人都被限制在下甲板上。这不能不说是超阶级人权的一种讥讽。

不同的阶级所属,不同的舱位本来无法使男女主人公走到一起,但他们最终做出了两人一生中最大的冒险——冲破世俗的羁绊,双双坠入爱河。露丝和杰克·道森的“爱情至上”打破了一等舱和三等舱的区别,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跨阶级现象和浪漫精神。对于这一不同阶级间产生的爱情,卡尔用“海洋之心”项链被盗来诬陷杰克的人品,露丝的母亲则视杰克为一个危险的臭虫。影片并未特别强调贫富的悬殊,而是突出了阶级的差别造成的生活方式的迥异。正是这种虚伪僵硬、陈规陋习的生活方式与流动多变、自由不羁生活方式之间的反差,由此造成了二人之间的爱情起点。在露丝眼中,杰克不是贫穷而是自由与鲜活的象征;而杰克眼中的露丝,除了美貌与高贵之外,还是在社会的罗网中苦苦挣扎的“苦闷者”。然而,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这段浪漫的情感融入了大西洋的滔滔海水。这一情节,令无数观众如痴如醉,并倾注了太多的伤感和感慨。当今世界中阶级现象还是最普遍的现象,关注这个题目还是人们最普遍的潜意识。影片对等级歧视的批判,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无疑具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泰坦尼克号》的成功也就在于它站在人性、人道的立场上来批判阶级文化,大胆鞭挞等级制度和阶级偏见,从而争取了观众,争取了文化消费导向,争取了巨额票房价值。

新生资产阶级用钱征服没落贵族曾经是一百多年前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常写的主题,也是今天基本解决了的社会课题。在这部电影里,露丝与卡尔之间不可能有太多的戏;露丝与杰克的关系被安排为主戏,主线索。这反映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哪些阶级之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跨阶级的爱情虽然作为一种个案是可能存在的,但它在生活中却没有普遍意义。富家小姐与一文不名的穷画家一见钟情,这本来是一个相当俗套的好莱坞电影爱情模式,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教化中才子佳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另一种翻版。穷画家带着女主角在船上四处奔逃,这场景也是好莱坞最典型的商业片中英雄救美人的标准套路。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冰海沉船”,“泰坦尼克号”安然抵达美国纽约,男女主人公还会生死相许吗?即使他们生活在一起,恐怕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最终只能是劳燕分飞。问题在于,“泰坦尼克号”终于沉没了,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在遭受灭顶之灾的沉船过程中,两人生死不渝的爱情爆发出光彩,短暂的爱情故事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成就了一段不朽的传奇。人们在为男女主人公的生死相依而流泪、而“打捞永恒”时,也就忘记了这种跨阶级爱情的现实基础是一种虚构。于是,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影片编织的这个跨阶级的爱情故事就有了一定的欺骗性,它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生活在“三等舱”中的一些年轻人看到了一个虚幻的梦——“白日梦”。正在兴起的《泰坦尼克号》热,不能说不存在这一因由。

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泰坦尼克号》的阶级歧视,特定时间是20世纪初的1912年。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这种阶级歧视、种族歧视的现象已经不像世纪初那样以一种尖锐分明的形式存在了,但这绝不是说阶级就不存在了。一方面,当时的阶级差别正如影片所揭示的是英国贵族的“遗产”,是露丝母亲而不是船主和莫莉·布郎这一资产阶级暴发户具有的严重等级观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统治术也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据有关资料说,人类航运史上自从出现这一悲剧事件后,一等舱和三等舱的等级区分从此转为只按价格取人了,今天在飞机舱室、住宅区划、高等教育学费等方面,还到处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差别。这就是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形式下的阶级差别。影片的艺术情节依托阶级差别展开,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完美地解答问题,只是向未来开放了一种引起思索的悬念。这也是本片的一个艺术效果。

三、“梦之船”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命运

“泰坦尼克号”被称为“梦之船”,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想、价值、信念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整个资本主义社



会,也就是一艘更大的“泰坦尼克号”。作为“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顿到美国纽约的这一航向,暗示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念。而建造“泰坦尼克号”,与拍摄好莱坞大片一样,集中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体现了资产阶级在金钱和技术支撑下社会发展的自负或自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踌躇满志”的发展恰恰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覆灭。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是20世纪初震动世界的大事。作为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巨轮,又有“永不沉没的海上堡垒”之称。它是英国造船工业的杰作,“泰坦尼克号”的排水量达6.6万吨。船内陈设讲究,装饰豪华,船身结构坚固,防水周密,水密舱之多之好,为当时船只之少见。在当时,还有什么比“泰坦尼克号”——这艘有史以来人类制造的最大、最豪华的客轮的下水远航更能显示人类对自然的掌握呢?但这条海上“巨无霸”在顷刻之间却沉入大海,在一场令人难以理解的噩梦中悲惨地结束了,留给人们的只是梦魇般的回忆。应该说,技术的进步使20世纪前20年奇迹迭生,资产阶级也志得意满。但随着这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象征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它把人们对自然的所谓征服无情地嘲笑了一番,因技术无所不能而膨胀的自负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重创,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总危机,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严重警告。它的灭顶之灾,令人不能不联想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命运,这之间的隐喻关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系或两者的“同构性”，明眼人是能够一眼望穿的。

“泰坦尼克号”突然颠覆的悲剧令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惊醒。那个豪华巨轮可以说就是繁华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象征，它是资本主义文化命运的一个可能性寓言。正如卡梅隆所说的，现在“《泰坦尼克号》是一部警世箴言、一面人类时时审视自己劣根性的明镜。它还是一则包容信念、勇气、牺牲、当然还有爱的不朽传奇”。无疑，这次海殇，确实是资本主义因其富裕和技术进步而变得自负自大的一份痛史明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虽然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无法避免巨大的经济危机和世界性的战争，更无法躲避自然的灾难。在世纪末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又呈现出世纪初的富裕、繁华图景，但却难保证就不会发生总危机。在这样一种心境下，其忧患意识就自然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每天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玩迪斯尼，但其内心深处，却很可能有一种“冰海沉船”的感觉。《泰坦尼克号》的出现，就是这一居安思危意识的体现。

总之，好莱坞作为生产“美国梦”的工厂，它是维护现存制度的好帮手。它的意识形态经常用艺术的形式来维护现存制度，维护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有人说西方经济学是纯经济的，没有政治，都是技术经济上的分析，但事实上它的政治全集中在它的大前提中。前提属于公理体系，必须不加逻辑论证地承认。因为只有在一一定的理论前提下，后边的逻辑推导才能出现，比如生产



和价格、需求和供给的函数曲线怎么交叉怎样平衡等关系,必须以此为前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是:(1)交换函数与财富分配无关。(2)个人福利(即效用)不受其他人福利的影响,社会最大福利状态下的收入分配方式为整个社会所赞同。这两个前提很接近,前者是说市场是公平的,大家铆着劲干活,生产就会高速发展,有多大的两极分化也没有关系。西方经济学有大量的图表,这一条曲线,那一条曲线,交叉出一个平衡点,这是最普遍的分析方法。什么均衡分析等,前提是市场这个世界最普遍、最惟一的交换场所。而市场之外的行为,包括我们说的黑社会、偷哇、抢呀、罢工等,都不能算进去,因为这些因素是无法进行线性分析的。财富分配造成的两极分化对此也没有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西方经济学,才能出现西方的经济制度,或者说才能出现西方稳定的局面。后者是说不能患红眼病,你多富我多穷没有关系,饿着肚子的穷人不因富人的美食而感到气愤,大家在市场上是绝对公平的,大家各走各的,各干各的。因为如果大家都患红眼病,那社会就乱套了。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电影里反映这个问题特别浓厚,杰克就自得其乐。他到一等舱,大家讥笑他,他说三等舱也很好,没有老鼠,意思是说你们在这儿开宴会,灯红酒绿,我们那里也很好,而且他还拉着露丝去三等舱跳舞。特别是“享受每一天”这种观念,把贵族少女都吸引过来了,跳舞跳得还挺火爆。于是,一等舱和三等舱里的人都自得其乐,后者甚至比前者活得更好。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这就生动地反映了阶级差别、两极分化不会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的导向。《泰坦尼克号》的导向作用还在于，它通过宣扬一种跨阶级的爱情来淡化阶级差别，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

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杰克吸引露丝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说，应该是资本主义价值观里广为推举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被剥削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劳动力的必要前提是个人自由。杰克吸引露丝，很重要的地方是他似乎很自由，他什么都能干，从三等舱跑到一等舱，可是他的自由权小得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是能站在船头上向前飞。就是这种自由，竟把一个受过严格教育的少女给征服了。原来露丝不想再跟他接触了，但她在船上的客厅看到一个小女孩被她的母亲严格地教育，正在把一个餐巾搭到腿上才改变了主意。大概露丝想起她的母亲也这样教育过她，让她一年年在贵族生活中走过来的，所以她向往小自由。但约束自己是作为统治者的起码条件。正是由于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露丝才不能随便谈论弗洛伊德，才不能自由吐口水，才不能随意爱人，才必须约束自己，才必须遵守贵族礼节。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是统治阶层的必修课。然而这种约束恰恰是做统治阶级的资格之一，恰恰是取得最大自由——统治自由的前提条件。露丝要小自由，就放弃了作为统治阶层的权力，而影片却在这里歌颂这种小自由，这似乎是对多数人说，你们就这么自由吧，你们就永远当一个被统治者吧！当统治者你就得约束自



己。应该说,这种跨阶级的爱情,最为那些没有阶级意识的被统治阶级所喜欢。然而,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影片中的穷小子赢得了美丽的爱情,却沉入了海底。由于电影是大众艺术,票房价值在穷人手里。虽然《泰坦尼克号》触及了艺术上的阶级现象,但它努力做到“Everybody dreams about but seldom find it”(人人都能做好梦但却极少能够实现),即让每个穷人看了宽心、安慰、高兴,都愿意到影院里来做这场“白日梦”,而富人也能够接受。我们不妨加以想像,那些富人对杰克这个穷小子和贵族少女露丝的爱情刚开始看电影时可能有点不舒服,但后来看到这个穷小子终于沉入海底,心里可能也就释然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电影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一样,都是为肯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命运同资本主义的整个命运是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

四、学习与借鉴

《泰坦尼克号》来了!面对美国电影的“文化扩张”,作为一个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紧迫性,也要充分体会我们肩上担子的重要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泰坦尼克号》称不上一个经典之作,编导的主观创意也缺乏很深刻的内涵,但拍得“好看”却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我认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为,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投资规模,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电影业而言,无疑不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但这部影片制作过程中的许多经验,却是我们在吃了这顿电影大餐后应该认真思考的。影片《泰坦尼克号》宣传的理念和思想是为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肯定“美国梦”或美国的价值观念,这些地方我们需要经过理性地思考并认真加以批判。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公开地合法地蔓延,潜移默化,逐步变成苏联的一种社会意识。有了这种社会意识的群众基础,一旦出现另一种政治代表人物时,政权必然会发生雪崩式转换。杜勒斯说,如果我们能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会教会他们按照我们要求的方式思考问题。苏联的这一教训固然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造成苏联解体的内因更值得我们借鉴,即创造、建设、维护这个制度的阶级力量本身不够成熟,还缺乏足够的“免疫”力。政权之争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全面、最复杂、最激烈的一种竞争。如果一个阶级夺得了政权,但是由于它的成熟程度还没有超过它的对手,因此缺乏建设一个新的稳固的社会制度的能力,那么必然会丢掉政权。在这里,应该说,我们不如人家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局限性;不能破译、解析人家的地方,就是一种自己的不成熟。因此,引进并研究这部片子,并不是为了让《泰坦尼克号》既占领我们的市场,又占领我们的人心,而是要通过“知彼知己”发扬自己的先进性,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同时,这部影片从艺



术观念到创作态度、艺术手法,有不少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1. 影片具有一定的思想穿透力。过去,我们认识上曾经有些片面,认为美国文化不过是性和暴力的产品,不过是“超人”形象的载体,不过是技术和金钱支撑的“文化工业”。但看过这部影片后,我们感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会做思想工作的,其意识形态在文化中的渗透已经达到了—种很高的水平。同时,美国文化的二重性也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早期文化的形象,资产阶级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不再像早期的“经济动物”那样目光短视、直率坦白了。从扔“海洋之心”的情节处理来看,美国的统治术是非常高明的。美国的实际运行规则是靠钱来指挥的,金钱统治一切,但它在电影里不宣传这些,它把规则和大众文化区别开来,把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区别开来。我们过去称之为虚伪,实际上是一种张果老倒骑驴的统治术。我们做思想工作的人长期以来解释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西点军校有雷锋的像,为什么他们也提倡献身,提倡奉献。原来呀,在美国社会中,少数人是统治者,多数人是被统治者,当少数统治者的意识在转化为被统治者的意识的时候,中间有一个“背越式”。我们的个别人看了这部片子后,居然感慨地说“美国也否定拜金主义啊,你看她把‘海洋之心’都扔了,我心里都有点舍不得”。我们相信,这样的人以这种理解方式到美国生活,肯定发不了大财,只会长期辛辛苦苦打工。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世纪末叶的美国公众能对世纪之初的某些阶级现象引起共鸣,这说明真正影响大的片子还应该以社会题材为主的。只有真正的社会题材,特别是悲剧,而不是仅仅以生活为主的世俗题材,才会引起社会全面的关注。“泰坦尼克号”的航程折射出许多问题,正像导演卡梅隆所言:“在影片中重视‘泰坦尼克号’的美仑美奂,表现它的乘客和船员们的激情、乐观和希望的同时,在揭示造成这场灾难的人类灵魂深处的阴暗面的过程中,更讴歌了在这场灾难中人类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虽然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也有表现集体主义,提倡无私奉献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一面。例如,电影《地火危城》就充分表现了这一观念。而这一点也是令我国许多电影观众感到困惑不解的地方。早在20世纪之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这些反弹琵琶之妙就作了解释,“来世论、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与参与资本主义营利活动。这两个方面,不仅没有冲突,也许反而倒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他还说:“在文化史的幼稚园里就应该教导人们,一定要彻底放弃这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天真想法。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资本主义越来越意识到追逐金钱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造就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人生第一需要的劳动者,也必须以



充满爱心、无私奉献为思想教育内容。马克思·韦伯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资本主义不能雇佣那些奉行漫无纪律的‘自由劳动’教义的劳动者……那些毫无保留地服从金钱欲、把它当做抑制不住的冲动的人……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苏联解体之前恐怕很多人是处在“文化史的幼稚园”里。我们现在呢？

2. 对西方优秀艺术成果，例如《泰坦尼克号》成功的制片经验，要积极吸纳。西方文化也有自己生命力的一面。我们说《泰坦尼克号》拍得好看，确实不虚此言。整部影片，从剧本创作、导演、演员、灯光、舞美到服装道具、电影特技搞得确实达到了精细、精致、精湛的程度，把电影艺术独有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到了接近完美的程度，到了电影艺术的新高峰。虽然《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本身并无创新之处，而且具有一定的古典性，但它却做到了情节紧凑、脉络清晰、悬念迭生，真正是动人心弦。据调查，这部影片恋爱故事情节的动人和场面的气势恢宏以及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对人生的理想、信念、自由、平等的追求，是这部影片在中国的主要“卖点”。一般而言，故事的矛盾越丰富，越容易起伏跌宕，越容易吸引人，但同时矛盾越多，也越容易失去生活的真实性。要想使矛盾网设计得既合生活逻辑，又反复穿插，最有普遍意义的办法还是围绕阶级矛盾派生的一系列矛盾进行展开。如电影中母女之间的矛盾，船客之间的矛盾，等等。

灯光的运用也几臻极境，人物的造型有一种雕塑般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的效果,立体感特别强。背景音乐的运用更是恰到好处,它和整个影片是一种有机的构成,显示了美国电影艺术制作的成熟。配器使用了苏格兰民乐,虽然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民间器乐,但它和歌手的低沉嗓音结合得天衣无缝,让人有时分辨不出音乐是声乐还是器乐。在我国不少影片中,主题歌可能写得很好,但它不能和整个影片有机配合,往往是“鹤立鸡群”,给人以“越位”的感觉。而《泰坦尼克号》的音乐处理却是恰到好处,没有任何“喧宾夺主”的嫌疑。一句话,影片的光、色、形、音,配合得匠心独运,一丝不苟。整部影片力求完美精细,其中有不少艺术手法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近年,我国的电影《红河谷》在艺术上有不少出新之处,但同《泰坦尼克号》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在这里,我们要明确承认,“人家好的就是好”。目前,中国文化界,尤其是影视界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我们的大片概念是思想和主题,投资其次;而好莱坞“玩的就是金钱”。但是不是有了大的投入,就能出好的电影呢?艺术的辩证法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而且这部投资为世界电影之最佳的巨片,如今已经创下了12亿美元的票房。好莱坞电影中不少高科技的包装,它所营造的许多虚拟时空,也是我们目前电影制作技术所达不到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片面认为,美国文化历史短浅,作品没有深度、厚度,缺乏思想性。一般而言,美国电影情节变化快,表现激烈,缺乏具有意味、韵味的意境,但美国文化并不缺少思想性。

3. 美国一些影人的敬业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十年磨一剑”，《泰坦尼克号》的拍摄也用了五年时光。从它获得的奥斯卡金像奖中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原创歌曲、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最佳音响效果剪辑、最佳视觉效果 11 项大奖中，就可以感受到这部影片的不凡之处。一片独得 11 项奖，这在奥斯卡奖 70 年的历史中，只有 1959 年的《宾虚》一片可与之媲美。导演卡梅隆喜欢集导演、剧作、制片和剪辑于一身，他在《魔鬼终结者》、《第一滴血续集》、《异形回归》、《真实的谎言》等影片中证明自己是成本和受益的精明计算者。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着了魔的导演在《泰坦尼克号》上体现出很强的敬业精神。当影片耗资迅速膨胀时，他不仅同意大量减少他的薪水，而且还做出了非常慷慨的姿态，放弃了票房收入的分红。为了把 20 世纪初欧洲上流社会的奢华真实地再现于观众眼前，卡梅隆不放过任何细节，甚至连人物服饰上的小配件都不放过。演员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是一个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演员。《泰坦尼克号》的许多外景都是在冬天完成的，为了帮助他抵御严寒，摄制组人员只好一桶一桶地往他身上浇温水。影片大多数水下镜头都是在水下 1000 多米处实拍的，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应当承认，美国影人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的一丝不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制片精神，是值得中国文化工作者认真学习的。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文化界尤其是影视界因浮躁心理而出现的粗制滥造等不良文化现象，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



新闻监督的有效性与其局限性*

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监督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有机整体,新闻监督又是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一种渠道和形式。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新闻监督对促进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既是有效的又是可行的,但也是有局限的。新闻单位在新闻监督中要注意利用它的有效性,防止它的局限性,使新闻监督在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

首先,要鼓励新闻单位按照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原则勇敢地进行新闻监督。新闻监督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在于,它能广泛、及时、直接地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所以朱镕基同志去年10月到中央电视台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监督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无论如何要坚持好新闻监督,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本质的反映。1950年,党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我们党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非常坦荡的一种表现。什么

* 本文载于1999年6月1日《河南新闻出版报》。



时候我们党怕新闻监督,或者说整体上反感和害怕新闻监督了,那就说明我们党什么时候从本质上发生变化了。新闻有相对的独立性。新闻媒体原来吃的是政府饭,现在允许做广告,允许自筹资金。这样一来,报刊广播电视要靠自力更生过生活了,这才从经济来源上保证媒体取得中介性质,从而形成相对独立性。当然我们也要研究对一些媒体进行补贴的问题。自己挣点钱,不完全依靠行政力量,恰恰是我们党尊重新闻相对独立性的表现。有些同志讲到一些干部很怕新闻监督,说“防火、防盗、防曝光”。这里要有两分法,一方面可能我们的新闻监督有不准确的地方,弄得人家很害怕。另一方面就得让干部有点怕。干部是掌权的,如果什么都不怕,就会无法无天。进行新闻监督很不容易,媒体要承担责任,党委宣传部长要承担责任。尽管被批评者很恼火,但宣传部长还是要为正确的监督辩护,因为维护新闻监督是大事情。因此,宣传部门对新闻监督一定要撑腰。记者本身只是记者,他能够批评当权者,这需要胆量,也需要支持。只要批评得对,尽管有某些部门、某些同志很不满意,但多数人会满意,包括多数干部也会满意。一定要相信,我们党还是两个95%,95%的群众是好的,95%的干部是好的。只要有这两个95%,凡是坏事,你给它曝光,多数人是支持的。但也有少数人,你批评他的部门,由于各种利害关系,他要遮一遮,要盖一盖,这也是人之常情,也可以理解。但凡是有正义感的,凡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上,负责任地进行曝光的,我们都要坚决支持。在这个问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题上宣传部门不要怯懦。

其次,要注意到新闻监督的局限性。在我们国家的民主监督系统内,新闻监督是非体制内、非专业性、非对称型的监督。这几个“非”形成了它的局限性。

第一个局限性是非体制内的。所谓体制内是指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体制内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因素。有的人说:任何监督,最后都得归结到党的监督。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最后解决问题。你在外面嚷嚷半天,如果党不动弹,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不管什么监督、曝光,最后能进入党委、政府工作的盘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由于新闻监督利用的是体制外的群众压力,媒体又是体制外的力量,那么体制外如何转移进体制内应该认真思考。作为体制内的矛盾,最后还需体制内的积极力量去解决。

第二个局限性是非专业性。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阶级、阶层的层次性大大增加,社会比过去复杂多了,连穿的衣服都是“今春没有流行色”。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管起来非常难,行行业业都有道道,新闻媒体的记者,不可能精通所有的专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新闻监督的力度不如专业监督。一些事情弄不准很容易被否定,所以最后还要靠专业监督。大家知道,真正的贪官污吏被揭出来,要靠会计算账,靠审计认定,光靠几封揭发信不可能最后解决问题。我们的记者基本上是万金油,很不容易做到什么事情都能看得很准。现在法律规定越来越多,法盲也就越来越多。实际上我们记



者也处在科盲、法盲或者某种盲的盲区里,这种盲目性给我们的监督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我也经常以此为理由向领导们作解释。我说你们也不要太苛刻,抓住我们记者的毛病不放。你看我们当干部的成天坐在那儿看文件,听报告,看内参、机密、绝密,看这么多东西,有时候还犯错误,人家记者文件看得比我们少,会议开得没有我们多,犯点错也难免。但这个事情要两面看。解释归解释,记者还得小心,要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局限性很大,对专业领域内的监督要小心,要留有余地,要尽可能转化到专业监督。吃不准的,要尽可能先取中间、中介、中立态度。

第三个局限性是非对称型的。新闻监督的非对称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称性。传媒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难以定量计算,所以很难赔偿。监督与被监督是对立统一体,任何监督者也应是监督者。现在新闻监督的被监督力度远不及对其他对象的监督力度,这也是一种不对称。商品与非商品的不对称,报纸现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新闻监督应以社会效益为第一原则,本不应受到利益本位的大影响,但确实也有竞争。我们既然进入市场了,就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即追求新闻含金量,新闻监督也就自然而然地很容易染上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经常讲,新闻监督来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动力来自对人民的责任感。我们是这么解释,但人家不一定这么看,而且现实中我们很难保证我们的记者、编辑,脑子里是不是要炒作,要增加发行量。含金量与可读性有关。前些时候我请了几个单位的人到河南日报社看看那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个引以为自豪的报业大楼,结果有的人说,你们靠骂我们,靠曝光,弄得发行量上去了,你们才能盖这么个大楼。当然,即使没有大楼有时也难免让人家不说。

对于新闻监督总起来第一句话还是要坚持,这是我们办报纸、办广播、办电视的党性原则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它的局限性有时也来自它的优点。它既然直接接触群众,直接动员群众,就有一个问题:群众现在是多元的群众,群众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看法。同样一个“曝光”,你看成是一种批评,一种负责任,但也会有人拿这个批评我们,或者作歪曲的解释,这样的事情也很多。要仔细研究这个多元性的局限性,提高曝光的准确性和艺术性,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要求新闻监督的质量。

今年大事多、喜事多,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五四运动 80 周年、澳门回归、迎接新的世纪,“三迎”、“三颂”,要加强正面宣传的力量。在曝光程度上,要掌握得准一点。对学校学生问题的报道要慎之又慎。别动不动弄得大学生上街了,这就妨碍稳定了。对公检法系统的报道也要小心,公检法是国家政权,它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权威性,也决定了它的封闭性,决定了它执行任务手段的特殊性。有些内容事前不能曝光,事后也不能曝光。所以,对公检法领域的报道要特别仔细。尽管由于其工作的权威性、封闭性、特殊性,确实也出了一些坏事,但我们不能包打天下,我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解决这个领域里的问题,还得靠公检法自己查,自己治。这个领域是特殊领域,它涉及到国家权威,封闭性非常强,但同时可读性



也强,大家喜欢看。有些侦查破案过程,起伏跌宕,非常吸引人,像是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所以,有些记者愿意采访。媒体也会在“可读性→发行量→含金量”机制的推动下,非常愿意登。但这个领域要千万小心,一定要瞻前顾后。

新闻监督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应当维护这种相对独立性,但也一定要强调新闻单位没有完整的独立性。新闻单位在任何社会里根本不可能独自生存下去。所以,有相对独立性,没有完整独立性,这是新闻单位的一个重要品格。这个品格决定了媒体一定要听党的。《河南日报》编了一个材料,叫《俄罗斯媒体:从党的控制到金钱控制》。文章讲了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在公开化过程中曾经高兴得不行,结果把苏联政权搞垮了以后,新闻媒体完全被新起的一批俄罗斯大款(“俄罗斯新人”)牢牢地把握了。新闻导向完全被这些有钱人掌握着。文章对这个过程描述得非常具体,一看就非常明白。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看起来很自由,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完整的独立性,也只有相对的独立性,而这些相对的独立性迷惑了我们相当多的一些人,其实只是我们不熟悉那些控制机制、控制手段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新闻监督相对独立性和新闻监督没有完整独立性这个问题给大家说清楚,让大家明白新闻单位责任的范围,在这个领域里坚持党组织的领导,靠党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论高校工作中“讲政治”的若干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时说：“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过我们，1983年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指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要把加强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郑重地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986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又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6年，他在天津视察时又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同志是无产阶级大政治家，他最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



这些指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对“政治”的理解

政治是一门大学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讲政治,更是一门新学问:共产党在执政地位的政治、在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政治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

革命战争时期,政治是中心任务。政治是显性的,政治的重要性也是显性的。和平与发展时期,经济是中心任务。政治大量地表现为隐性的,政治的重要性也变得不明显了。也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政治的轻视或反感。

其实,不管在和平与发展时期还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它的形式和条件。

和平与发展时期,政治的隐性主要隐在何处?隐在与业务的关系上。

我们高等学校的领导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我们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做工作。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盲目反感常常集中为三个概念:政治肮脏、政治残酷、政治没准。

“肮脏”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同政治的利益性相关的,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而纯粹的技术问题一般来讲是不涉及利益的,不涉及利益当然容易“纯洁”,当然不“脏”。但一旦走进社会生活,技术就会带来利益或利益损失,如“知识产权”争端,遂产生脏与不脏的概念。政治比自然科学多一个特性,就是它具有正义性,而纯自然科学是抽象的、中性的,很难说它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比如发明原子弹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如果不放到一定的社会环境或历史背景中,这个问题就只有科学与不科学之争,而到了社会生活中就产生了正义性问题,即所谓“科学没有祖国,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政治在一般意义上所涉及的“利益性”,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特别认识到共产党的政治所涉及的利益的“正义性”。所谓正义性是就站在特定的国家利益上或特定的阶级立场上而言。比如,在我们看来,共产党人为工人农民谋利益正是共产党的正义性所在,反对或不为工人农民谋利益我们则视其为“肮脏”。这就是政治的利益特性带来的立场选择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人反感政治上的残酷,也就是无情,实际上就是政治问题的选择,在矛盾尖锐化时往往进入对抗状态。你要么选择这个,要么选择那个,政治标准的地位往往超过伦理和人情的约束,所以显得无情。近几年,这种反感有所减少,因为人们发现金钱引起的选择也往往超越伦理和人情的约束。

“没准”,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多因素特点。有些人认为政治没有规律可言,政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不如自然科学的规律性可以用公式、用数据,准确地



做出结论。包括现在很多搞政治的同志也喜欢、并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捷径来代替政治科学的规律,希望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某些思想文化的成果。这种愿望好不好?有没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呢?也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但是总体来讲,这种尝试是有困难的。困难在哪呢?就在于小道理和大道理。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有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带来了这两个范畴的不同规律和特点。科技规律的实现周期一般比较短,相关因素比较少;而政治规律的周期较长,相关因素较多,甚至有很多因素是暂时不可知因素。政治需要带着很多隐性因素做结论,所以往往有不确定性。

认为政治肮脏、政治残酷、政治没准,恰恰是政治的利益特性、立场特性和矛盾的对抗特性,以及多因素特性的反映。列宁说过“政治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我们可以推广为“政治是某种专业问题的社会性集中”。业务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例子不胜枚举。

水利学家张光斗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80年代初期我非常崇尚科学技术,同时对政治也有某种惶恐、轻视。他教育我说:大的业务难题、技术难题最后还是需要政治解决。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一个科学院院士的政治觉悟为什么这么高?他说你不要简单地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你看长江三峡下面的葛洲坝,这个坝是长江三峡大坝的反调节水位大坝,江中间刚好有一个岛叫葛洲岛,当时长江办公室一千多名专家,有一半主张炸掉葛洲岛再修大坝,理由是这个岛是风化的,不结实。还有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一半人说不应该炸,炸掉这个岛要多花很多钱,这个岛足够结实。炸和不炸的投资大概占整个工程的1/3。炸和不炸就成了“长办”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都是专家,都是教授,都有自己的公式、算法和计算数据作依据。后来没办法,只好请示周总理,内行定不下来的问题最后由外行拍板。周总理说炸,最后就炸了。我现在想,你能说周总理在水利方面的专业知识比那些专家们就高出一筹吗?其实就是负社会责任。他在考虑炸还是不炸的问题时,实际上主要不是出于技术性角度,不是什么公式的数字解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就是政治。周总理从政治的角度决定了一个业务问题,这是我接触到的一个很典型的小道理转化为大道理、业务通过社会性的集中转化为政治的例子,类似这样的例子我听到过很多。比如美国B—1轰炸机的问题,美国航天飞机登月的问题,中国原子弹上马的问题,等等。

二、关于政治与业务、外行与内行的辩证关系

上述分析实际上已经涉及政治与业务、外行与内行的辩证关系问题。这既是一个老的理论话题,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作为高校的领导干部,搞清楚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矛盾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在我们身旁,一个业务问题一旦遇到经费渠道、人员组合、计划立项等难题时,

它马上集中为政治。一个执政党,不管是一个国家级的还是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要想从社会角度来解决技术上业务性的问题,大概不讲政治是不行的。与这个问题相关最多的课题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到底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到底是不是应该外行领导内行,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得比较厉害,这个问题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政治应不应该领导业务?”“政治怎样领导业务?”在一定条件下,外行是可以领导内行的,也应该领导内行。什么条件呢?就是当内行的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时,集中为政治问题时,这时的外行可以领导也应该领导内行。这个“外行”指的是政治,是政治的内行,管理的内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跑不出这个规律。西方政府在重视政治领导业务、外行领导内行方面比我们还厉害。在他们那里,搞业务的人几乎都是事务官,然后专门有一些人是政务官或政务次官,政务官在很多地方都是事务官的领导。具体搞业务的可以一干20年、30年,从科长、处长、局长,一年年升上去。但到某一级的时候,就受一个政务官的领导。政务次官的产生机制与事务官的产生完全不同,产生事务官是用业务性质的可以量化的考核方法,而政务官由选举完成后的内阁组阁时任命,然后由政务官领导事务官,这就是西方的“党管干部”和“外行领导内行”。

过去我们在“外行领导内行”问题上犯过一些错误,有人因此而怀疑这个命题本身的正确性。其实问题出在当时的内行是革命时期的政治内行,不完全是和平与发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展时期的执政内行。问题仍然出在政治水平上,或者问题出在“领导”的环节没有实施在“转化点”和“集中点”上。当业务问题尚未集中为、转化为社会性问题时就实行政治领导,就会出“瞎指挥”的笑话。当业务问题已经集中为、转化为社会问题时仍然使用技术性方法,不会用政治的方法,就会成为被西方称为“技术官僚”的干部。

我们共产党进而强调外行和内行的统一,就是希望我们搞某一个专业的领导同志既是业务上的专家、又是政治上的专家。毛主席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红”是什么呢?“红”是政治上的内行,“专”是业务上的内行,两个都是内行,所以这是两个内行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小道理和大道理统一的问题。西方政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它的社会管理、社会矛盾与它每个行业的专业问题普遍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的群众利益和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在本质上有对立性。如果说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的话,一个重要的优越性在于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使得每当一个专业问题转化为、集中为社会问题时,都容易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即政治)和科学规律结合在一起,它不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我们不像资产阶级政治把政治和业务绝对地对立起来,不能像他们那样把业务的内部规律和业务以外的社会规律对立起来。共产党对自己提倡过的“又红又专”,“红专统一”,“外行领导内行”,应该有着最大的自信心。外行和内行的关系是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是政治和业务的



关系,是全局规律和局部规律、社会规律和专业规律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优势转化为物质力量,我们就会比资本主义多一分生产力,比它们多一分活力和动力。在我们的工作中,两个单位的比赛,两个干部的比较,也往往是这种能力的比赛或比较。

那么,从政治上解决业务问题的着手点、着眼点是什么?业务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形式和类型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政治问题是指那些转化为、集中为群众利益问题的专业问题,转化为、集中为群众思想问题的专业问题,转化为、集中为群众的力量对比的专业问题。

转化为政治的专业问题大致表现在利益、思想、力量对比这三个方面。这三者大致是领导者经常考虑、运筹的几个因素。

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有做党务工作的,有做行政工作的。其中有不少同志是最近一段时间从某种业务岗位上走上高校领导岗位的。从全国来讲这是一种规律,我就是这样走上领导岗位的。在高校里往往一方面要做原来的专业工作,一方面要做一些领导工作。做领导工作就是搞政治,搞政治就要讲政治,讲政治就要做政治的内行。政治的内行到底要考虑哪些东西呢?和原来的专业或者是其他的专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这三方面,得积累相当多的经验才能够熟悉。比如说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有些什么规律,是要花些时间的;解决人的利益问题,也得花点力气;还要估计一下力量对比。如果没有力量对比和利益的估计,什么专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如前一段时间,省里发了一个文件,要解决公费医疗的问题。据说全省公费医疗的超支每年是几千万元,积压了上亿元的医药费发票报销不了,这是个大问题、急问题、难问题。据说有关业务部门编制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办法本身的业务逻辑是完善的,然后就下发了。但是下发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第三天就收回了。它的条文是很细的,应该说是业务上的内行,但发文件的第二天,群众排队报销医药费,差点挤破了门,只好收回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思想问题、力量对比和利益问题,而对这些没有做客观的估计,缺少解决的程序、时间和力量。思想上没有打通,单靠业务手段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大家从专业工作者、从局部的一个单位走到管理全局的领导岗位上,首先碰到的是政治问题。因为局面变大了,业务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的“讲政治”。尽管在专业工作者中,包括在老百姓中间有人认为政治肮脏、残酷、没准,可能还有其他的反感,但是对政治不能抽象地看待,不能带感情色彩地看待,应该看到它具有更大的全局性。同志们都有自己的立场,都希望为劳动人民、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那么,最大的利益就在于把政治和业务结合起来,在政治的岗位上解决业务的难题。政治是一种非常活跃的社会因素。它对各种业务都会有多种反作用力,它对各种业务都有保障作用,都提供一个环境。我们在高校搞课题的课题组长、教研室主任经常抱怨,最难办的不是攻克某个技术难关,而是跑课题的立项、经费,跑一些非业



务的东西。你听到这些抱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业务集中为政治的地方。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在某个业务领域里是具有优势的,可以任副教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但往往一到领导岗位上就变成劣势,重要原因在于当角色、岗位有了质变时,他们的能力和思想还没有相应的“飞跃”。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专业的内行,就必然会很容易地成为政治内行,成为领导其他专业的内行。

我记得一本杂志上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说毛主席50年代时有一次得了病,医院派了一位大夫。治好病以后这位大夫给毛主席讲了个笑话,希望毛主席高兴。他说:解放军刚进上海的时候,住在我们家里,没有地方淘米,看到白瓷做的马桶很干净,就在马桶里淘米。淘米时要把浑水放掉,结果一拉把手,“哗”的一下把米也冲走了。说完他自己笑起来了。没想到主席不仅未笑反而生了气。他问主席为什么?毛主席说:你看不起我。这可把大夫吓出一身汗来。毛主席说:我们虽然是土包子,但我们拿了天下。这个大夫绝对不会看不起毛主席。那个时候给主席安排大夫,一定要根红苗壮,绝对可靠的。这个大夫失误在什么地方呢?值得研究一下。第一,这位大夫是以个人个体为单位来看待毛主席的,他觉得毛主席跟这个解放军战士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他认为如果他笑话战士,毛主席也会跟着开心,可是他没想到毛主席的阶级一致性的意识非常强。他是最高统帅,你不但不能看不起毛主席,你也不能看不起他统帅的解放军战士。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毛主席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解放军战士是谁,但他的阶级意识强到带有某种“护犊子”的心理。“你说我的战士就等于说我。”这是大夫的第一个失误。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和业务的区别。毛主席当时的回话,从具体专业角度讲,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们虽然土,但我们拿了天下。”这句话没有正面回答大夫的问题,到底土不土啊?其实用马桶冲米,确实是“土”。但他拿另外一个领域里的事实对此回答,“尽管我们土,但我们胜利了”。这似乎不讲理,但又是非常讲理,讲了一个大道理。“土”的一方确实胜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土”是什么意思?“土”是落后。为什么落后的一方打败了先进的一方?“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这种规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很难表现出来。假设两所高校,一所高校装备好,一所高校装备差,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装备好的高校容易出成果。但是在战争年代,技术怎么就不起决定作用了呢?毛主席是靠政治上的先进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政治上先进的东西可以转化业务力量对比的优劣态势。政治是业务领域里的非线性因素。自然科学领域里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线性作用,一种是非线性作用。自然科学大量研究的是线性作用,如正相关作用、负相关作用。没有线性关系的作用一般不好研究,因为它的规律性不容易统计出来。毛主席这里讲的概念,就是政治可以引起业务上的非线性变化。

扩展一点,1989年前后,有一批自由化分子曾经宣传这样一个道理:共产党这个落后,那个落后,简直是农



民党。你们这个本事不如我们,那个本事不如我们,你们应该交出政权来。他们说的有没有一定道理呢?有一定道理。我们承认我们党曾经是一个被压迫阶级的政党,所以不能不被迫地、客观地带上一一些先天的局限性,就是“土”。我们承认,我们过去比较落后,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但也不能说就很先进了。在很多业务领域里,我们的科研能力和经济实力还很落后。不要说河南的大学和美国、欧洲的好大学有很大的差距,就是清华、北大,离世界先进大学的水平也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听说清华、北大进全世界前100名大学是根据科研能力、科研成果、装备、教学规模来排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仍然还有很落后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业务领域里的落后而丧失我们当领导的自信心,我们当领导的自信心主要建立在政治的先进性上。如果我们对政治规律、对社会规律、对管理科学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们就有资格当领导。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缺少高明,即使在某些业务领域水平很高,是教授,是博士生导师,我们可能都没有资格去当学校的领导。因为它是两个领域里的规律,是两种资格。当然决不能绝对化。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扔掉业务,我们还是强调要又红又专,如果我们的学校党政领导在做好党政工作的前提下,还能争取当博士生导师,还能当科学院院士,还能教课,还能带研究生,岂不更好!但是要掌握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之间的质变,这是有相关性的质变。我们今天“讲政治”既是强调它的社会性的一方面,也是强调它的专业性的一方面。



素质教育与认识论

“素质”一词是最近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之一。严格地讲,这个概念相当模糊,生理的、心理的、思想的、行为的,都有个素质问题,而且,这个概念与能力、品质等也有交叉重叠的方面。80年代后期,我国教育界最早出现“素质教育”一词,是针对当时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提出来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与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相联系,主要是在基础教育中实施。高等教育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培养跨世纪人才,担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重任的目标讲,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也许更为重要。

教育规律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论,我们应努力使教育更符合于认识的规律。素质教育就是要纠正教育中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在认识论上,毛泽东曾提出“两次飞跃”的原理,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前一个飞跃是认识世界,解决的是正确认识的形成问题;后一个飞跃是改造世界,解决的是正确认识即科学理论的目的和取向问题。显然,第二次



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学校的学生首先解决的是认识世界的任务,获取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种知识,提高思想、知识、身体等素质。学校教育的片面性是明显的,如基本上没有第二个飞跃;实践中的第一个飞跃是从个别到一般,学校中的第一个飞跃大多是从一般到个别;等等。学校教育有几个自然性质的客观根据:要趁学生年轻、记忆力强时多记点东西;要有教学的逻辑连贯性,如果长时间间断了,教学效率会降低;青年学生集中在一个学习集体中,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等等。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尽管从认识论角度看是片面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们也必须承认并尊重这些局限性。另外,学校教育中的课堂教学是理性认识的活动,做实验是感性认识的活动,都是锻炼和提高认识能力的活动。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大部分时间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而更多的是认识世界。素质教育就要在这两种认识活动的结合上下工夫,在有片面性、局限性的环节里多争取一些全面性,为学生将来突破这种局限性、片面性多准备一些能力。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显然,这个方针在学校里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原则、一个要求,并不解决教育和人才培养中的一切问题。这里的“全面发展”在大学里的实现是准备性的,德、智、体三个方面的内容也是部分地实现,并不是全部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讲过,大学毕业生只是半个知识分子,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还不是完整的知识分子,即还没有实现“全面发展”。全部实现是大学毕业后的事,是在走上社会、参与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长期实践中,经过无数次“两次飞跃”的循环往复完成的。譬如,大学生毕业后,由于身体还在成长、发育,所以仍要加强体育锻炼,进一步提高身体素质。又如,学生时代的“三好学生”,毕业后仍要继续努力,争取成为“三好职工”、“三好教师”、“三好干部”等。所以,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各种素质的全面提高,要靠长期不懈的努力,是一辈子的事情。而在学校里只能部分地实现,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同时也说明,学校教育本身的片面性是客观存在,是其自身难以完全克服的。我以为,素质教育的本质,是全面发展,是在学校教育片面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全面性,这是一个矛盾。除此之外,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例如博闻强记(死记硬背)和活学活用(在理解基础上的有效记忆)的全面性;艰苦奋斗(“十年寒窗苦”)与快乐教育的全面性;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精神培养的全面性;感性与理性、知性与悟性的全面性,等等。可以说这些矛盾都与学校的客观局限性有关。对此,有人极而言之,大学里学的东西,到社会上有9/10的用不上,9/10的需重新学,就说明了学校教育的片面性。说到底,仍是个认识论问题。因为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知识是不完全的知识,而实践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要达到实践的目的,显然靠这些知识是不够的,有许多东西要根据实践的需要重新学习。这同时也意味着原来学习的许多知识可能用不上,但这“用不上”



并非绝对无用,而是作为一种已获得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显然,有用的 1/10 和没用的 9/10 有个辩证联系,这是由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所决定的。处理好这个结合,即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也就部分克服了学校教育的片面性,接近了完全的知识。所以我们说,全面发展是教育的规律,也是认识的规律,认识规律包括教育规律,是教育规律的理论基石。

学校教育主要是解决认识问题,而且大多是理性认识问题。这就需要更仔细地研究理性认识阶段的内部结构,从而使“素质教育”的针对性更强。就认识过程来看,毛泽东将其分成两步、两个阶段。他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① 还说:“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② 在这里,毛泽东把理性认识规定为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和改造的认识,这是毛泽东对理性认识的第一个规定。同时,还有对理性认识的第二个规定。毛泽东说:“……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0页。

② 同上书,第285—286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①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理性认识不仅仅是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它的最重要任务是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上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抓住事物的全体。毛泽东关于理性认识的第二个规定,触及到理性认识本身也要有个发展过程的问题。事实上,对于理性认识来说,并不是一旦形成概念,并以此进行判断和推理,就能达到毛泽东关于“论理的认识”的要求。理性认识反映事物的本质也要经过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有人把这个过程区分为两个部分,这就是知性和悟性。

关于知性和悟性,马恩经典作家有过很多深刻的论述,如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关于数学公式所说的话,用以指出知性认识的局限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直接谈到知性问题的也很多。大致说来,知性是撇开事物的总联系而单独地、孤立地考察事物某一方面、某一规定的思维阶段,是一种无逻辑矛盾的思维活动。知性思维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大致对应于演绎法。具体的同一性是知性思维的总特征。由于知性坚持无逻辑矛盾的思维方式,所以它在认识事物内在矛盾的某一侧面时,又往往把这一侧面孤立地加以夸大,导致片面性和形而上学。这是知性认识的局限性。为此,就要在整个理性认识过程中来一次小的飞跃、质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86页。



用辩证思维统帅、指导知性思维,达到“论理的认识”,这就是悟性。悟性是在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运动中考察事物的思维阶段,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全面认识,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悟性属于辩证逻辑的范畴,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对感性具体的更高阶段的回复,大致对应于归纳法。

知性和悟性是辩证统一的。我以为,大学的素质教育,一定要在这个统一性上下工夫。知性的特点决定其是收敛的、平面的、演绎的、叠加的;悟性的特点决定其是发散的、立体的、归纳的、有跳跃和有间断点的。然而在创造性思维上,二者是统一的,既有发散性,也有收敛性。搞文史哲的人,就多发散性,比较浪漫;而搞自然科学的人,就较多收敛性,比较机械。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都有。大家知道,牛顿力学就是形式逻辑的代表,呈现出较多的收敛性思维。而同是牛顿,在解决积分中的求极限时,却较多地呈现了发散思维,悟性起了主要作用(当然也有知性的作用),这个悟性是与牛顿具有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目前在大学里进行人文精神教育,就是要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在知性的基础上,自觉地形成和运用悟性。知性智力活动将来会越来越多地用电脑代替、用电脑帮助;而悟性是电脑永远不能代替的,不管计算机的软、硬件如何发展。有人研究认为,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式逻辑属于个人的左半脑,辩证逻辑属于右半脑,西方有人据此提出开发右脑,以提高人的悟性。姑且不论此事的真实程度,却说明人们在理性认识上确实下了很大工夫,同时也说明将知性和悟性结合起来很重要。其实二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只有首先认识事物的本质、内在矛盾的某一侧面,再认识它的另一侧面,形成多个抽象规定,然后才有可能在思维中把它们辩证地综合起来,达到悟性阶段。悟性在第一次飞跃和第二次飞跃中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两次飞跃”的转化环节中最能体现人的思维的非线性特点、最能实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维环节。悟性在认识过程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其对学生今后实现诸多全面性,突破学校教育的局限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大学生来说,必须注重智育中的知识教育,没有大量的知性的积累,就没有对各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就很难形成创造性思维的知性基础。在处理知性和悟性的关系时,在学校期间可以90%的时间用来解决知性,10%的时间用来解决悟性。具体到教育上一些对立统一关系,也应这样。如前面讲到的博闻强记与活学活用,90%的时间用于前者,10%的时间用于后者。古人讲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正是这个意思。又如艰苦奋斗与快乐教育,要先有艰苦奋斗,后有愉快,没有“十年寒窗”之苦,哪有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的愉悦!所以,知性认识是悟性认识的基础之一,死记硬背是活学活用的基础之一,知性认识越丰富,悟性认识才有可能越高级。同时,也要注重智育中的



悟性教育,没有对各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没有辩证的综合,没有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全面把握,就难以克服知性的局限性,不能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能动飞跃,即认识上的革命性变革,同样不会形成创造性思维。所以,智育中要突出革命性,要有非智力因素。而这一点的培养,一要靠德育,因为德育属于非智力教育,解决的是世界观和价值选择问题,是大学生走向社会必备的一条;二要靠实践,因为实践活动可以激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实践是最综合的。可见,必须摆正两种认识的关系。将知性和悟性结合起来,可以激活人的认识能力;将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则可以激活人的实践能力(实践本身也是感性的具体活动)。只要在大学里很好地完成了认识上两个阶段的统一,正确处理了两者的关系,那么,对将来在社会上、实践上实现知性和悟性的辩证统一,用悟性指挥知性,推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将是大有作用的。



“德育第一”是共同的*

——在北京大学“三好”学生表彰会上的讲话

“三好”最早是严复提出来的。

但中国古人早就从各个方面归纳人才成长规律的要素,并用中国文化特有的简约形式,用一个字、一个音来概括整整一个方面的要求,所以,诸如“德、智、体”“德、才、学、识”这些概念及其意义是早就被历史肯定的,被千百万有所作为的人才证明的。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被人民称道,他们的成就都可以在他们所具有的这几方面素质中找到根源。所以按“三好”发展是教育规律,是社会规律,是客观规律的要求。这不会错的,不会误人子弟的,并且大多数有些社会工作经历的人都有体会。“三好”实质上不仅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对干部、对教职工、对人民的要求。一个人如果希望能始终对人民有贡献,就要一生坚持“三好”,“三好”坚持一生。这是多少过来人用他们辉煌的成绩或痛心疾首的追悔铸成的信

* 本文作于 1990 年 11 月。



条。谁有大聪明,谁相信“三好”,谁有大目标,谁就会终生坚持“三好”。

前些年,有些人诋毁“三好”是求全责备,是过时的教条,是束缚人才成长的绳索。我看是以欺人之谈来哗众取宠。谁不信“三好”,可以用宝贵的年华和精力来试一试。片面发展不会帮助任何人走得远走得快的。是毛主席最早把“三好”写入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亦作为一种制度在全国的学校里广泛要求。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三好”标准指引无数青少年成长起来,“三好”标准整整造就了一两代人中的佼佼者,现在国家各条战线上的中青年骨干大部分在上学期间都得到过“三好”的荣誉。就好像所有事物都有结构一样,“三好”也有一个结构。这种结构,从各个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从重要性角度看,毛主席早期曾把体育放在第一位,严复也是把体育放在第一位。这里有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后来毛主席又把德育放在了第一位。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纠正“文革”对科学文化的极端忽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曾经有意无意地把智育放在了第一位。当然,从占用的时间的角度讲,智育是第一位。但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上讲,德育为首也是客观规律。王力老先生就和很多学生说过:“做人第一,学问第二。”各阶级有各阶级自己的德育内容、德育标准,但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却是共同的。有的是悄悄这么做的,有的是公开这么做的。

德育比之智育有更大的普遍性、集中性、社会性、代表性。德育在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取决一个人是否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准备“做政治家”。做一名普通人也应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要求是一种社会要求。在学校期间,学生首先能很深地感觉到智育应该放在首位的压力,听到这个社会的呼声。加之在智育上可以摆出最多、最具体、最明确的要求,智育上需要花费的时间最多,而且德育在成才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一般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不如充分条件显眼,所以实际上在学生的认识中,往往是将智育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一个误区,会误人、误时、误事的。个人要因此而受惩罚,国家也要因此受惩罚。我们已经受这个误区的惩罚了,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也正在受着这个误区的惩罚。

这次“三好”奖学金的评选是很好、很成功的。在校内学生范围相对比较而言,选出的“三好”学生绝大多数确实是在“三好”标准中较好的。但也有少数同学误认为只有纯学生范围的民主选举方能决定人选。根据上面所述,“三好”首先是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当然同时也是学生的内在要求。所以第一把尺子在学校在教师手里,第二把尺子在同学之间。要说有民主的话,民主范围应扩大到学校教职工,而教职工的尺子是要加权的。因为教育者的义务是经过加权的。其实还有一把更权威、更重要、更铁面无私的尺子在等着大家,这就是社会、就是未来、就是你们将来的工作岗位、就是你们的人生之路。在那把尺子面前,大家还能否有当之无愧的“三好”称号,就比现在的评选难多了。我们相信大家能行,因为大家现在已经行了。我们为你们现在的成绩高兴,祝大家将来学得更好、干得更好。



已知与未知的边缘*

——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中的演讲

在月光下你们还跑不跑？

我信奉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一句话：“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机遇是偶然的，而偏爱谁则是必然的。机遇偏爱谁，这就是必然中的偶然了。在人生的旅途中，会经常遇到暂时看不清下一步目标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在看不清目标的时候仍坚定地相信必然的东西，我们最终会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念高中二年级。后来种了四年地，然后到工厂里当了五六年工人，1977年年底才上了大学。我们种地、当工人的时候，从没想到会打倒“四人帮”，那时也没有“四人帮”这个概念。很多人上不了大学，也不想学知识了。但是，有一批人就是信仰知

* 本文作于1990年7月。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识,每天干完活儿,累得脸上一搓就掉盐末儿,一回宿舍,别人都呼呼大睡了,但我们还是要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书。那时的书不如现在这么充裕,书店里全是毛选,连马恩著作都是不多的,所以那时我们摸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也不知自己将来能干什么,就觉得一辈子要种地了,一辈子要做工了。记得我曾找到一本大学《有机化学》,一口气看完了;后来,又找到一本中草药方面的书,就从头到尾背下来;往后又碰到一本天文书,从那儿知道天上有88个星座。尽管当时看书毫无目的,但有一条是自觉的,就是我要学习,要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崇尚必然性。尽管当时看不清目标,但只要认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路是不会走错的。

现在同学们在某些方面感到看不清、困惑,尤其是在毕业分配方面。作为过来人,我当然是看得清的,知道你们有美好的前途。但退一步,站在你们的立场上说——看不清怎么办?——我说,这时你们应该相信一点必然的东西,并且积极准备。等到机遇来了,它会偏爱谁呢?就是那些在这段时间里坚持学习的人。1977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一恢复高考机遇偏爱谁就显出来了。在这10年中没有停止学习的人,脑子就没有生锈,最后大多考上了大学。

目前毕业分配,按同学们的话说是三条路都堵上了:分配——下基层;考研——要推荐;出国——等五年。这样一来学生中打麻将的风气、跳舞的风气颇为浓郁。现在又有什么“九三学社”,早上睡到9点,下午睡到3点。



前不久又流行什么“世纪末”。什么叫“世纪末”？如果耶稣早生10年或晚生10年，这就不是世纪末了，这是人为的。现在唯心地称为“世纪末”，好像这个时间存在着什么必然的不祥之兆，其实是一些灰色的、消沉的情绪在作祟，无非是在自己骗自己。

现在的学习机会，应当说是很难得的。你们离毕业还有三四个月，千万别把它浪费掉，这次毕业分配不仅仅是应届生关心，低年级学生也很关心，因为这是一代人的问题。现在，低年级里也弥漫着“世纪末”的情绪。这是我所担心的。我知道大家一时看不清目标，缺少追求、发奋的动力。在“动力”问题上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是以很实际的眼前目标为生活动力的，这种人生活起来往往是很有劲头的。另一种人的动力来自未知王国，驱动他发奋的具体目标可能一时看不清，但他生活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两种人站在不同的地位上，但真想有所开拓、有所创造的话，还应该做后一种人，即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已知和未知交界的地方，要知道，这种已知和未知交界的地方就是发展的前沿，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种尖端。这种地带是最考验人的水平的，所谓人才也往往就出自这里。当然站在已知和未知的边缘处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被动地站，一种是主动地站，而你们常常是被动地站。现在对你们来说，已知的是大学4年的生活，未知的是以后的工作岗位和社会。一般来说，在已知和未知的边缘，不是产生宗教迷信，就是产生科学的假说。

宗教迷信属于精神麻醉品，包括毒品、吃喝嫖赌等也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是一种麻醉品。麻醉大概也可以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宗教大体上属于积极的麻醉,因为它毕竟以善、爱等引导人们的道德追求;而像吸毒、吃喝嫖赌等就属于消极的麻醉了,我发现大学校园里现在就有一些消极的麻醉,比如有的学生经常在宿舍里喝酒,我一看见就马上抽象出两个字:麻醉。这是比宗教还低一个层次的麻醉和一种精神状态。我知道他一定是遇到了未知的领域,同时又没有科学的信仰。我承认目前大家在毕业分配问题上确实有未知的领域,但在未知的领域面前,希望大家有科学的信仰,相信必然的东西,这样才不至于让消极的东西把自己的这一段时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浪费掉。库恩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发现,当时哥白尼日心说的数据比托勒密的地心说的数据误差还多。但哥白尼在实验设备不完善、数据不准确的情况下坚信自己的学说的科学性,最后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正说明尽管错误的东西有时也能自圆其说,但最终胜利的必然是正确的东西。而要坚持正确的东西就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承认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因此,对于大家来说,现在至少可以相信,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是不会耽误你们的。而不要去信那些酗酒啊、麻将啊、“九三学社”,等等。人生的确是一场竞赛。竞赛中,在什么时候才显出胜负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兔子在酗酒、打麻将的时候,乌龟也能赶过去。大家知道,地球总是一半在阳光下,一半在月光下,有时连月光也没有。人总要经受两种生活状态的反复考验。在阳光下你们都能赛跑,那么在月光下你们还跑不跑?这就是比出



快慢的地方。赛跑时,总是看谁的弯道技术好,直道往往拉不开差距,现在你们面临的形势也可以称为弯道,就看你们会不会跑了。

能把“小鞋”穿大的人,才是能人

老舍在《茶馆》里面非常生动地刻画过一个提笼养鸟的八旗子弟,而他沦落到这一步是旗饷腐蚀的结果。明朝末年,洪承畴投降后,为取悦清朝提议国家给八旗子弟每人一份饷,这等于是生活保险了。结果几百年下来,八旗子弟就变得很懦弱。这从反面说明了艰苦磨炼的重要。

现在让同学下基层,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意见:到基层碰到不公正的待遇怎么办?基层领导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心里没底,怕在那儿被压住。有人认为越到基层越黑暗。我认为锻炼有两种:一种是肉体上的锻炼,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另一种是精神上的锻炼,所谓“苦其心志”和“行拂乱其所为”,这是比肉体上的锻炼还要困难的,就是处处不顺心,按同学的话说就是处处有人给“穿小鞋”。我认为,关键在于对待“小鞋”的态度。只能穿小鞋的是小脚女人,是残废;只能穿大鞋的是少爷小姐、纨绔子弟,是窝囊废;能把小鞋穿大的人,才是能人。相信大家是不想成为残废和窝囊废的。所谓高等教育的“高”,有一部分含义就在把“小鞋”穿大,基层给人“穿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小鞋”的干部的文化水平可能没有你们高，那“小鞋”也只能是低文化水平的，文化水平较高的你们应该能把低文化水平的“小鞋”穿大。有人说知识是一种力量。其实，无知也是一种力量。问题是两种力量交锋时，是知识战胜无知，还是无知战胜知识；是知识怕无知，还是无知怕知识。最起码我们应该不怕。如果基层真是有给人“穿小鞋”的人的话，那么我倒觉得真应该比一比，谁是掌握科学知识的人，谁更有力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到基层遛遛。

我很早就提出，在青年大学生中间不要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知识分子受了打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应该的，但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也要求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便有些令我费解。可能此类政策也是确实有的，但我想提醒大家一句，你们要求落实政策，其实是要求特殊。在特殊的优待下跑出来的不能叫千里马，应该把自己放在别人一样的条件下去跑，是千里马，连伯乐都不要，就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是骐骥。一个人如果在基层被埋没了，那就证明他是驽马，他该埋没。不埋没没本事的人还埋没谁啊？

你们没到基层呆过，其实基层并不黑暗。我在基层干了11年。“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包括我本人都受到冲击。记得第一次到工厂报到时，厂人事科科长对我说：“林炎志，你老实点啊！”他就是这样迎接我的。我属于“杀、关、管”子弟，因此锻炼我的时间最长。我干得不错，在第三年出师的那个月我被发展入党了。我入党那天，



对厂党委书记说：“您看我家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党委书记说：“我们不管，我们看你干活好，就发展你。”考大学时，我的成绩在厂里名列第二，第一名和第三名都被清华录取了，而我因家庭问题被刷下来。厂党委副书记带人到教育局去，说：“这样的人不上，什么人上？”经过他们的争取后来清华录取了我。我跟厂领导没有任何超出工作上的关系，也没有送过礼，而且进厂时曾受到那么不公正的待遇，但最后我赢得了厂领导和工人群众的信任。这说明，在不公正中只要你肯花力气，还是可以用实际行动获得公正的待遇的。

完整与不完整的知识分子

北大有位教授说过一句话，学校就是要用不完整的老师，教出完整的学生。我认为很对。因为老师总是带有不完整的特点的，任何知识要变得很高深，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专门化一些。而社会需要的是完整的人、完整的学生，包括知识体系的完整，认识过程的完整，非智力因素的完整。你们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你们的知识体系并不完整。毛主席有一个观点，就是人的认识要经历两个飞跃：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和由理性到感性的飞跃。你们现在只完成了第一个飞跃，而面临的是第二个飞跃，就是干。许多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就是通过干才培养出来的。我们这些老大学生有个一致的体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会：在基层，所学的 9/10 用不上，要用的 9/10 还得重新学。这是说基层是活跃的前沿，是新旧知识的结合点。过分强调专业对口，不愿去基层，实际上是会削弱自己学习新知识的动力的。

有人认为基层缺乏获得必要的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因此不愿下去。我承认基层没有大图书馆。但是干一件事，其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知识量。毛主席在 1958 年郑州会议上有一个观点：从来都是知识少的战胜知识多的，年轻的战胜年老的。这有点绝对化，他自己就从来不拒绝知识，没完没了地看书；但他又藐视知识，这是毛主席超人的地方。他既重视知识又藐视知识，这样他就站在知识之上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概念呢？因为他确实打败了知识比他多的人。当时是红军掌握的知识多，还是国民党掌握的知识多？当时中央研究院及大学都在蒋介石的控制下，山沟里能有多少知识呢？看回忆录，我们知道当时连报纸都找不到，毛主席有几次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打下一个县城后，从作包装纸的报纸头上反复分析作出的。从报纸头中能分析出可资决策的信息，这才叫做学问的本事呢！我们应该全面一点，辩证一点，用两种方法，两套思路来思考问题。下基层后，能从司空见惯的事情中提出大量信息和知识，这是真本事。古人讲，不但要阅书，还要阅事、阅人、阅川。大家要想做一个完整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去基层接受锻炼的。



时间、空间、历史……

以上我主要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来谈的。除了个人功利以外,还有一种社会功利的人生观。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台湾的大学教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国家和民族放在第一位,就是一个最自私的人。”他说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能够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特别多,工人农民只能谋利,而知识分子不仅能谋利,还可谋名,谋地位。有人不愿下基层,怕被埋没,我想主要不是怕没利,即没钱,而主要是怕没名声,没地位。而名声与地位,恰是知识分子容易自私的地方。我有一套《二十四史》,最近几年又看到一本《二十四史人名录》。每个人名后面的解释都是短短的几行字。这些人在当时当世,都是身居显位的,但经过历史的凝缩,竟然成为几行字。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才刚刚开始,几千年、几万年之后,这些人又会在历史中占有多大的地方呢?“粪土当年万户侯”。在时间和空间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人类的整体则在这一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有其一定的历史客观性。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这一现象的话,就会承认这也是一种铁的规律。每一个想要有所贡献的人都应当看到这一点,把自己放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和空间中来认识自己。把功名利禄看做是身外之物,看做是人类历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史中很短暂的一瞬,我们就会在基层体会到快乐,就会感到在基层奋斗终身也毫无遗憾、乐趣无穷的。尽管这种价值尺度离你们现在的价值尺度距离很大,但我相信你们在基层待长了,一定会接受这种价值尺度,因为它是客观的,它包含了人类历史的自然规律在里面。



语言文字工作的旗帜*

今年是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 40 周年。40 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语言文字工作应有一面旗帜。这面旗帜的表述要简洁、明确,富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便于群众理解和支持。以前我们表述自己的工作时总是说“推广普通话”“文字规范化”“中文信息标准化”。这样的话太长,意思不容易集中,也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旗帜要能涵盖某一领域、某一时期,能够集中反映某一历史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规律。没有旗帜是带不起来队伍的。

我们能不能把这面旗帜叫做“中国语文现代化”?这种表述可以和全国的主要战略思想、工作重点接轨,和四个现代化接轨,使我们能在党的工作全局中定一个位置。各个现代化中都渗透着语文现代化的内容,没有语言文字现代化,那些现代化的实现都有困难。这面旗帜,港、台同胞也可以接受。因为语言文字工作不涉及社会基本

* 本文载于《语文建设》1995 年第 8 期。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制度,跟“一国两制”没有关系。语言文字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现代化也是超政治跨地区的,香港、台湾要搞现代化,其他华人社区也要搞现代化,都有汉语语言文字现代化的任务。另外,现代化的概念是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跨30年、40年仍然有现代化的任务。所以,有了“为语文现代化而奋斗”这面旗帜,就有了一个总的目标,总的出发点,就可以拿这面旗帜组织队伍,号召队伍。

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也要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研究其规律时,选择什么样的素材很重要,即所谓“样本空间”的选择。选择先秦、两汉的素材和选择今天的语言文字,结论是不会一样的。最近几十年、上百年,语言文字发生的变化是现代化的变化。比如白话文运动是不是现代化的进程?通过白话文运动,言文一致了,语文现代化发生了一次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中文信息处理,这些都是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旗帜,可以概括近现代中国文字的改革,把语言文字的专业需求和社会需求结合到一起。

语言文字现在和将来都有现代化的需求,比如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现在美国、欧洲国家、日本都投入巨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里,谁率先开通信息高速公路,谁就无疑能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取得优势、占领制高点。现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电话普及很快,已经有很多人在搞计算机网络了,先是全国网,然后进入国际网,获取信息比我们的报纸快得多,费用也很低。但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有一个问题,就是汉



字如何上去？有些科研工作往往需要五年、十年。如果今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其他条件成熟了，惟独汉字现代化问题没有解决，这算不算我们失职？要为我们民族、为我们国家早想、多想一点。汉字如何上信息高速公路就是下一步的现代化任务，这项工作技术上应由专家们解决，如果专家们解决不了是专家们的无能；但党政干部如果没有认识到它的战略意义，没有把这个任务提上议事日程，没有组织力量预先研究就是失职。实际上只要问题提出来了，并进行深入研究，汉字是有办法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

有人说汉字简化不对，要我说，汉字简化对不对也要由计算机来评判。在历史的进程中，往往需要一种工具迁就另一种工具。胡服骑射不就是让衣服迁就了骑马吗？骑马是工具，衣服也是工具，如果不变峨冠博带为胡服，就做不到骑射，战车就不会被骑兵所取代。先进的工具一定要让历史上的工具服从自己，这是现代化的一个规律。语言文字是工具，计算机也是工具，语言文字既要服从毛笔宣纸，更要服从现代化工具。我们作为党政干部最着急的是中国的语言文字还不完全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在这些问题面前，不但要谈中国文字的光荣传统，更要谈如何让汉字跟上现代化的步伐。汉字越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就越能保持其光荣传统。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恰恰是发扬光大汉字的一种现代化手段。只有现代化才能真正爱国。现在简体的汉字字库 6763 个中还有 138 个字用 16×16 点阵都表现不全，如“董”“量”“酬”等，扩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大点阵又会多占内存。装材料的内存占用多了,就要少装工具,传递材料的时间也要增加。我们将来在计算机上的弱点会造成汉字使用范围的缩小,等于把这个阵地让给西文。可是我们很多人看不到这些,非要讲简化汉字破坏了汉字的传统等,置现代化的要求于不顾。现代化既有建设力量,又有破坏力量,破坏一切阻挡它前进的东西。回想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不是破坏呢?白话文就破坏了文言文,横排就破坏了竖排,挡都挡不住。现代化也是一种革命,它是不买你的账的。你死抱着国粹,它就把你扔掉拉倒,什么国粹都没了。所以中国语言文字要接受现代化的要求,接受计算机的要求,接受信息高速公路的要求。我们现在要为这一个课题做精神准备、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推广普通话可以为计算机语言输入做准备,建立计算机字库规范标准也是为信息高速公路做准备。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要抗拒侵略和压迫,但不要去抗拒现代化。我们要对现代化的力量、现代化的无情有所体会,新加坡批评我们繁体字的回潮是“改革中的保守,开放中的倒退”,我以为是很中肯的。

我们是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和主导力量。有些人一说到与国际接轨,就用繁体字,就用粤语,以为这样就能改善投资环境,人家就高兴。他们忽视了我们这儿人最多,我们的语言文字生活最活跃,简化字大大加强了这个活跃。我们的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是中国语言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是新中国的第一项改革,是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有资格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上。如



果我们扔掉这些历史功绩,就是往反现代化的方向上走,是现代化的反动。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谁影响谁的问题。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用语言文字现代化作标准就会有所否定、又会有所肯定,而主体力量和主导位置是最有发言权的。

语言中的嫌贫爱富现象是一种文化落后现象。“粤语北伐”,现在吴语优越感又上来了。新加坡富不富?但人家用简化字、普通话,没有嫌贫爱富。有些人把富裕带来的权力泛化了,泛滥到文化领域里。富了,可以在股票行里兴风作浪,为什么要到语言文字领域里兴风作浪?这是文化现象里的低级趣味。在文化领域里,谁现代化,谁就有资格做主导力量,谁就有责任做主导者。有人说现在国外兴起汉语热。其实不是因为汉语的地位提高了,而是在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的热潮中被带动了一下。在人们选择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时,汉语排在第五位、第六位。曾有一个班的外国学生在北京学汉语,假期经武汉、广州回国,后来竟集体退学。他们说他们学了汉语没有用,到武汉、广州就听不懂了。我们语言文字的不统一等弱点会导致汉语汉字在国际上的地位降低。我们要为汉语汉字在国际上的地位负责任。中国 12 亿人在世界上占第一位,但我们真正能走出国门的東西有多少?我们为景泰蓝、茶叶做宣传,并且不断改进,以便让外国人更容易接受,使它们走向世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语言文字改进一些,更接近现代化,更容易走向世界呢?推广普通话、规范社会用字就是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步骤。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总之,从近代历史的角度讲,从未来的任务讲,从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责任讲,我们都应坚决推进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1966年,我在上高二时就跟同学提前一年学完了高三的课程,准备迎接高考。

就在这一年——当我们一只脚刚刚迈进青年,另一只脚还没来得及离开少年时,就遇到了“文革”风暴,在半明白、半不明白时就进入了社会;我们还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还没有成人,就被卷入了一个非健康社会、一个无序的环境。它让我们无法主宰自己地经历了大起大落。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北京郊区农场当了5年农民,后又当了几年的工人。那时我迫切地想上大学,当时车间里推荐工农兵学员,后来又办起了“七二一”大学,由于家庭的原因,这些都不让我上。看到人家一个个上了工农兵大学,心里非常遗憾。

在无序的环境中,你如何把握自己?我选择了读书。记得在农场劳动时,二十几人睡一铺大炕,白天干活累得腰酸腿疼,汗水凝结在脸上能搓出盐末,收工回来,很多人来不及洗脚倒头便睡。我还是要坚持读书。那时没有条件选择,逮住什么就读什么。一部《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头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念到尾,再从尾念到头,几百上千种中草药名称、人体 360 多个穴位,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天文学》与世俗世界毫无关系,但我从中了解到人类现在观测的 88 个星座,为了验证,我常在夜里读完书后去室外数星星。我还记得偶然抓到过一本大学有机化学教科书,当时真是高兴万分,那字里行间对物质内部结构立体而传神的勾画,使我生出一种美丽的诗一般的感觉,并且忘掉一切不幸……《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读了好多遍,支撑我走过来的,与其说是窝窝头咸菜,不如说是这两部书,没有这两部书,我那口气早就散了,精神也崩溃了。

信念、读书是我的精神支柱,读书是我生存下去惟一的精神生活方式。以我当时的处境,本来以为没有上大学的可能了,工农兵学员、“七二一”大学,都因政治条件不合格而成泡影。1977 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天上掉馅饼”,但是冷静下来思考,我认为这次机遇是对自己的一次肯定,对自己“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标的学习”的一种肯定。于是,当高考的机遇从天而降时,偶然的“馅饼”就奖赏给所有“必然的人”,并让那些选择了随遇而安的人扼腕顿足。

1977 年恢复高考通知发出后,我父亲正好去世。当时我也没有想去报考,但看到周围同志都投入报考,整个社会都投入复习,我才找到报纸一看,允许我报考。等到我报名复习时比别人晚了半个月。于是,我从朋友处借来中学课本,那时的课本都是从床底下、旧书摊里找出来的。知识文化在人们价值观中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



像我这样的人也受到重视。

我是67届老高中生,一时也就成了大家的老师。白天我在车间劳动,当辅导老师,不但要回答车间同志们的问题,也回答老师傅的问题,车间老师傅把儿女提的问题记在纸条上,带给我,我给回答。我当时是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我们厂属集体所有制工厂,不放假,我只能靠晚上加班复习。记得那时课本是向人借的,有时间限制,还得传给其他人,书角都翻烂了。就这样突击了两个月,我就进了考场。

考试是在12月,考场在一个中学,那时报考的人很多。考完后,凡我们老三届学生都觉得没有考好,而“文革”后上学的新高中学生反而觉得考得不错。结果一张榜公布,我们老高中生成绩都较好,看来考试确实能反映一个人的底子。我很感谢我的中学教育,基础打得很牢,所以考上了。我觉得除基础知识好,更重要的是我在11年当农民和工人中没有放弃学习,虽然那时不知道“文革”会结束,不知道结束后还能高考,那是一段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的学习。没有个人功利目的的追求知识是最可贵的。就这样,1977年,我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那年我29岁。

由于我们这代人饱尝过失学的遗憾,一旦重坐课堂听课,真如久旱逢甘雨的禾苗一般,如饥似渴。当时学校统计过一次每人每周学习时数,绝大部分人在70—80小时。晚上有不少同学开夜车。最初,有个通宵开放的二三百座位的大教室,在主楼三层,我们称之为“不夜城”,每晚那里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都坐得满满的,后来学校为了同学身体健康,硬把它关闭了。那时我们有7个班300人一同在大礼堂旁边的阶梯教室里上大课。

临近期末的一天,老师课前宣布:为了减轻同学负担,有两门课不考试了,只记考查成绩。全场响起了一片不满意声,老师为之惊愕。同学们解释说,为了学得扎实,希望考试。隔了几天老师又来宣布,学校同意全部考试,全场鼓掌。老师感动得不知是摇着头还是点着头走出去了。

毕业时,我们全体77级同学一起劳动筹资购置了一块大理石,镶嵌在学校主楼台阶上,上边刻着“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同学 一九八二”。寓意我们就是一块台阶,我们希望后来的人从这里踏上去。以前,我们特别喜欢谈“解放全人类”,梦想一口气造成一座大厦,现在我才清楚地知道了,首先把自己当做一块基石、一级台阶。



机遇 代价*

我们这一代“文革”中的青少年是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邓小平同志挖出来、救出来的人。其中有一批人是从恢复高考的机遇中走出来的。

20年前的那个伟大转折,对于国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浓缩了的、戏剧性的结点,其中可能包含着很多历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值得反复挖掘的课题。

感谢钟岩同志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把他们真实地采撷、汇集到一起,把这个结点的一部分真实地展开了。很多材料简直可以作为社会学的个案调查资料来使用。

从那时起,我们每个人沿着种种新的轨道匆匆赶路,来不及回头,来不及把历史情节串起来思考,来不及把几段相似的曲线拿来比较。甚至我们这些当事人绝大多数也未必都知道那个伟大转折的许多关键环节。对于恢复高考,我们无疑有无数的肯定和感激,但很可能已经接近忘却。无数的新人很可能并不知道、并不理解那几年的重

* 本文是给《新三级学人》一书写的前言。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要与丰富。

恢复高考并不是全盘恢复“文革”前的17年，并不仅仅是恢复一种教育制度，那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当时是处在一个新阶段的前沿，而不是处在旧事物的尾部。我们国家在那个伟大变化之后一直是忙不喘气、急不歇脚地改革、开放，一环接着一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导我们不断地有更高的追求！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是丰富的。在这里，我想急于回答其中的两个：

一、1977年恢复高考，挽救了几十万迫切求学的有志者，那么其他的同龄人呢？是被抛弃？是落伍？还是无望？

不！对于当时考上大学的这几十万人，即使把所有个人的巨大变化捆在一起，放在那个伟大的转折面前也是渺小的。

选拔了几十万，却调动了几千万，调整了国家的一个方向，实现了一种客观规律的意志。意义在于这是一个历史的指挥棒。这对其余的同龄人都是一种指挥，一种解放，一种挽救。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那一次高考未进大学门的同龄人今天获得了并不比本书中的人还差的成绩。而获得这些成绩的方向和动力中是包含着恢复高考的因素的。如果单纯拿一个人的命运和另一个人的命运比，恐怕永远也不会产生共同的是非标准。1977年教给我们按大道理办事，按大道理走路，最终是对的。

只有跳出个人的局限性，才有可能跳出应该跳出的历



史局限性。

二、有些人抓住了 1977 年的机遇,因为他们具备了抓住那次机遇的条件——在逆境中不懈地学习。因为他们付出了抓住那次机遇的成本、代价。但是他们会不断抓住机遇吗?邓小平同志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一个机遇接着一个机遇,一种机遇换成另一种机遇,只付过一种成本的人当然不一定有资格、有本事抓住另外一种机遇。前一种机遇无疑在鼓励、肯定某种个性,这些个性往往会成为抓住下一种机遇的障碍。历史的烙印往往就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有的人有时在前一个浪潮中有所得意,而在另一个浪潮中因为某些失意可能会产生一点“心理不平衡”。小心,这往往会造成盲目的“保守”。1977 年教给我们永远从零做起,不断地和自己的局限性作斗争,永远不背包袱,包括不把本书中反映的那些成功与优势当成包袱。抓住机遇必须支付代价,或者先付,或者后付。

只有跳出个人的局限性,才有可能跳出应该跳出的历史局限性。



自由职业知识分子*

一、政治立场

知识分子群体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阶级，历史上也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完整的阶级。很多人定义知识分子为“以知识为产业”的人，中国古代类似的说法是：“有恒心无恒产者谓之士。”这是众多种定义中较为普通、较为科学的一种。按照这种定义，知识分子必须和某个阶级结合才能生存，才能成就一定的事业。因为仅有知识形态的产业不能完成物质生产或形成物质力量。有人心理上反感毛主席的“毛”附着“皮”说。他们总想追求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阶级或是有独立政治利益的集团说。为此不惜在定义里“开除”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开除”那些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官的知识分子。这样就迁就了虚荣心而破坏了我们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其实“毛”附着“皮”说并不能直接

* 本文作于 1991 年 12 月。



引出什么轻视。

科学的起点是分类。知识分子既然不是独立、完整的阶级就更应该先分类。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的生产方式确是以个人智能为前提,和社会进行交换的。比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建筑设计师、教师、高级技师,等等。他们或者受雇用,或者自行开业,搞个事务所、家庭医院、家庭学校。他们不同于其他类知识分子的地方是他们不受雇用也能独立生产而生活,他们进入社会生产大循环的物质条件没有太多太硬的约束,不需要太多的固定资产和众多劳动力的配合,甚至一张纸、一枝笔就可以开始工作,以个体劳动方式挣钱吃饭。他们受雇用的范围也很大,择业很自由,所以我们暂且称之为“自由职业知识分子”。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人的比例和社会影响也在增加。

这些人在政治上的状态是游离的,独立于各主要阶级,尤其是独立于社会上作为主要矛盾的两个阶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数理化,改朝换代都不怕”,是他们心里最根本的一份政治自信心。6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在我们三年困难时期叫嚣反攻大陆。有些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就安排他们的孩子放弃其他职业兴趣,拼命报考医学院。因为“国民党来了也得生病,也得求医”。改革开放以来,有这种思想的人又加上一手——拼命读外语。学好了外语再学好一门“没有国界”的专业就可以当“世界公民”了。有了“谁也不用靠”的看家本领,在什么社会制度下都会有地位,不会是很高的地位,也不会是很差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的地位。

这些人在阶级斗争尖锐时,也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派别。这就是毛主席称之为“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政治上他们喜欢设计“第三条道路”。尽管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走通过“第三条道路”。政治上称他们为“个人民主主义”比称“民主个人主义”更合适。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是可以以个人为单位,而且往往以个人为单位。所以造成他们理解民主、理解“革命”等概念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个人为单位计算。个体民主、个体自由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统治压迫,另一方面也反感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进行学术分析。这种人是各种超阶级理论的天然拥护者。真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只把“超阶级”理论当成骗人的手段。但大多数个人民主主义者确是真心相信世界上有超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前途的。

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种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全人类利益”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要比“阶级利益”更高级、更美好、更有吸引力,也更觉得理由充足。

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是一个政治上不断分化的群体,尤其在斗争尖锐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原始状态是游离的,容易发生变化,而且阶级斗争中执极端坚定立场的阶级都会积极地争取他们。从认识渠道上讲,他们大多数人的阶级倾向性可以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体系得以建立。列宁有



过这种看法。所以革命队伍中不乏家庭出身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同志,有的甚至本人就曾是资本家、曾是封建官僚或军阀。这些人在接受工人阶级立场之前,往往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和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同样,历史上也不乏出身于工农,出身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人通过自由职业知识分子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客、反动分子、自由化精英。

这两种思想意识背离出身的过程中还往往有现实政治功利的个人动机。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著名人物左宗棠在最初投奔曾国藩不成时,就曾投奔过太平军,并上书建议太平天国的精神体系不要用从西方拿来的“上帝”,仍改用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利于团结文化人和中小地主。太平天国没有采纳。

不管是从专业知识体系中得到阶级倾向也好,还是从个人功利动机出发也好,其政治立场都必须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反复锤炼,世界观、人生观必须彻底改造为他所效力的那个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之后才能成为坚定的阶级斗士。否则其政治游离性的尾巴会在斗争尖锐时一再表现出来。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后,其主要助手李岩和宋献策有一天在街上散步,见先帝(崇祯)柩前有两僧人诵经。这时有明朝归降农民起义军后被录用者,着锦衣骑马而过。李岩问宋献策,明朝选士,经乡试而会试,会试而廷试,严格之至,何以报效之人不多见,纱帽(官员)反不如和尚?宋答,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鲜见忠义。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新进者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旧任老臣想:“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这话活脱脱勾勒了这种政治游离态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理由,即功名是自家挣来的。这话是放到政治分析上了,如果放到其他产业上也是如此,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以个人勤奋、个人聪明为投资,才得到的生产能力,所以各种收益理应是个人的,也绝不为别的什么事情做牺牲。毛主席说,这种知识分子比之工农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

尼克松 1986 年访问东欧之后预料和平演变已近成熟,因为掌权的是所谓“技术官僚”,只务实,缺少理想和意识形态。他不愧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一叶知秋。

所以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绝不能不分层次和轻重。我们必须将革命化置于最高统帅位置,知识化居第二位。对党政干部来说,专业化要放在第三位。最近有人提出执政的无产阶级仍要培养“职业革命家”。其要义也是要求干部的政治坚定性、政治水平达到反和平演变的标准。苏联、东欧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上百万干部,历经战争和建设锻炼,怎么垮得这么快?垮得这么窝囊?恐怕选干部“重制科,循资格,鲜见忠义”造成了大批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掌权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弱 点

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性质和程度必须有科学、客观的分析和估计。

1. 他们有知行分离、重知轻行的特点。因为是知识分子,并且主要靠大量的间接知识为工作手段,所以他们的实践范围一般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在专业特长上,他们是知行统一的,既有直接知识,又有间接知识。但是在专业知识之外,相对而言,他们习惯的思路更偏于重视理论知识,而较轻视实践,尤其是社会实践。所以经常可以在他们之中听到这样的议论:“提出(认识)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等于是说他们自己更重要。他们对于毛主席说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更重要的观点往往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高瞻远瞩,也正因为他不是个实行者,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位置是‘议而不治’。这就保证了他可以摆脱一些局部和暂时利益的牵制,不需要屈从于上级而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造福于社会”。因为只需“议而不治”,所以学术研究更固执于分析、说明领域。若谁的论文实用性强了,就有人揶揄之“匠气十足”!久而久之,在这个群体里形成了“评论员多,战斗员少”的局面。

这种认识特点仍是来源于他们政治上的“游离、自由、独立”的需要。因为一旦进入政治实践、社会实践,就必须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选择一定的立场,没有立场就不可能和特定的政治力量结合,没有立场就没有政治是非,没有敌我友,就没有确定的政治答案。而“游离”是保持政治上个人自由的前提,“游离”才能自由地寻找雇主,才能讨价还价、待价而沽,才能“改朝换代都不怕”,才能“朝秦暮楚,周游列国”。所以他们信奉“士无定主”。他们特别强调“人格独立是自由思考的前提,自由思考又是人格独立的标志之一”。这种人格独立是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人格独立。说到底,他们贬低实践的地位,抬高认识的意义,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知识资本的价值,二是为了站在政治斗争实践的局势外边,求得自身的安全、保险。

因为这一特点,新中国成立前这些知识分子多数不愿和美帝、蒋介石集团同流合污。美蒋对这部分人也一直抱有戒心。在美蒋的倒行逆施面前,他们反抗过,也同情、掩护过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评共产党。如果把他们的批评等同于资产阶级反动力量的进攻,则会失之过“左”。如果把他们的批评都宽容包纳下来,等同于无产阶级内部的自我批评,则又会失之过右。

2. 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有局部骄傲的特点。在专业问题上,一般地说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就是谦虚。但对于工农,对于政治,对于实践,他们往往持某种程度的轻蔑态度。这种有特定对象的骄傲一方面来自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知识资本,另一方面也来自他们政治上的胆小和自卑。如果以一个人对一个人来比,他们的人均知识量



(以间接知识为主)确实比成天忙于物质生产和政治实践的人要多。同时因为他们总是以个人为单位想问题、做事情,所以形不成拳头,又总站在政治斗争实践的圈子外边,所以必然胆小。这种政治上的胆小是不愿去掉,也去不掉的胆小。所以只有向自己内心开掘,用自我欣赏,自我鼓励来求得心理平衡,遂成骄傲。经常可以听到他们批评别人“不懂哲学讲哲学”、“不懂法律讲法律”、“不懂历史讲历史”。试想一门学问只能专家去讲,岂不被束之高阁,越讲人越少吗?有的知识分子公开提出:“知识分子就应该翘尾巴”,“翘尾巴是知识分子的本性,现在翘得还不够”。这种骄傲往往也闹到知识分子中间,于是“文人相轻”。

3. 自由职业知识分子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游离态,所以就在价值观上有意无意地发展“非政治化倾向”、“非意识形态化倾向”。但人总要有个是非标准体系,它就落在了道德上。所以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伦理化倾向很突出。他们说:“我们搞不清自由化是什么东西,只知道道德、品格。”“我们就相信良心、良知。”1989年“北京六四”政治风波在这些人心目中激起的抵触,少数是政治性的,多数是伦理性的。而且这个伦理是个人对个人的伦理关系,不是阶级对阶级的伦理关系。有趣的是,这些人的伦理结构并不平衡。就拿中国的旧道德概念“仁、义、礼、智、信”来说,仁的地位就大大高于义的地位。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特别发展。而正义性的分量在这些人眼里就远远不够。遇到什么人受苦受难时,洒一掬同情泪,说几句同情话的人很多。但敢于挺身而出,舍身取义斗争者则十分罕见。在反对自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由化的政治斗争中,他们即使对自由化的某些东西持有否定态度,但也往往取“不违不反”的态度。即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明确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像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一样,更喜欢“多种花,少栽刺”。

三、估 计

近 10 年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整体有个估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针对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综观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这一句话的谓语可以分解成四句话来说(主语、宾语不变):

1. 知识分子曾经不是,现在已经大部分是工人阶级了。
2. 知识分子应该是工人阶级。
3. 知识分子不会必然是、自发地是工人阶级。
4. 知识分子会是有个性的工人阶级。

展开来说,1. 有人曾经把这句话推到了一个极端,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明显地有悖于历史事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固然出现了李大钊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更多的人是非无产阶级的。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积累的文化知识主要是由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完成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化的过程中,通过文化得到的主要是旧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内容,但比之旧意识形态来说,还远远不占优势。50年代党领导的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运动曾争取了大批旧知识分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很坚定。甚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委屈之后,还有一批老知识分子坚决地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科学魅力和逻辑征服力,也反映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感召力。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又培养了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包括医生、律师、教师、建筑师,等等。这就是“曾经不是,现在已经大部分是”的含义。

2. 有些知识分子,尤其有些自由职业知识分子以整个知识分子的代表自居,不懂得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意义。他们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先进的一部分。我们还不稀罕当工人阶级一部分呢!”现实社会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很多是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不能让身(社会存在)首(意识形态)异处吧。知识分子追求创新。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体系居人类历史上最新、最先进的阶段,最需要创造性。知识分子追求自身价值、追求道德高尚。工人阶级的使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广阔的用武之地,是精神产品最丰富、道德最高尚的源泉。知识分子一旦把自己编进工人阶级队伍,就会感到自身力量变得强大了。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相结合就会获得巨大的事业成就。让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是为了更尊重、更依靠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是”，不是不行。

3. 有些知识分子很反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提法。当然从照顾心理因素出发，可以不提这句话。但不管提不提，思想改造都是一种客观需要。现在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居于劣势。意识形态是政治争夺的重点领域。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品质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是仅仅靠读书就能获得的。列宁说，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有人就以此推断，知识分子可以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从哪儿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自觉结合的产物。关键是自觉结合。单有其中任何一方都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仅有知识分子的自发作用，搞得再好也只能产生个人民主主义。自觉结合就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自觉改造的过程。“改造”和“自觉结合”是长期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天不停止，这个改造过程和结合过程就一天不会完结，当然其中也有工人阶级的改造。“改造”是一种提高，蜕皮才能成长，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知识分子不会必然是、自发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含义。

4. 知识分子一旦和工人阶级结合，就会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个性、有特长的一部分。他们的知识特长和理论追求会使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最自觉、最雄辩，因而也就最坚定、最有能量、最有政策策略水平。他们的道德追求一旦和共产主义信仰相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人格魅



力,就会使得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个体积极性、个体主动性得到增长和发挥,就会使阶级队伍不但有纪律的组织性,还会有道德的崇高性。他们的文化特长、认识能力特长一旦和工人阶级的社会生产实践、政治斗争实践相结合就会对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所有文化财富进行批判的吸收,创造出新一代的文化水平。

四、争 夺

在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是争夺的重点。而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又会是重点的重点。政治游离态的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比较集中,其中有很多人是优秀的学者和杰出的科学家。大学生在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受他们的影响较大。而且大学学习生活方式也基本上是一种个体智力活动。毕业后的职业对他们还是未知数。他们还没有社会实践的锻炼。所以他们的政治游离性、自由主义倾向非常明显。但大学生比自由职业知识分子还多三个特点:1.“参政意识”特别强;2.胆子大;3.很容易产生情绪化行动,说干就干。一个总想置身局外,一个急于进入局内。尽管这些倾向和特点大部分还是自发的,但也足以使他们屡屡成为各种力量借用的政治工具,所以很多情况下要根据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的特点来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工作。

在每种形态的社会里,一般都是位于主要矛盾两端的阶级有能力执政或者具有争夺政权的主动意识和勇气。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在奴隶社会里是奴隶主掌权,奴隶起义争夺政权。在封建社会里是大地主阶级掌权,贫雇农起义争夺政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大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革命争夺政权。而每种形态的社会的中间成分,如奴隶社会里的自由民,封建社会里的中农、富农、小地主,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尽管数量并不少,但一般未掌过权,甚至也从未做过争夺政权的主力军或急先锋。这些中间成分、中间力量在阶级斗争中都是被争夺的对象,是政治对垒中的过渡部分。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就是属于这个部分,其世界观和政治要求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可以说,争夺中间力量是改变力量对比的关键。当然最理想的结果是我们能够把这种知识分子都教育成具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但从现在的环境因素看,还不太可能。

团结、争取政治游离态的知识分子难在既要防止“左”,又要防止右。政治上对他们不能简单地压服,必须尊重在前。又不能一味随和迁就,必须有引导,有教育,否则叫人家拉过去了,最后迫不得已使用严峻的斗争手段,反而更伤人。

注意发挥他们知识渊博、专业精深的作用是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对他们最为重视的重视。但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发挥他们作用时要允许他们保持一定的政治自由度。在对策——决策——政策三个环节中,最好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在对策环节发挥作用,让对策组织和决策组织保持某种距离。对策工作和决策工作有质的不同。对策工作需要思想库、资料库、信息库。决策工作还需要有



实践的品格——立场、勇气、坚忍性、意志力，等等。政治上的游离状态在对策工作里可能是长处地方，在决策工作里会成为短处。资产阶级的政治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兰德公司与白宫和英国战略研究所和唐宁街的距离就是这两种工作的关系，这也是两种知识分子的关系。美国的亨廷顿、法国的克罗齐、日本的绵贯让治都认为“(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是使用口头、笔头和语言力量的人，把他们与其他这样做的人区别开来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缺乏对于实际事务的直接责任”。真正比较自觉的游离态知识分子能自我意识到这种区别而常常拒绝到有决策责任的岗位上工作或者拒绝参与决策。

“打铁先得自身硬”，无产阶级团结、争取中间力量的根基在于工农之中，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功之中。很多青年学生和教师在广泛地到工厂、农村、参观座谈实践锻炼之后思想情绪多多少少都会有所变化。尽管他们也会看到一些阴暗面，但他们发现工人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与他们大不一样。工农群众对党的批评意见是与党基本立场一致的，是“恨铁不成钢”。他们体验了改革开放中的种种实际困难和实打实的巨大成就。他们在各种沙龙里辨不清的很多理论问题在实际中自有办法。真正头脑清醒的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是有自知之明的，只不过心照不宣罢了。他们知道他们分散、不成队伍，不是改造世界的主要的物质力量，他们心里总在暗暗地寻觅，估价周围的各种有组织的物质力量、阶级力量，盘算着哪一种能靠上去或抓在手里。政治风波中有些中间力量之所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以向右摆,是因为这几年他们忘记或轻视了工农基本群众的政治倾向。前几年我们党内有些干部为了得到这种知识分子的几句捧场,忘记了共产党根在工农,结果还是抓不住游离态的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仍然是团结他们的最根本、最科学、最有针对性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也是可能的。因为他们重爱国主义、重科学、重人道、重伦理。这些都是通向工农和实践的桥梁。

争取中间力量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坚决反自由化。有些人心里总有点影影绰绰的害怕,怕批自由化会把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吓跑,怕弄得他们缺少发言权,怕“流弹”误伤朋友。对敌斗争的胜利是团结朋友的资格。如果仗打败了,你成了被统治者,你还能团结几个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朋友?知识分子朋友不是哄来的,也不是随和、厚道能赢得的。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打好伦理仗、民主仗、舆论仗、理论仗,对团结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四个领域的问题更受他们重视,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更大。海内外的各种力量在争夺这四个领域的领导权上特别舍得下本钱、下工夫。

我们党在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工作上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解放战争时,蒋管区的学生教师的斗争曾被誉为第二条战线。解放军还未开到,有的大学校园就被称为“小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这个工作上虽历经曲折、磨难,但总的说是有很大成绩的。否则共和国的科技、教育事业怎么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



自由职业知识分子★

我们党在大学、工厂、科研所里培养的一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几十年多次政治风雨的锻炼,现在他们阶级立场坚定,懂得专业,有政策水平,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有这样一支队伍作为团结、教育、领导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我们也一定能够争取自由职业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你想被历史淘汰吗？*

——“艰苦奋斗”之我见

艰苦奋斗是一种精神、作风和状态，这些都属于手段、方法和过程范围里的概念，因此不能脱离目的来谈艰苦奋斗。没有目的的艰苦奋斗确实是一种“傻冒”。艰苦奋斗的目的必须是社会的一种现实需要，才能使精神得到坚实、充足的动力。如果仅仅用伦理概念的“伟大”“高尚”来做艰苦奋斗的理由，往往只能掉进为手段而手段，为艰苦奋斗而艰苦奋斗的逻辑循环圈里。目的不清楚，目标不太远大、不太坚定的艰苦奋斗者往往顶不住“傻冒”这种讥讽。从纪荣耀同志的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目的和手段的相关性。当他想为父母、老师和乡亲争口气时，当他想为自己在厂长面前和老大学生的能力一争高低时，他都艰苦奋斗过一段。只不过这些目标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时间长了，当消极的舆论用超出他的目标的理由来瓦解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时，他就困惑了。

* 本文作于 1992 年 2 月。



伦理标准必须放到现实的社会功利,阶级的功利原则里才有意义。这是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精神和封建士大夫的安贫乐道、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克勤克俭的主要共同点与主要区别。

当然,我们不是保证目的问题解决了,手段问题就一定能解决。但我们可以保证如果目的问题没有解决,手段问题肯定解决不彻底。人生目的远大一点,坚定一点,“困惑”就会少一点。目的是手段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人们讨论问题时往往容易忽视目的和宗旨对方法和手段的决定性作用。因为二者之间有时并不统一。手段、方法是日常实践中大量出现的东西,而目的、宗旨是属于深刻的本质的东西。一个人或一种事业,选择目标的时间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但在发展手段上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像政治和业务、德育和智育、理想信仰和艰苦奋斗,大都有这种关系。

一个人的生活目标应该反映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国家需要进步,人民需要高效率地发展经济、技术。但为什么还仍然需要艰苦奋斗的王铁人和“两弹”元勋呢?

要进步就要赶超,要效率就要节约。

按照常规的办法,按照初等代数的计算,投一分的钱图一分的利,花一分的钱办一分的事。钱越多,利越大,办的事也越多。这就叫“马太效应”,即越富的越富,越穷的越穷。物质条件和原因是 X,结果是 Y。二者按正比例发展,这就叫“线性关系”。但是照这种常规逻辑,穷国永远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翻不了身,年轻人、后进者永远超不过老年人和先进者。我想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幅图景。

幸好世界上还有艰苦奋斗精神可以打破这种逻辑。被压迫阶级在揭竿而起反抗时,靠的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共产党用过雪山草地、吃草根树皮的精神,达到了以小米加步枪的条件打败飞机加大炮的事业目标。中国工人阶级用“铁人精神”,硬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自力更生地建设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艰苦奋斗就是用人的精神力量,打破这种初等数学的正比例关系。花一分钱办两分钱的事,少花钱多办事,弱小的新生事物就可以生长起来了。艰苦奋斗是一种非线性力量。它是打破旧的循环状态,建立新的循环状态必经的台阶。所以革命、改革、创新和超越一类的事业都需要艰苦奋斗。

广义地讲,效率 = 产出/投入 = 目标/手段 = 结果/物质条件。一个想要较快进步的社会必须是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真正科学的艰苦奋斗精神有一个实质意义,就是高效率。

研究一个概念,最好和它的对立面一齐来研究。艰苦奋斗有两类对立面。它们分别形成了两个范畴。

在工作、生产领域里,艰苦奋斗的反面是懒惰、安逸、消极、被动和唯条件论。最反映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生命力的表现就是生产、工作领域里的作风。工人阶级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社会化大生产的潜力是无穷的,现代化技术发展的潜力也是无穷的。作为这种生产力的人格代表,会从这种历史发展中得到一种永远不懈的艰苦奋



斗精神。有人以为越现代化,人可以越懒惰、安逸。这种认识可能一方面来自小生产,用自然经济的逻辑去套现代化大生产,另一方面大约就来自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误解。他们以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艰苦。现代化生产的发展有可能逐步减少简单体力劳动,但绝不会消灭体力劳动。阿波罗登月舱里,宇航员的体力消耗和脑力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其实就连拖拉机手的体力劳动强度也未必就比扶犁更轻松。真正紧张的脑力劳动也是艰苦奋斗。

历史淘汰人常用两种手段:一是使其骄傲,二是使其懈怠。有些人向往“活得轻松、潇洒”。如果这是指工作状态,那么社会大概就要准备淘汰他了。在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时代,哪个“弄潮儿”不感到时促日短!图轻松的人早晚要为他们工作上的懈怠付出代价。

在生活领域里的艰苦奋斗往往也被称为勤俭节约。其反面是奢侈、浪费。这种艰苦奋斗的标准,历史相对性很明显,个性差异也很大。

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五六十年代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既是一种内在素质,又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约束。那个时代要求举国节约,所以艰苦奋斗的具体标准也把亿万人整齐划一了。连每人每月吃油吃肉的重量也用票证统一了。这里可能有产品经济过度集中统一的弊病,大概也有自力更生完成巨额资金的原始积累的历史需要。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个体差异。劳动之余还有享受,只要条件允许,理所应当。有些人对比五六十年代,因为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没有了整齐划一的要求,因为有了那时的客观约束,就轻率地推断“艰苦奋斗不必要了”,似乎不合乎时代精神了。这实在是只根据感觉就进行模糊的逻辑推论,肯定是掉进了误区。生活上的享受,只要合乎工作要求,合乎科学卫生标准,合乎个人收入水平,不应被看成奢侈、浪费。

其实勤俭节约不仅仅是节约物资,更重要的是节约时间。我们上大学之初争论过这个问题,有人认为钱多了可以节省时间,用钱买时间。表面上看这合乎逻辑。四五年学下来,大家才发现还是班上最不常花钱的学生学习时间最充裕。因为花钱也要劳神、费时间,若花冤枉了还要费时间去后悔。

享受也应有科学、卫生的客观标准。有些人先富起来了就胡吃海喝,不但浪费了物资、劳动,而且浪费自己的健康和时间。这是“初级阶段”缺少文化水平的浅薄,有点钱就“烧”得不知道怎么花了。“穷人乍富,罗锅腆肚。”

现在社会上有些“大款”一掷千金。那是因为他们挣的钱不完全是“按劳分配”来的。“来得容易,去得糊涂。”挥霍是这种价值运动的文化反映。问题是没有这种来源的人绝不能跟着这种文化走。社会舆论导向更不能肯定这种文化。其实真正规则比较严密的商品经济只会造成更加紧张、节俭的艰苦奋斗精神。



努力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项事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能否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能否实现的战略性工程。面对世纪之交的时代生活和社会实践,第六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处理好培养合格人才与优秀人才的关系,把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摆上重要日程。这是极富战略意义和战略眼光的。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需要,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一、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国情,作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五大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代表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构成的共存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相当多的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这里蕴涵了育人工作的广阔空间，提出了育人工作的历史命题，即在长达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能力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社会制度先进与社会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抓住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实践中，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必然要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学习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稳定增长，实力大大增



强；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发生经济总危机的周期延长；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劳资矛盾有所缓和；国家行政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弊端仍然存在；把生产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的动因和目的，剥削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局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西方一些敏感的专家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和悲惨命运忧心忡忡，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其新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体制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关键时刻，出现了科技和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不一致的矛盾，动摇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他们出于阶级本能，为资本主义的未来设计各种蓝图，诸如“后工业社会”、“后文明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新工业国”等，企图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尤其是资本主义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股权分散”、“管理民主化”、“社会福利制度”等成为资本主义新的求生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至资本主义生存提供了新的容量和空间。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在其社会基本矛盾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其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的空间；使其社会制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某些发展阶段还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发展和繁荣。而与之相对的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社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会主义,将长期处于追赶、改革、发展的进程之中。因此,我们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的,大胆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同时,注意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保持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市场经济原来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和独有的。它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作为现代文明成果,与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的另一个文明成果相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掀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新篇章,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得到增强,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得到扩大,也使我们党驾驭全局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如同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一样,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产生驾驭自己的力量,必须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靠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从思想观念到精神境界对市场经济的理性超越。尤其是能够驾驭市场经济的人,必须靠马克思主义,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培养产生。市场经济对人的思想影响有二重性:有利于培养和加强个人的自立、自强和竞争意识;但由于市场经济产生于资本主义,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有某种契合关系,其多种分配方式,尤其是按资分配机制,是否定共产主义意识的,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市场竞争要素,是贬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整体性的机制性要素,其劳动力市场是用雇佣关系消解工人阶级队伍政治关系的要素。我国生产力的二元结构使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形成了很宽的“谱”,它使得我们不能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



经济基础的作用简单地、机械地理解为要么促进,要么阻碍。为了二元结构生产力的“谱”中各个成分有各自发展的空间,生产关系必须有多种成分。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上层建筑有某些负面影响,而改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又不能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允许市场经济原则自由泛滥。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利用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解决好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问题。有驾驭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才会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归根结底,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主义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批既敢于、善于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经济管理技术,又坚持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历史性课题。

为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市场机制的形成,到“资本”概念的引入、资本参与分配乃至资本运营,都强有力地刺激和发展了国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尽管这种生产关系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但面对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何防止拥有资本的阶层形成阶级,这是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的初衷是完善社会主义,目标是实现共产主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义,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一切举措必须有利于这个初衷和目标,而不是背叛、消解这个初衷和目标。为此,必须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由他们把握现在,决定未来。在现实社会和理想目标之间,必须有一代又一代超越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制约,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能自觉地把思想境界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地处理自身思想境界与执行现实政策的关系,在模范执行党在初级阶段的现实政策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既不把思想境界当做现实政策,做到不偏“左”,也不把初级阶段的现实政策作为自己的思想境界,做到不偏右。有一批又一批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执行党的现实政策,又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主义将和非公有的生产关系一起发展,这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抓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坚定其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下工夫

共产主义以其理论体系上的完整性、彻底性,超越了社会主义在思想、制度和实践上的多元存在,是更高的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克服倒退的“补课论”;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需要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与发展,克服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悲观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出现阶段性发展和繁荣的情况下,需要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克服在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的盲目崇拜;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处中,需要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认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克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还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着力点。把理想信念定位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就使得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追求体现出规律性要求,具有科学的恒久的意义;把理想信念定位于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上,就使得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追求取得了和党的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在实践上表现得更自觉、更彻底。

邓小平同志曾将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视为我们党的真正优势。凡是科学的政治信仰都必须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列宁曾经说过,许多知识分子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共产主义是从他们的专业知识开始的。科学的真理性、专业的逻辑性对他们具有天然征服力,而马克思主义则在真理性上内在地与各种科学学科联系在一起。从各自所学的专业出发,认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更容易培植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使这种坚定性具有更宽广的领域,更坚实的基础。这种坚定性还要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高科技高速发展的要求。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运营全球化的加剧和对外开放的深入,青年一代会在时间、空间的调整与转换中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会把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理论追求放在当代世界的大格局中去认识,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形态的对比中去认识。这种认识可能是历史的、现实的,也可能是前瞻性的。要通过培养和教育,使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经得起种种全球一体化和未来新事物的考验,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

三、高等院校要成为培养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的阵地

高等院校负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职责。高等教育是现代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治党治国人才必经的教育阶段。青年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同时,通过学校教育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逐步形成较为稳定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这些观念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结合在一起,对其选择人生道路至关重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在社会高知识群体中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健康成



长依赖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培养工作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高等院校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要与其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同步。要让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利益主体多元存在、思想观念多元存在、价值取向多元存在的社会环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比较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对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缺乏切身体会、缺乏艰苦工作环境和基层工作锻炼的条件下走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任务非常艰巨,高等院校责任重大。高等院校要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住青年学生(包括青年教师)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努力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高等院校在培养和造就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项工作中,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严格的党内生活和长期的社会实践锻炼等方面下大工夫。要深化和丰富高等院校“两课”教学内容,按照“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精选马克思主义原著,由最优秀的教师讲授和辅导,引导学生在校即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研究和回答社会的前沿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对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阶级分析问题、劳动观念问题、腐败问题、个人功利和个人自由问题、物质享受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下岗职工问题等,向学生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最重要的是讲解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现行方针政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还要注意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克服教育中性化。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等经典核心理论讲深讲透,使学生掌握无产阶级政党赖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以存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二是充分体现时代要求。要把重点放在邓小平理论上,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其精神实质上下工夫。三是善于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衔接,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质量。

党内生活锻炼是马克思主义者走向成熟和坚定的必由之路。很难设想,离开党内生活能培养和造就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学生参加党内生活的过程,就是学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过程,是继承和实践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认清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也是利用组织力量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改造,从而获得思想的纯洁性、信念的坚定性和行动的先进性,努力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他们通过党内生活的培养和锻炼,党的利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他们超越一切个体性因素的强大动力,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路线和纲领而顽强地奋斗。

加强社会实践锻炼,在实践中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相伴终身的过程。在学校阶段,主要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树立尊重实践、尊重工农的思想。这样的社会实践锻炼偏重于在思想意识层面确立实践观念,在其成长的全过程中处于起步阶段。能否真正地、彻底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仍然是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这是每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做好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工作的关系。党的教育方针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体现了党对教育工作的总要求。严格地讲,前者已经包括了后者,后者对前者是在内容上的深化,要求上的提高。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前提。学校党委既要善于从宏观上、战略上着眼,又要善于把重点工作抓紧抓好。要理顺培养合格人才和培养优秀建设骨干的关系,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目标,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合格人才;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目标,为党的事业培养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是培养工作的基本目标和培养工作的依靠力量的关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政治业务素质较高、包含较为全面的群体。培养出完全意义上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多方面的投入,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参与和支持。要充分认识到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高素质群体这一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学校要发挥基地和主导作用,既要依靠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培养工作,又要把一切有利于实现培养目标的力量、因素都团结、调动起来。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培养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培养对象以青年学生为培养主体,积极考虑青年教师。还要把工作目标和个体评价区分开来,不能将培养对象中的个体简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单地称之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三是培养提高和逐步成才的关系。人才素质的提高有其自身规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尤其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更需要在遵循人才成长一般规律的同时,充分把握其特殊性。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长,人为地制造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帮助他们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技术素质,使其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忠诚 贡献 才能

——中青年领导干部成长之路

在党政干部的成长道路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从我个人的体会,有三个因素最重要:忠诚、贡献、才能。这三者既有主观的内容,又有客观的内容,但却是统一的。

忠诚,我理解主要是忠诚于真理,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于真理就是要信仰坚定。真理就是本质,日常生活就是现象。本质和现象之间存在的差别造成了坚定信仰的困难。比如近几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较大的挫折;改革开放中大量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利益差别越来越大。这些历史过程的许多现象使有些人动摇了自己的信仰。忘记了本质就会忘记信仰。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现象走。

如果一个人当初并未走上信仰某种主义的道路,则当然无所谓“动摇”,也无所谓环境的“干扰”。但一个人一旦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之后,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个人利益对这个道路的干扰。在为事业奋斗的多数情况下,个人利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益是与事业的成败紧密相关的。但事业发生了曲折,个人利益就未必能得到保证,那时还追不追求真理呢?

“文革”前,我是个中学生,当时笃信马列。“文革”时曾受过很大冲击,当时我产生过一个问题:“我这么虔诚地信仰你,你为什么这么不公正地虐待我?”固然,林彪、“四人帮”搞的不是马列主义。但我那时的疑问就等于意味着个人利益和真理之间必须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交换关系。那怎么能坚定地追求真理呢?我后来反省,否定了这种认识,才重新信仰马列主义。反复之后的信仰比“文革”前更加坚定了。

“文革”后,有一个电影(《太阳与人》)提出一个问题:“我爱国,国爱不爱我呢?”这类命题错误地规定了个人和真理的相关性,是瓦解民族凝聚力的命题,是很害人的命题。祖国、真理、人民都是客观的、宏观的事物,个人主观上预先抱着和客观规律讨价还价的潜意识,那怎么可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经得起风浪呢?

凡是理想都是高于现实的目标,现实中都是已知的事物。而理想是根据已知总结规律,然后推及未来。其中必然包含着高于已知的内容,即超现实、超已知的、具有未知成分的内容。每当现实困难向理想中的未知成分挑战时,总会有成批的人放弃这种理想。这就是历史大浪淘沙的机制之一。苏联东欧变化之后,有些人不太信仰共产主义了,就有这种因素。

忠诚于党组织就要服从组织的需要。我一直奉行“砖”论——“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有人批评我,



这是“工具”论,缺少个性,缺少人的主体性,缺少个人人权意识。我认为,一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放弃一部分常人所拥有的“人权”,否则就不能组成一支战斗队。所以党员的“人权”是少于老百姓的“人权”的。而党员的个人主体性、个性必须在党组织的主体性和集体个性之中发挥出来。我反问那些人:“服从”是不是一种个性?能够“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是一般的砖吗?是没有个人主体性的砖吗?组织上几次把我调到较困难的岗位上,都使我受到较大的锻炼。1986年2月,北京市委领导把我从市团委书记岗位上调到北京市体委主任岗位上。给我谈话的领导第一句话就是:“给你个硬骨头啃一啃。”因为那时北京市体育在全国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上得了个第20名。一时间四方批评,内部沮丧。领导上先后试调几位同志去,都未成功。和我谈了半小时,我就打起行李卷骑着自行车上任了。三年下来,北京市在第二届青运会上的名次上升到第九,还盖起了两座亚运会场馆。正准备迎接亚运会之际,领导又突然调我到北大。当时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北大学生还心怨不解。自由化精英的海外鼓噪加上“国际制裁”,北大一时成了八面来风、众矢之的。当时北大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我去了,与同志们共同奋斗。三年过去了,北大又恢复了书声琅琅、稳定向上的局面。我等于又上了一次大学。在党性锻炼上又“蜕”了一层皮。忠诚才能使个人的贡献融于特定的事业,才能使贡献的方向更适于组织的需要。到组织需要的地方去,很可能和自己的专业、兴趣、特长不符。但“需要”就是最好的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成长条件。因为有需要,你下多少工夫都能发挥出来。在客观需要的牵引下,“特短”可以变成特长。在困难的环境里工作,虽然苦一点,累一点,风险大一点,但环境对人的要求会更苛刻一些,也就是更严格一些。在困难中工作,时间似乎被压缩了,身心高度紧张。一晃几年过去了,蓦然回首,自己也觉得自己变化殊显,比在轻松的岗位上变化大。忠诚才能使个人才能的类型更适于事业和组织的需要。

我主张一个党员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而党和人民的事业肯定既是理想性的,又是功利性的。这是历史的客观。两者的衔接点就是个人忠诚于组织、服从于组织需要。社会是每个人的贡献堆积而成的。党的事业是党员的贡献堆积而成的。贡献与索取之比是每个党员的价值,又是事业发展的速度。

贡献既是每个人真才实学的最终标准,又是每个人才能表现的舞台。很多人喜欢从“知识量”、“学历”来论才能。这恐怕不会很有益于社会。党政干部还是应以忠诚作为贡献的导向,进而以贡献作为才能的导向为宜。就像商品经济里,商品价格以最终消费为导向一样。有贡献的才能才是有社会价值的才能。

“忠诚、贡献、才能”的价值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关键是要知道这三者在一个党政干部成长道路上的地位排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尤其能够排除种种环境干扰,坚持始终,才是最不易的。我相信这是客观的。一个政党或政府如果不按这个排序来用干部,恐怕其战斗力或生命力



早晚要受侵蚀。一个人一生干不了几件事情,只有把自己编进一个组织,不离开队伍,才能干出自己和社会都算还满意的一点事情来。我这些年就是按照这些认识走过来的。



